

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sup>①</sup> 这里的“任何其它国家”指的就是苏联。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起,美苏争霸已经符合我们在上一节提出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个基本特征。1. 美苏作为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之间的争霸矛盾最有资格成为大国的矛盾。2. 在 70 和 80 年代,争霸的矛盾关系到美苏的最重要战略利益。这场争霸的斗争既关系到它们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问题也关系到它们的国家安全,因为争霸过程中有相当的核战争危险。3. 美苏争霸的矛盾迫使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得在它们中间作出外交选择。中小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结果,与邻国军事冲突的结果,往往都取决于美苏对其中一方军事支持的程度。为了政权的生存,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政府很难在美苏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必须选择一方。不结盟运动的最根本的宗旨无法执行是典型的例证。不结盟运动规定不结盟国家不应与任何大国签订双边联盟,不应同意在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sup>②</sup> 然而,许多不结盟国家都与美国或苏联签有军事同盟条约或是提供了军事基地。

<sup>①</sup>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卷(1970 - 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46页。

<sup>②</sup>《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26页。

## 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

冷战结束仅一年,苏联就解体了,从此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称霸取代美苏争霸成为冷战后与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区别,因此在判断什么是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时,我们需要从美国与其它世界主要力量的矛盾入手。通过分类的方法先将它们的双边主要矛盾排列出来,区别这些矛盾的战略性质,然后从中选出最相似的战略性质矛盾作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加以检验。

冷战后,美国与中俄两国的主要矛盾性质是相似的,即美国要巩固以美国为霸主的国际秩序,而中俄两国反对美国的霸权秩序,想促进多极国际秩序的形成。1994年美国总统的《接触与扩大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是最重要的。<sup>①</sup>1999年美国总统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作为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基础。<sup>②</sup>中俄领导人则于1994年达成反对美国霸权的共识,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出“不允许进行扩张,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sup>③</sup>这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指的是美国的称霸政策。例如,科索沃战争发生后,中俄不断协调立场反对美国对南斯拉

① William J. Clinton, A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The White House,July 1994),p.1.

② William J. Clinton, A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The White House,December 1999),p.3.

③ 《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9月5日,第3版。

夫的武装干涉。直到南斯拉夫同意北约的要求从科索沃全面撤军的前一天，中俄还发表了联合公报，要求美国和北约停止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反对“推行强权政治的作法”。<sup>①</sup>

西欧<sup>②</sup>和日本与美国的主要矛盾相似，即美国的霸权体系在使它们分别在欧洲和东亚处于随从的地位，而西欧与日本不甘心在地区事务中与美国的不平等关系，向美国争取平等的伙伴地位。美欧不平等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安全关系方面，即欧洲国家不愿由美国主导欧洲的安全事务。法国与英国主动促进欧洲独立防务部队的建立，力图改变美国通过北约主导欧洲安全的局面。1999年欧盟领导人在赫尔辛基作出决定，要在2003年前建立独立于北约的防务部队。<sup>③</sup>政治上，欧洲大国也不愿美国一家称霸世界，法国就明确表示支持多极化的发展。<sup>④</sup>美日不平等关系存在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但双方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矛盾并不突出，主要矛盾集中于经济方面。美日都想占据高科技产品的战略制高点，双方在高科技产品市场上的矛盾比较激烈，因此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市场准入问题。美国不断逼压日本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日本对美国这种强制性的作法不满，于是采取了对美国

<sup>①</sup> 《中俄外长发表北京会晤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99年6月3日，第4版。

<sup>②</sup> 西欧或欧盟是一个“力量”不是一个国家，但由于中文中使用“力量”一词不便于表达单个国家的概念，因此本文交叉使用“力量”和“大国”来代表中、美、日、俄、欧。

<sup>③</sup> Craig R. Whitney, "Europe's Mobile Force: An Uncertain Factor for U.S. Strategis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3, 1999, p. 5.

<sup>④</sup> 《江主席同希拉克总统会谈》，《人民日报》，1997年5月16日。

说“不”的政策。1994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美时拒不接受美国提出的设立衡量日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数值指标”，<sup>①</sup>这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对美采取说“不”立场的开始。日欧与美国争平等地位实际上就是争取更加独立的政策制定权，因此它们与美国的矛盾是一种半战略性的。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相互担心对方成为地区霸权。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1992年日本提出5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目标。<sup>②</sup>1996年日美制定新的日美防卫指针，日本乘机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作用。冷战后日本产生在东亚建立日元区的愿望，1999年提出建立日元、美元、欧元“三极货币体制”的设想。<sup>③</sup>日本的作法使中国担心日本有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并最终成为军事大国，特别是担心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后有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中国政府不断提醒日本“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sup>④</sup>而且美日同盟有明显遏制中国的一面，从反对美国霸权的政策目标出发，中国也得反对日美同盟。而日本则担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家。因此日本对华政策是“鼓励中国在国际社会及亚太

① 《世界知识年鉴 1994/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② 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345-346页。

③ 《小渊将提出“三极货币体制”设想》，《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1日。

④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新华每日电讯》，1997年6月11日。

地区起更加建设性的作用”，<sup>①</sup>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则采取“予以关注”的政策。<sup>②</sup>

冷战后，中俄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矛盾，双边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双边经贸关系薄弱。中俄不仅双边投资数量很小，而且双边贸易自 1994 年跌至 50 亿美元后一直难有大幅增长。<sup>③</sup> 1998 年双边贸易为 54.8 亿美元，只相当于中美贸易 549.3 亿美元的十分之一。<sup>④</sup> 双方都对经贸关系不满意，但又都无力改变现状。

中国与西欧的主要矛盾是政治分歧。自 1990 年起，欧洲国家长期支持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虽然欧盟于 1998 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改变了以集体投票方式支持美国发起的《中国人权状况》反华提案的作法，但欧洲国家普遍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突出表现在是否同意国际社会有权对一国人权事务进行干预上。

俄罗斯与西欧的战略矛盾主要是北约东扩问题。北约东扩战略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周边国家纳入北约范围，这样北约的军事力量就可以部署到俄国的门口。由于俄国西南部边疆

① WHITE PAPERS OF JAPAN 1994-1995 ANNUAL ABSTRACTS OF OFFICIAL REPORTS AND STATISTIC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kyo: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p. 21.

② 《日公布防卫白皮书，核心内容是建立安全保障环境》，《每日新闻》（日本），1997 年 7 月 2 日。

③ 《1994 年 1-12 月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国际贸易》1995 年第 3 期，第 64 页。

④ 《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国际贸易》1999 年第 2 期，第 62 页。

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北约在车臣战争的问题上对俄罗斯进行政治谴责，使北约东扩战略对俄罗斯形成的军事战略压力变得非常现实。因此俄罗斯与西欧国家在北约东扩上的战略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而且北约东扩不仅是欧洲国家的战略意图，也是美国称霸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俄罗斯从反对北约东扩的需要出发也得反对美国称霸政策。

日俄矛盾的焦点是领土问题。冷战后，日俄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但双方在北方四岛上的分歧却无法解决。日本希望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作出让步，与俄共享北方四岛的权益。而俄国则不愿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1993年前，日俄两国关系曾为此陷入僵局，虽然日俄领导人于1998年正式启动缔结和约的谈判，<sup>①</sup>但短期内仍无望解决这一矛盾。不过，双方领土分歧由来已久，这一矛盾也没有发展成为战略矛盾的危险。

日本与西欧的矛盾主要是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但这是非战略性的矛盾。日本与西欧在政治上没有分歧，在安全上也无冲突的利益，在经济上是正常的竞争关系。

表-1 冷战后大国间的主要双边矛盾

|         |           |          |             |
|---------|-----------|----------|-------------|
| 美国      |           |          |             |
| 中国反美称霸※ | 中国        |          |             |
| 日与美争平等* | 中日互防地区霸权※ | 日本       |             |
| 俄反对美称霸※ | 中俄经济合作困难  | 日俄领土纠纷   | 俄罗斯         |
| 欧与美争平等* | 中欧意识形态对立  | 日欧竞争国际市场 | 俄反对北约东扩※ 西欧 |

※战略性的矛盾， \*半战略性的矛盾。

① 《世界知识年鉴 1998/9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62~163页。

对照本文提出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项基本特征，可以发现冷战后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是具有这三项特征的。

1. 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是大国间的普遍矛盾。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称霸是导致大国矛盾的普遍原因。在10个双边主要矛盾中，6个矛盾与美国称霸战略有关：美国与中、日、俄、欧的4个双边主要矛盾以及中日、俄欧两个矛盾。余下的4个双边主要矛盾（日俄、日欧、中欧、中俄矛盾）的矛盾性质各异，没有普遍性和共同性。

2. 称霸与反霸是冷战后大国间的战略矛盾。表-1中4个具有战略性的矛盾都与美国称霸有关，即中美、美俄、中日、俄欧这4个战略矛盾。首先，这4个战略性的矛盾涉及到冷战后几大力量的国家安全利益。其次，欧美和日美的矛盾也具有半战略性质。欧洲的法国已经提出支持多极化的政策主张，欧洲要建立独立的防务部队。日本要与美国争取平等地位，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反霸色彩，特别是双方在高技术新产品市场的争夺上也关系到它们的经济战略利益。既然美国称霸关系到其它几强的战略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称霸与反霸是大国间突出的战略性矛盾。

3. 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的矛盾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外交政策已经构成重要影响。美国靠着其超强的实力，在冷战后经常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这种单边主义政策不仅严重伤害与其政治对立的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且也伤害广大的中小国家甚至其军事盟国的战略利益。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国会1999年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美国要求修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政策。一百多个

CTBT 成员国包括北约欧洲成员和日本政府都对美国国会拒绝批准 CTBT 的行为进行了批评,<sup>①</sup>联合国裁军与国际安全事务的第 54 届联大第一委员会以 54 票赞成、4 票反对、73 票弃权通过了《维护和遵守( ABM)的决议》,对美国表示强烈不满,<sup>②</sup>连美国的盟友德国和英国都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表示担心。<sup>③</sup>联大第一委员会有关维护 ABM 条约的提案是由俄罗斯、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同提出的,大国的战略对抗使联合国所有成员都不得不表态。美俄在 NATO 东扩的矛盾使所有欧洲小国和许多前苏联共和国都需表态支持哪一方。这种表态,直接关系到这些中小国家的切身国家利益。战略利益矛盾使得日欧反对美国在修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问题上的霸权立场,广大的成员国也因此提出多种反对意见,从而使 1999 年的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无果而终。<sup>④</sup>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看出美国称霸和其它大国反霸这一矛盾基本上具备了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项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矛盾就是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称霸与反霸是一种普遍的国际政治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其时代的特殊性有所不同。冷战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称霸的制度性和国际规范之争两

① William Drozdiak, "Rejection Is Called Blow to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5, 1999.

② 顾震球:《联大一委通过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决议的前前后后》,新华社联合国 1999 年 11 月 5 日中文电。

③ 威廉·德罗兹迪亚克:《美国可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举引起欧洲恐慌》,《华盛顿邮报》,1999 年 11 月 6 日。

④ 邵宏华:《透视“千年回合”》,《世界知识》2000 年第 1 期,第 8~10 页。



个方面。

美国在冷战后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制度霸权，这有别于历史上曾有过的一些霸权。所有的霸权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强制方法实现自己海外利益的。而美国与以往霸权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依靠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想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制度性的霸权体系。美国是最早的成文宪法制国家，其长期的宪政主义政治思想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sup>①</sup>这种政治影响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及有形与无形的国际规范和机制。<sup>②</sup>制度化的霸权体系是通过建立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规范，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较多国家的政治支持，减少霸权政策对武力的过分依赖。美国 1999 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我们(美国)应支持国际机构和组织，从中得到他国对美国的支持，帮助美国承担领导世界的负担。”<sup>③</sup>为了使其霸权合法化，美国尽量利用多边国际组织实施其霸权。例如，1999 年虽然美国军事上已赢得了科索沃战争，但美国还是将政治解决科索沃的方案提交给联合国安理

<sup>①</sup>参阅金灿荣：《美国外交的国内政治制约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特点》，《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牛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6 ~ 199 页。

<sup>②</sup>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战略》，《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牛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2 ~ 33 页。

<sup>③</sup>William J. Clinton,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999), p. iv.

会，争取安理会的批准。<sup>①</sup>

正是由于美国要建立的是制度性霸权体系，因此冷战后称霸与反霸的核心内容是国际规范之争，即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规范。制度性霸权的基础由实力加上国际规范，因此美国在冷战后不断推动新国际规范的建立。然而，由于美国所要建立的国际规范是从有利于美国霸权角度考虑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其它大国的战略利益，由此大国在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规范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军事上，中国与俄罗斯提倡建立新的安全观，而美国要加强军事同盟和建立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的体制，特别是防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建立。政治上，中国、俄罗斯坚持不侵犯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则提倡人道主义干预和建设性干预，否定民族主义和传统主权观念。经济上，欧洲和日本则主张具体情况具体考虑的灵活原则，而美国主张采取自由贸易的普遍原则。

### 中国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的位置

虽然美国的称霸政策与其它几强的战略利益都有矛盾，但与中国的矛盾最为突出。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的实力远胜于其它几强，而是双边矛盾的层面太多。美国称霸的目标与中国的矛盾太多，而其称霸的策略又对中国排斥太大。

美国称霸世界的目标主要可以分为安全、政治和经济三

<sup>①</sup> 符福渊、周德武：《安理会通过科索沃问题决议》，《人民日报》，1999年6月11日。

个领域。美国 1999 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规定了美国建立霸权体系的目标。安全上，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不允许和美国对立的力量主导地区安全；政治上，在全球推行西方民主观念，扩大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数量，并加强国际社会对人权事务的干涉；经济上，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和持续增长，以保持美国的繁荣。<sup>①</sup>

依据美国的霸权目标，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目标与中国的矛盾远多于与其它几强的矛盾。政治方面的矛盾最为突出的，美国、欧洲、日本和俄国都是多党选举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为惟一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使得美国霸权的政治目标只与中国有矛盾，而与其它几强没有矛盾。为了推行西方的民主，美国要建立国际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人道主义干涉，这对政治制度与美不同的中国来讲更是威胁。

在安全方面，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同俄美矛盾尖锐程度相似，中俄是美国防范的地区军事大国，而日欧与美国在这方面没有大的矛盾。北约东扩是对俄国的遏制，日美同盟是针对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分离主义的威胁，而这些分离主义势力都得到美国的政治或军事支持。美国建立国际干预规范的策略很容易对分离主义引发的冲突进行干预，这对中俄两国的民族统一构成很大威胁。而日本与欧洲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安全目标上没有完全的对立。只是欧

<sup>①</sup> William J. Clinton,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998), p.5.

洲在建立独立防务部队摆脱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方面与美国欧洲战略意图有矛盾，不过这个矛盾还是同盟内部的矛盾。

在经济方面，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核心是市场准入问题，这一点与日欧相同，而俄罗斯与美在经济上则没有这种尖锐的矛盾。

从目标层面的矛盾看，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三个方面都有战略性矛盾，而日本、欧洲和俄国只分别在经济或安全一个方面与美国有战略性矛盾。

表 -2 美国霸权目标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矛盾

|    | 经济   | 政治   | 安全    |
|----|------|------|-------|
| 美日 | 市场准入 | ∅    | ∅     |
| 美欧 | 市场准入 | ∅    | 独立防务※ |
| 美俄 | ∅    | ∅    | 北约东扩  |
| 美中 | 市场准入 | 社会制度 | 台湾问题  |

※半战略性矛盾。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强度是大于其它强国与美国战略矛盾的强度的。如果我们对美国与大国的战略矛盾用指数的方法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中美矛盾的强度与其它大国与美国矛盾强度的差别了。

根据表-2，我们可将各项矛盾的指数定为 1；然后根据矛盾性质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经济权重为 1，政治权重为 2，安全权重为 3。这样我们就得到，中美战略矛

盾的强度指数为  $1+2+3=6$ ，美俄战略矛盾强度为 3，日欧与美国战略矛盾强度分别为 1（即使考虑进欧美在欧洲独立防务部队的矛盾，欧美矛盾强度指数也不应超过 1.5）。从战略目标层面上比较，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是美俄的 2 倍，是日美的 6 倍，是欧美的 4~6 倍。

此外，美国建立霸权体系的策略也使中美战略矛盾的性质及尖锐程度都胜于其它几强与美国的战略矛盾。美国建立制度性霸权体系的重要策略是加强美国的军事同盟的作用和多边国际机构为美国主导世界服务的功能。这一策略客观上将中国置于美国的战略对立面。首先，美国在其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安全体系，这些同盟不但将中国和俄罗斯排斥在外，其中的美日同盟和北约还将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作为共同威胁。其次，中国还被排斥在许多重要的多边国际机构之外，而美正是要加强这些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功能。例如，美国想让八国集团起到联合国之外的安理会作用，将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为经济安理会，将瓦森纳尔发展成全球军事技术控制中心。西方大国都是上述组织的成员，俄虽不能参加七国首脑会议的经济讨论，但还能参加八国集团的政治对话和瓦森纳尔，而中国却不被这些组织所接受。如果我们考虑进美国建立制度性霸权策略的因素，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要比其它大国与美国战略矛盾强度的尖锐程度差别更大。

如果我们以美国霸权策略对中国的排斥度为 1，那么对俄国的排斥度为 0.5，而对日本和欧洲则为 0。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为  $6+1=7$ ，俄美战略矛盾为  $3+0.5=3.5$ ，日欧与美国的战略矛盾强度不变，日美为 1，欧美为 1 或

1.5。这样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就是俄美的 2 倍,日美的 7 倍,欧美的 4.6~7 倍。

表-3 美国与中、日、俄、欧的矛盾强度

|    | 经济 | 政治 | 安全    | 策略  | 合计    |
|----|----|----|-------|-----|-------|
| 美日 | 1  | 0  | 0     | 0   | 1     |
| 美欧 | 1  | 0  | 0-0.5 | 0   | 1-1.5 |
| 美俄 | 0  | 0  | 3     | 0.5 | 3.5   |
| 美中 | 1  | 2  | 3     | 1   | 7     |

虽然上述分析表明中美矛盾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十分突出,但这仅表明中国有成为矛盾另一主要方面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重要一方。首先,中国并没有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冷战后最主要的敌人。中美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中美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并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sup>①</sup> 尽管中美之间相互猜疑,但双方始终都不愿意,也没有将对方视为死敌,都还在寻求冷战后的合作道路。即使 1999 年 5 月 8 日发生美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6 月 3 日中国还是表示愿“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sup>②</sup> 美国政府领导人和战略分析家们也普遍认为中国还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官方文件也明确阐述,与中国发展伙

① 《中美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 年 10 月 31 日。

② 《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社论),《人民日报》,1999 年 6 月 3 日。

伴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sup>①</sup>

其次，中美矛盾仅是美国称霸与其它国家反对霸权这一矛盾中的一部分。美国称霸政策不仅与大国有战略性的矛盾，而且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集团以及国际组织也有矛盾。其中有些矛盾的尖锐程度远大于中美矛盾。例如，美国与朝鲜、利比亚、古巴、伊拉克、伊朗、南斯拉夫等中小国形成完全敌对的矛盾，只是它们的矛盾是大国与小国的矛盾而不是大国间的矛盾。此外美国的称霸政策与印度、尼日利亚、巴西等地区大国也有战略性矛盾。如果把美国称霸与全世界各种反霸力量之间的矛盾作总体考虑，中美矛盾在美国称霸与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中的比重是有限的。

## 结 论

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与冷战后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在冷战后期，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已经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从美苏争霸转变成为美国称霸和几强不接受美国霸权。美国称霸是美苏争霸的结果，这种结果只是使美国从争夺霸权转向维持霸权。美国在取得了霸主地位之后，便想建立一个制度性的霸权体系，这种战略与美国在冷战时争霸的策略有一定的延续性。这使冷战后的主

<sup>①</sup>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998), p. 43.

要国际矛盾继承了美国在冷战争霸时的一些政治特征,如加强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扩展西方民主政治的势力范围,在全球扩展市场经济等等。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延续性,很多人作出了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应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假设,这种假设误导人们去寻找与美苏争霸完全不同的矛盾,其结果是看不清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或是误将文明冲突、民族矛盾、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中的一个作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美国称霸是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其对立面则是一个分散而不统一的力量。冷战后,美国建立制度化的霸权体系与所有的大国都有矛盾,只是矛盾的尖锐程度不同。中小国家并不是愿意接受美国称霸,而是没有反霸条件。冷战后,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使中小国家已不可能像冷战时那样利用东西方对峙的格局,组成不结盟运动以第三种力量与两个超级大国周旋。在美国一超主导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中小国家只能采取倾向西方的政策。因此,冷战后反对美国霸权的主要是大国和受到美国严重压制的少数中小国家。在美国称霸的对立面中有众多国家,但这些国家形不成反美统一战线。虽然都不愿接受美国的霸权,但谁也不愿出头组织反霸统一战线,而且有些国家还想利用美国称霸战略达到自己的需求,扩展自己的势力。

中国虽然与美国有结构性的战略矛盾,<sup>①</sup>但中美之间仍

<sup>①</sup> 阎学通:《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世界知识》2000年第3期,第9页。



有发展战略合作的可能。美国建立制度性霸权的目标使得美国对大国和小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原则。对小国美国是以武力施加其霸权，对大国则采取协商的政策。冷战后每次卷入军事冲突前，美国都与大国协商。在与大国不能达成一致时，美则在不与大国进行正面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1996年美国派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和1999年军事打击南斯拉夫，都是在确认与中国和俄国不会发生军事冲突之后才下的命令。因此为了防止双方发生正面对抗，中美都需要发展战略合作。如果这种需要有所增长，中美矛盾尖锐程度就可以有所缓解。由于目前国际力量结构在未来的10-15年之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不会失去一超地位，因此美国称霸现象将持续较长时期。中国要解决在美国霸权体制内与美国的矛盾，就需要注重中美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通过双边合作增强相互信任、防止全面对抗，通过多边合作制定有利于结束美国单边主义行为的国际规范。

## 二、美国称霸战略的性质

从目前种种迹象看,如果不出现大的变数,发生在科索沃的战争从形式上可以说快要结束了。科索沃战争对既有世界格局有什么影响?科索沃战争结束了,世界就太平了吗?我们如何维护世界的和平?

### 科索沃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科索沃战争没有改变冷战后在 1996 年确立的世界格局,但使美俄等关系更加困难。

世界格局构成有两个方面:大国力量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无论大国力量对比还是大国战略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大国力量对比看,现在仍然是一超多强,并没有因为科索沃战争而改变。

从大国战略关系说,也没有什么改变。北约 1996 年决定东扩,美国和日本在 1996 年确立了新防卫指针,同一年,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冷战后,北约原本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但西方大国不但没有解散北约,反而不断加强北约的力量,将北约扩大到俄罗斯的家门口,这理所当然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对。俄罗斯

虽然参加了科索沃战争和平协议的起草，但北约东扩不止，俄美关系未来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科索沃战争不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也就是说，不会回到冷战时代，但会促进地区冲突和分离主义。

冷战的最主要特点是美、苏争霸，势均力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前苏联的核武器库，但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冷战后期主要国际矛盾是美、苏争霸，到了冷战结束后变成美国一国称霸。一个事件是否成为历史转折点，主要取决于国际主要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科索沃战争没有产生一个能够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国家，美国称霸的局面照样存在，“历史转折点”的说法难以成立。

但科索沃战争将使得国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实质上是支持阿族独立的，这将鼓励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分裂主义分子坚定其立场，为谋求独立不断挑起地区冲突，加剧地区的不稳定。

科索沃战争不会导致大规模军备竞赛，但增强了战争意识，加剧了武器扩散。

出现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前提是主要大国增加军费开支，从世界主要国家的现实情况看，增加军费开支的可能性不大。除了美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外，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它们可能适当增加国防开支，但不会达到军备竞赛的程度。

但科索沃战争增强了人们的战争意识，使中小国家加快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中远程导弹扩散难以阻挡，人们更加信

奉“有限威慑”的国防政策。南斯拉夫人说,要是他们有中程导弹,北约绝不敢对他们轰炸。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对导弹的需求将会大量增加,人们更加相信导弹的威力。

科索沃战争不会使联合国陷于瘫痪,但加强了人们对强权的信奉,国际安全合作趋于困难。

科索沃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空袭的形式进行的,联合国的声音十分微弱。由此是否就可以断定联合国瘫痪了呢?不能。大国还需要联合国的存在,因为大国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它们还需要在联合国的结构内进行协调。

但国际社会将会更加信奉强权。透过科索沃战争,人们会得出这样的认识:联合国的作用是有限的,强权才是发言权,强权才是“真理”。

信奉强权的另一方面是信奉实力。这种信奉靠实力解决地区争端或国际问题的观念,会促使大家把地区安全寄托于自己的军事实力,这将导致国际安全合作更加困难。

### 科索沃战争结束,世界并不太平

科索沃战争是美国称霸的安全战略的必然结果,偶然性在于南联盟提供了机会。

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成为美国称霸。科索沃战争不但没有改变这种现实,相反是实施了美国全球称霸的安全体系的战略。美国称霸的安全体系是:美国主导,大国协调,小国服从。这种战略又叫危机处理战略,是从冷战后的灵活反应战略发展而来,它的特点是:1.不使用武力处理与大国的冲

突。2.对中小国家动武则毫不犹豫。伊拉克危机、波黑战争的结果坚定了美国的称霸战略，科索沃战争是美国这一战略的必然结果。不仅仅是南联盟，无论哪个中小国家，只要反对美国的战略安排，都会受到武力打击。因此，科索沃战争结束了，世界并不太平，美国的称霸安全战略依然存在。

美国称霸安全战略的实质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有个叫做亨廷顿的学者发明了“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的国家会产生整体性冲突。相似的文明之间会相互支持，冷战后核心矛盾是伊斯兰教与儒教联合共同对抗基督教。确实也有些人相信这种理论，但事实说明，这种理论是靠不住的。就这次科索沃矛盾而言，是基督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冲突，但基督教国家站在了伊斯兰教一边，而不是支持文化相似的东正教。按照亨廷顿的理论，所有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会反对南联盟，但事实上，作为伊斯兰教的伊拉克、利比亚却支持南联盟，而且东亚儒教国家也是各自立场不同。这些事实证明“文明冲突论”不成立。

美国称霸安全战略的实质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不是所谓的“文明冲突”。美国国内曾就外交的标准是“价值观”重要还是“利益”重要展开过辩论。从实际的执行中看，美国把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把国际利益和所谓的价值放在第二位。当国际利益或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一致时，它就高唱口号维护国际利益和价值观；当它们与国家利益矛盾时，它会不惜一切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弃国际利益和价值观。当然，美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对大国和小国的策略不同，它需要大国的合作以建立自己的称霸体系，因此会采

用“打、拉”结合的方式。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对俄罗斯的做法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一方面不顾俄罗斯的反对，继续对南联盟轰炸，另一方面以“世行”的名义向俄罗斯提供贷款。

只要美国继续推行其基于国家利益的称霸安全体系，执行危机处理战略，世界就不会太平。科索沃战争结束了，其它地方的战争又会打起来。

### 我们如何维护世界和平

我们的选择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道义。

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称霸与反霸，这一矛盾是冷战时期矛盾的发展。称霸者信奉的是“丛林法则”，我们作为反霸者则要推动国际公法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要继续推动联合国在重大问题上的作用。固然，联合国不是一个强制性组织，它的作用能否发挥要取决于成员国在一个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联合国在世界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就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 有两种观点值得认真讨论

“东西夹击论”，即美国分别通过北约从西部、通过日本从东部两个方面夹击俄罗斯和中国。

这种言论把美国的实力想像得过于强大，对俄罗斯和中

国的力量过于悲观。拿破仑没有战胜俄罗斯，希特勒同样没有战胜俄罗斯，日本侵华最后失败，美国在朝鲜和越南都没打赢。这样的历史，美国的战略家想必不会忘记。俄罗斯目前虽然遇到了经济困难，但并没有衰退到不堪一击。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对俄罗斯的顾忌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实力在不断增长的国家，历史上还没有能遏制住一个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家的经验。

如果美国决策者真的想从东西两面夹击中俄，那么这种策略从制定那天起就注定要失败。

“中印俄结盟论”，即中国、印度、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美国。

我国于 1982 年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中印俄结盟论”直接违背了这一政策。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在世界和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显示出其正确性。美日同盟与北约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副作用正在增长，中国不能不考虑结盟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中印俄结盟重开冷战，既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中国自己争取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北京青年报》1999.6.15，原文题为《美国称霸战略的实质》，采访及录音整理：周传忠）

### 三、科索沃：美国霸权体系的实验场

6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决议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轰炸虽然停止了，但南联盟塞、阿两族人民还远未迎来他们期待的和平，我们就此进行的思考也远远没有结束。日前记者采访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阎学通。

记者：有学者称，科索沃只是大国争夺利益的演习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否已达到了它的目的？

阎学通(以下简称阎)：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争夺非常明显。其核心是，今后欧洲地区的安全由谁来维持。原来，在这场战争之前，整个欧洲地区安全是通过俄罗斯和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来维护的。而这次科索沃危机却表现为，欧洲地区的安全主要由北约来维持，俄罗斯只是如何配合北约的问题。这意味着，俄罗斯今后已没有了所谓的与北约平等的和平伙伴关系。从战略角度讲，通过这次科索沃战争，俄罗斯在欧洲和平中的作用下降了，在欧洲整体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明显减少了。

记者：科索沃战争对当今世界格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阎：科索沃战争的主要影响是，使冷战后地区冲突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发展。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次干涉的“成功”使它们今后干涉地区冲突的决心进一



步增强；第二，冷战后分离主义发展很快，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分离主义的运动。这两个因素必然导致地区冲突增加。

但是，科索沃战争并没有改变国际格局，也不会使现在的国际社会回到冷战中去。这种变化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及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冷战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冷战，一是因为有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二是它们有对抗的力量，且势均力敌。科索沃这场战争没有改变冷战后的主要矛盾，即美国称霸世界和其他国家反对美国霸权的矛盾。科索沃战争也没能改变一超多强的力量对比。

记者：我们再回到科索沃问题本身。现在科索沃被美、英、法、德、意、俄六国分五区控制，让人想起二战后的柏林。这种局面最终会怎样收场呢？

阎：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由美欧国家负责科索沃地区安全的现状，难以长期维持。今后最大的问题将是，如果维和部队从该地区撤出，这个地区的安全就变成了真空，科索沃的阿族仍然会和塞族发生矛盾。那里需要一个长期的、本地的军事安全组织来维护安全，这个组织本应由南斯拉夫政府提供，但现在北约不允许，要让阿族来提供，可是当地阿族武装与南联盟的关系怎么处理呢？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北约国家很有可能会支持科索沃独立，以此确认阿族军事武装为惟一合法的政府武装来维持和平，这样北约才撤得出来，这可能是最后的政治结果。

记者：这次对科索沃问题的武装干涉，是美国加速在欧洲推行其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次行动较之以往具有什么新的特点？

阎: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即美国正图谋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霸权,它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国那种完全凭借实力的霸权。美国希望建立的霸权不是完全依靠实力,而是要依赖一种新的体系或一种新的制度,即制度化的霸权体系。因为当霸主后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孤立,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矛盾,成为众矢之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霸主往往由此走向衰微。

美国为了防止成为孤立的霸主,它想建立一种包括组织机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三个内容的体系,使其霸权政策具备一定的“合法性”,这是美国真正的战略。这表现为,美国霸权政策不只是推行强权,还有和大国协调的一面。因为只有协调,它才能使其霸权政策让人觉得有一定的“合法性”。

记者:这次科索沃成了美国新霸权体系的实验场,可诸强就心甘情愿被纳入服务于美国利益的霸权体系吗?

阎:按道理,霸权是越来越孤立,这应该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孤立,将这个霸权与冷战后国际秩序相结合,使它制度化、规范化,导致的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进一步说,由于美国搞制度化霸权,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国家的利益和美国的霸权利益变得一致了。举例说,美国希望通过北约来推行它在欧洲地区的霸权利益,而这又和北约国家想在该地区提高自己的安全利益形成了某种一致性。这次北约欧洲成员国之所以支持美国在本地区实施武力,其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由于它们担心美国的霸权。正是由于这种担心,才有这次欧洲(北约)国家“一定要”以与美国“平等的地位”集体参与科索沃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是,战争的结果并没有使

欧洲的“平等地位”得到提高,却使美国的霸权进一步巩固了。

(《光明日报》1999.7.27,采访记者:李志强)

## 四、冷漠比轰炸更危险

您听到消息后,第一个判断是什么?

我是美国当地时间 7 日晚上知道的消息,美国的电视节目说是“误炸”,但他们的词用得很奇怪,以往用的是“by mistake”(错误),而这次用的是“unintentional”(并非有意的),这可以证明这次对这个建筑物的轰炸是做好充分计划的而并非是失误。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轰炸绝对不是没有计划的,但轰炸里似乎有些什么问题。

您对于北约的态度如何评价?

第一,美国和整个北约国家对此事的态度可以说是“太不认真”。你可以看到在所有北约领导人所作的解释中,他们的重点都不是向中国道歉,而是强调尽管出了轰炸中国使馆的事件,仍要继续轰炸南斯拉夫。第二,他们对炸死中国人似乎觉得无所谓,很长时间里没有作出要赔偿、道歉和慰问的表示,从语气上看,仅仅是“对不起”,好像这三个字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了,没有任何真正的同情在里面。克林顿最早就此事的发言中,向中国道歉的语言很少,而关于为何要继续轰炸却很多。奥尔布赖特向中国道歉时面目毫无表情,声调平淡,而辩护要继续轰炸时却提高了声调。他们太轻描淡写了,北约领导人甚至说“误伤不可避免”,简直把轰炸中国使馆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轰炸本身更为恶

劣。在美国许多报纸中，这件事虽然很严重，大多数报纸在头版进行了报道，但却没有放在头版头条。这表明西方媒体对于炸死中国人的不重视程度。直到第二天中国人开始抗议才有显著报道。

您觉得北约这种“**unintentional**”的举动有什么战略意义吗？

我觉得现在判断它有什么战略意义还为时过早，这需要调查之后才能作出准确判断。但从克林顿和布莱尔的讲话中看，他们都不认为炸死中国人对于解决科索沃问题有什么影响，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另外，我看到美国的一篇报道，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西方外交官认为这次事件可能“有助于中国在安理会配合美国”。他的这个认识也许不代表官方，但至少说明西方国家有人误以为轰炸中国使馆可以迫使中国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和美国合作。其他还有什么考虑，我觉得现在还没法判断。

您觉得美国高层是否料到中国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没有。他们不认为中国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因为从他们的心理来讲，并不认为炸死亚洲人是人权问题。比如同样是种族清洗，印度尼西亚的种族清洗，欧洲几乎没有政府出来说什么话，但是在科索沃问题上他们就采取军事行动。在这点上他们截然不同的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所以他们指的人权是“白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而不是“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平等”。

那您认为中国的态度应该怎样？

我认为我们要求的第一件事情是进行坚决彻底地国际调

查，要将肇事者交到国际法庭，而且在安理会上强烈要求成立国际调查小组。此外，中国应该绝对坚持一点：北约必须先停止对南轰炸，然后再谈别的事情；如果不停止轰炸，中国难以采取合作态度。

如何进行调查呢？

第一，不但要调查飞行员，而且要调查轰炸的计划、下达命令的指挥官以及地图提供人员。因为不能排除政府有意轰炸中国使馆，同样也不能排除这些飞行员、指挥官或其它小的集团出于某种种族主义情绪，制定轰炸计划。另外要调查这里面有没有个人阴谋。而且要有非北约国家的调查人员参与调查，搞清楚计划是怎样制定的，怎样实施的，实施过程中有什么人参加，执行计划时和最上层的意见是否一样——如果完全一样，那就要考虑北约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二，调查中必须要有中国专家参与，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调查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三，在调查过程中必须要求北约主动配合提供所有的材料，要知道这个命令是怎么发的，是谁发的，在几点几分发的，要核查所有录音、检查飞机、查看软件设计得是否合理……要十分彻底。我想中国在调查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应当不亚于美国在调查洛克比空难上的态度。上次美国使馆被炸，他们的反应是马上轰炸了阿富汗和苏丹，这是美国人对美国人人权的保护，而对于中国人他们绝对没有这样的立场，因此中国只有靠自己来保护中国人的人权。

那么中国的这种要求美国会接受吗？这种正当的要求对两国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我想影响是必然的，美国不会允许别的国家调查它的军

有发展战略合作的可能。美国建立制度性霸权的目标使得美国对大国和小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原则。对小国美国是以武力施加其霸权，对大国则采取协商的政策。冷战后每次卷入军事冲突前，美国都与大国协商。在与大国不能达成一致时，美则在不与大国进行正面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1996年美国派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和1999年军事打击南斯拉夫，都是在确认与中国和俄国不会发生军事冲突之后才下的命令。因此为了防止双方发生正面对抗，中美都需要发展战略合作。如果这种需要有所增长，中美矛盾尖锐程度就可以有所缓解。由于目前国际力量结构在未来的10-15年之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不会失去一超地位，因此美国称霸现象将持续较长时期。中国要解决在美国霸权体制内与美国的矛盾，就需要注重中美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通过双边合作增强相互信任、防止全面对抗，通过多边合作制定有利于结束美国单边主义行为的国际规范。

## 二、美国称霸战略的性质

从目前种种迹象看,如果不出现大的变数,发生在科索沃的战争从形式上可以说快要结束了。科索沃战争对既有世界格局有什么影响?科索沃战争结束了,世界就太平了吗?我们如何维护世界的和平?

### 科索沃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科索沃战争没有改变冷战后在 1996 年确立的世界格局,但使美俄等关系更加困难。

世界格局构成有两个方面:大国力量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无论大国力量对比还是大国战略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大国力量对比看,现在仍然是一超多强,并没有因为科索沃战争而改变。

从大国战略关系说,也没有什么改变。北约 1996 年决定东扩,美国和日本在 1996 年确立了新防卫指针,同一年,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冷战后,北约原本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但西方大国不但没有解散北约,反而不断加强北约的力量,将北约扩大到俄罗斯的家门口,这理所当然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对。俄罗斯



虽然参加了科索沃战争和平协议的起草，但北约东扩不止，俄美关系未来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科索沃战争不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也就是说，不会回到冷战时代，但会促进地区冲突和分离主义。

冷战的最主要特点是美、苏争霸，势均力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前苏联的核武器库，但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冷战后期主要国际矛盾是美、苏争霸，到了冷战结束后变成美国一国称霸。一个事件是否成为历史转折点，主要取决于国际主要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科索沃战争没有产生一个能够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国家，美国称霸的局面照样存在，“历史转折点”的说法难以成立。

但科索沃战争将使得国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实质上是支持阿族独立的，这将鼓励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分裂主义分子坚定其立场，为谋求独立不断挑起地区冲突，加剧地区的不稳定。

科索沃战争不会导致大规模军备竞赛，但增强了战争意识，加剧了武器扩散。

出现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前提是主要大国增加军费开支，从世界主要国家的现实情况看，增加军费开支的可能性不大。除了美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外，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它们可能适当增加国防开支，但不会达到军备竞赛的程度。

但科索沃战争增强了人们的战争意识，使中小国家加快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中远程导弹扩散难以阻挡，人们更加信

奉“有限威慑”的国防政策。南斯拉夫人说,要是他们有中程导弹,北约绝不敢对他们轰炸。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对导弹的需求将会大量增加,人们更加相信导弹的威力。

科索沃战争不会使联合国陷于瘫痪,但加强了人们对强权的信奉,国际安全合作趋于困难。

科索沃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空袭的形式进行的,联合国的声音十分微弱。由此是否就可以断定联合国瘫痪了呢?不能。大国还需要联合国的存在,因为大国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它们还需要在联合国的结构内进行协调。

但国际社会将会更加信奉强权。透过科索沃战争,人们会得出这样的认识:联合国的作用是有限的,强权才是发言权,强权才是“真理”。

信奉强权的另一方面是信奉实力。这种信奉靠实力解决地区争端或国际问题的观念,会促使大家把地区安全寄托于自己的军事实力,这将导致国际安全合作更加困难。

### 科索沃战争结束,世界并不太平

科索沃战争是美国称霸的安全战略的必然结果,偶然性在于南联盟提供了机会。

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成为美国称霸。科索沃战争不但没有改变这种现实,相反是实施了美国全球称霸的安全体系的战略。美国称霸的安全体系是:美国主导,大国协调,小国服从。这种战略又叫危机处理战略,是从冷战后的灵活反应战略发展而来,它的特点是:1.不使用武力处理与大国的冲

突。2.对中小国家动武则毫不犹豫。伊拉克危机、波黑战争的结果坚定了美国的称霸战略，科索沃战争是美国这一战略的必然结果。不仅仅是南联盟，无论哪个中小国家，只要反对美国的战略安排，都会受到武力打击。因此，科索沃战争结束了，世界并不太平，美国的称霸安全战略依然存在。

美国称霸安全战略的实质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有个叫做亨廷顿的学者发明了“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的国家会产生整体性冲突。相似的文明之间会相互支持，冷战后核心矛盾是伊斯兰教与儒教联合共同对抗基督教。确实也有些人相信这种理论，但事实说明，这种理论是靠不住的。就这次科索沃矛盾而言，是基督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冲突，但基督教国家站在了伊斯兰教一边，而不是支持文化相似的东正教。按照亨廷顿的理论，所有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会反对南联盟，但事实上，作为伊斯兰教的伊拉克、利比亚却支持南联盟，而且东亚儒教国家也是各自立场不同。这些事实证明“文明冲突论”不成立。

美国称霸安全战略的实质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不是所谓的“文明冲突”。美国国内曾就外交的标准是“价值观”重要还是“利益”重要展开过辩论。从实际的执行中看，美国把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把国际利益和所谓的价值放在第二位。当国际利益或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一致时，它就高唱口号维护国际利益和价值观；当它们与国家利益矛盾时，它会不惜一切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弃国际利益和价值观。当然，美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对大国和小国的策略不同，它需要大国的合作以建立自己的称霸体系，因此会采

用“打、拉”结合的方式。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对俄罗斯的做法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一方面不顾俄罗斯的反对，继续对南联盟轰炸，另一方面以“世行”的名义向俄罗斯提供贷款。

只要美国继续推行其基于国家利益的称霸安全体系，执行危机处理战略，世界就不会太平。科索沃战争结束了，其它地方的战争又会打起来。

### 我们如何维护世界和平

我们的选择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道义。

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称霸与反霸，这一矛盾是冷战时期矛盾的发展。称霸者信奉的是“丛林法则”，我们作为反霸者则要推动国际公法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要继续推动联合国在重大问题上的作用。固然，联合国不是一个强制性组织，它的作用能否发挥要取决于成员国在一个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联合国在世界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就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 有两种观点值得认真讨论

“东西夹击论”，即美国分别通过北约从西部、通过日本从东部两个方面夹击俄罗斯和中国。

这种言论把美国的实力想像得过于强大，对俄罗斯和中

国的力量过于悲观。拿破仑没有战胜俄罗斯，希特勒同样没有战胜俄罗斯，日本侵华最后失败，美国在朝鲜和越南都没打赢。这样的历史，美国的战略家想必不会忘记。俄罗斯目前虽然遇到了经济困难，但并没有衰退到不堪一击。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对俄罗斯的顾忌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实力在不断增长的国家，历史上还没有能遏制住一个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家的经验。

如果美国决策者真的想从东西两面夹击中俄，那么这种策略从制定那天起就注定要失败。

“中印俄结盟论”，即中国、印度、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美国。

我国于 1982 年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中印俄结盟论”直接违背了这一政策。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在世界和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显示出其正确性。美日同盟与北约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副作用正在增长，中国不能不考虑结盟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中印俄结盟重开冷战，既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中国自己争取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北京青年报》1999.6.15，原文题为《美国称霸战略的实质》，采访及录音整理：周传忠）

### 三、科索沃：美国霸权体系的实验场

6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决议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轰炸虽然停止了，但南联盟塞、阿两族人民还远未迎来他们期待的和平，我们就此进行的思考也远远没有结束。日前记者采访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阎学通。

记者：有学者称，科索沃只是大国争夺利益的演习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否已达到了它的目的？

阎学通(以下简称阎)：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争夺非常明显。其核心是，今后欧洲地区的安全由谁来维持。原来，在这场战争之前，整个欧洲地区安全是通过俄罗斯和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来维护的。而这次科索沃危机却表现为，欧洲地区的安全主要由北约来维持，俄罗斯只是如何配合北约的问题。这意味着，俄罗斯今后已没有了所谓的与北约平等的和平伙伴关系。从战略角度讲，通过这次科索沃战争，俄罗斯在欧洲和平中的作用下降了，在欧洲整体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明显减少了。

记者：科索沃战争对当今世界格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阎：科索沃战争的主要影响是，使冷战后地区冲突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发展。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次干涉的“成功”使它们今后干涉地区冲突的决心进一

步增强；第二，冷战后分离主义发展很快，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分离主义的运动。这两个因素必然导致地区冲突增加。

但是，科索沃战争并没有改变国际格局，也不会使现在的国际社会回到冷战中去。这种变化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及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冷战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冷战，一是因为有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二是它们有对抗的力量，且势均力敌。科索沃这场战争没有改变冷战后的主要矛盾，即美国称霸世界和其他国家反对美国霸权的矛盾。科索沃战争也没能改变一超多强的力量对比。

记者：我们再回到科索沃问题本身。现在科索沃被美、英、法、德、意、俄六国分五区控制，让人想起二战后的柏林。这种局面最终会怎样收场呢？

阎：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由美欧国家负责科索沃地区安全的现状，难以长期维持。今后最大的问题将是，如果维和部队从该地区撤出，这个地区的安全就变成了真空，科索沃的阿族仍然会和塞族发生矛盾。那里需要一个长期的、本地的军事安全组织来维护安全，这个组织本应由南斯拉夫政府提供，但现在北约不允许，要让阿族来提供，可是当地阿族武装与南联盟的关系怎么处理呢？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北约国家很有可能会支持科索沃独立，以此确认阿族军事武装为惟一合法的政府武装来维持和平，这样北约才撤得出来，这可能是最后的政治结果。

记者：这次对科索沃问题的武装干涉，是美国加速在欧洲推行其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次行动较之以往具有什么新的特点？

阎: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即美国正图谋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霸权,它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国那种完全凭借实力的霸权。美国希望建立的霸权不是完全依靠实力,而是要依赖一种新的体系或一种新的制度,即制度化的霸权体系。因为当霸主后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孤立,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矛盾,成为众矢之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霸主往往由此走向衰微。

美国为了防止成为孤立的霸主,它想建立一种包括组织机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三个内容的体系,使其霸权政策具备一定的“合法性”,这是美国真正的战略。这表现为,美国霸权政策不只是推行强权,还有和大国协调的一面。因为只有协调,它才能使其霸权政策让人觉得有一定的“合法性”。

记者:这次科索沃成了美国新霸权体系的实验场,可诸强就心甘情愿被纳入服务于美国利益的霸权体系吗?

阎:按道理,霸权是越来越孤立,这应该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孤立,将这个霸权与冷战后国际秩序相结合,使它制度化、规范化,导致的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进一步说,由于美国搞制度化霸权,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国家的利益和美国的霸权利益变得一致了。举例说,美国希望通过北约来推行它在欧洲地区的霸权利益,而这又和北约国家想在该地区提高自己的安全利益形成了某种一致性。这次北约欧洲成员国之所以支持美国在本地区实施武力,其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由于它们担心美国的霸权。正是由于这种担心,才有这次欧洲(北约)国家“一定要”以与美国“平等的地位”集体参与科索沃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是,战争的结果并没有使



欧洲的“平等地位”得到提高,却使美国的霸权进一步巩固了。

(《光明日报》1999.7.27,采访记者:李志强)

## 四、冷漠比轰炸更危险

您听到消息后,第一个判断是什么?

我是美国当地时间 7 日晚上知道的消息,美国的电视节目说是“误炸”,但他们的词用得很奇怪,以往用的是“by mistake”(错误),而这次用的是“unintentional”(并非有意的),这可以证明这次对这个建筑物的轰炸是做好充分计划的而并非是失误。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轰炸绝对不是没有计划的,但轰炸里似乎有些什么问题。

您对于北约的态度如何评价?

第一,美国和整个北约国家对此事的态度可以说是“太不认真”。你可以看到在所有北约领导人所作的解释中,他们的重点都不是向中国道歉,而是强调尽管出了轰炸中国使馆的事件,仍要继续轰炸南斯拉夫。第二,他们对炸死中国人似乎觉得无所谓,很长时间里没有作出要赔偿、道歉和慰问的表示,从语气上看,仅仅是“对不起”,好像这三个字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了,没有任何真正的同情在里面。克林顿最早就此事的发言中,向中国道歉的语言很少,而关于为何要继续轰炸却很多。奥尔布赖特向中国道歉时面目毫无表情,声调平淡,而辩护要继续轰炸时却提高了声调。他们太轻描淡写了,北约领导人甚至说“误伤不可避免”,简直把轰炸中国使馆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轰炸本身更为恶

劣。在美国许多报纸中，这件事虽然很严重，大多数报纸在头版进行了报道，但却没有放在头版头条。这表明西方媒体对于炸死中国人的不重视程度。直到第二天中国人开始抗议才有显著报道。

您觉得北约这种“**unintentional**”的举动有什么战略意义吗？

我觉得现在判断它有什么战略意义还为时过早，这需要调查之后才能作出准确判断。但从克林顿和布莱尔的讲话中看，他们都不认为炸死中国人对于解决科索沃问题有什么影响，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另外，我看到美国的一篇报道，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西方外交官认为这次事件可能“有助于中国在安理会配合美国”。他的这个认识也许不代表官方，但至少说明西方国家有人误以为轰炸中国使馆可以迫使中国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和美国合作。其他还有什么考虑，我觉得现在还没法判断。

您觉得美国高层是否料到中国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没有。他们不认为中国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因为从他们的心理来讲，并不认为炸死亚洲人是人权问题。比如同样是种族清洗，印度尼西亚的种族清洗，欧洲几乎没有政府出来说什么话，但是在科索沃问题上他们就采取军事行动。在这点上他们截然不同的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所以他们指的人权是“白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而不是“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平等”。

那您认为中国的态度应该怎样？

我认为我们要求的第一件事情是进行坚决彻底地国际调

查，要将肇事者交到国际法庭，而且在安理会上强烈要求成立国际调查小组。此外，中国应该绝对坚持一点：北约必须先停止对南轰炸，然后再谈别的事情；如果不停止轰炸，中国难以采取合作态度。

如何进行调查呢？

第一，不但要调查飞行员，而且要调查轰炸的计划、下达命令的指挥官以及地图提供人员。因为不能排除政府有意轰炸中国使馆，同样也不能排除这些飞行员、指挥官或其它小的集团出于某种种族主义情绪，制定轰炸计划。另外要调查这里面有没有个人阴谋。而且要有非北约国家的调查人员参与调查，搞清楚计划是怎样制定的，怎样实施的，实施过程中有什么人参加，执行计划时和最上层的意见是否一样——如果完全一样，那就要考虑北约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二，调查中必须要有中国专家参与，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调查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三，在调查过程中必须要求北约主动配合提供所有的材料，要知道这个命令是怎么发的，是谁发的，在几点几分发的，要核查所有录音、检查飞机、查看软件设计得是否合理……要十分彻底。我想中国在调查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应当不亚于美国在调查洛克比空难上的态度。上次美国使馆被炸，他们的反应是马上轰炸了阿富汗和苏丹，这是美国人对美国人人权的保护，而对于中国人他们绝对没有这样的立场，因此中国只有靠自己来保护中国人的人权。

那么中国的这种要求美国会接受吗？这种正当的要求对两国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我想影响是必然的，美国不会允许别的国家调查它的军

事人员，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美国想当世界霸主，它当然不会痛痛快快地接受国际调查。但并不是说美国不会答应，我们就不要要求。西方国家对于洛克比空难的调查是很好的先例，我们应比照洛克比事件的调查方法提出要求。这也可以检验西方国家到底是不是真的尊重人权。

在轰炸之前，中美关系就因为李文和案、政治献金案等处于不良状态，您认为在这个背景下，轰炸使馆事件对于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

本来期望在美国大选期间改善中美关系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在两党竞选中，它们的核心利益就在于争夺白宫的宝座，至于中美关系，和大选相比绝对是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争夺总统位置的过程中，是否伤害中美关系，这对于两党都不重要。所以我想在这个期间，两党只不过是拿对华政策当作互相攻击的武器，不会真正重视中美关系。美国目前在此事上的态度也会受大选的影响，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候，它们都想表现出对华强硬，而不是对华友好，所以对轰炸事件难以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在后退了，但还看不出会有李登辉访美那样大幅度的震荡，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来。

另外对于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会有什么影响？

中美之间现在不过是在“致力于建设”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并不已经具有了这种关系，我想这件事情肯定使建立这种关系的时间更长。至于 WTO 问题，我长期以来就认为，美国对于中国加入 WTO 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经济考虑，这几年来，每次都是中国基本满足他们要求的时候，美

国又提高了价码。所以在两国政治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中国即使在经济上作再大的让步也很难加入。即使没有轰炸使馆的事件，我都认为中国今年加入 WTO 也是困难的。前几天克林顿积极响应中国加入 WTO，是因为他面临国内新的政治压力；现在政治环境又变了，他很有可能再变调子。所以中国在今年加入 WTO 的困难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

从近几年的中美关系发展看，似乎中国的主动性更强。可从美国的政策上讲，到底把中美关系看作什么？

国际政治斗争除了道德斗争、规则斗争之外，还有更主要的力量斗争，强者总是占上风。从实力讲，中美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所以我们很难在力量的斗争中占上风。第二，从斗争策略讲，较弱一方的斗争策略是不可能与较强一方的一样的。这是实力决定的。第三，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看，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中美关系是它全部外交关系中的重要关系之一，其它美日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对它也很重要；而对其它许多国家来讲，由于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那么与美国的关系就成为它们全部外交关系中最重要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期望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予以像我们一样的重视。就像美国在处理与俄、日、欧的双边关系时都不会像俄、日、欧那样重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具体到这件事情，我想应该在策略上争取主动。而且从道义上讲，中国已经占据完全的主动，美国以及北约是不占理的。策略上的主动性，并不是说中国得理不饶人，而是中国要据理力争，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有人认为，世纪末的这场战争实际在导致下个世纪世界

格局的形成，您认为这件事情对于格局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想这场战争对下个世纪格局的影响将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任何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判断世界格局会怎样都显得为时过早。这场战争我设想有三个结果：一是北约打赢，米洛舍维奇屈服；第二是北约打不赢，米洛舍维奇拒不签署条约；第三是出现像伊拉克那样打打停停的结果。三种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北约打赢，必然会使国际上的军事冲突更加频繁，北约和美国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如果北约打不赢，这场战争失败就可能使北约解体，西方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会变得谨慎；如果出现打打停停的结局，那可能就出现现在伊拉克这种情况，即地区冲突时断时续，但升级的危险不大。所以最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完全要看战争的结果。

还有人认为，这场战争预示着将来北约和非北约国家会形成新的对立格局，而中国和俄国会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在对待这次使馆被炸的态度上，俄国很明显支持中国，您认为是否说明了这种关系正在形成？

首先，我们和俄国不是同盟关系，两国的合作的性质不像北约国家是军事同盟性质。不搞军事同盟是我们国家的外交原则，因为这种同盟关系给我们带来的安全问题多于安全保障。中俄在科索沃问题上会加强合作，但不可能发展成军事同盟关系。而且，说到底，靠军事手段与北约对峙是不现实的。北约国家的军费开支将近 4000 亿美元，全世界所有非北约国家军费开支加在一起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不到。所以靠非北约国家形成同盟对付北约是不现实的。从人类历史上

看，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完全的和平从来没有超过 60 年，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中的间歇，我们努力要做的应该是使这种间歇的时间尽量延长，让战争的时间尽量短一些。

（本文系 1999.5.10 在北京机场对 5 月 8 日我  
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答记者问，《环球时报》  
1999.5.14. 采访记者：宋念申）



## 第二篇

# 中国安全的战略环境



## 一、冷战后中国安全环境变化趋向

自 1989 年冷战结束以来，我国没有卷入任何战争，为现代化建设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那么在 21 世纪的头 10 年，我国能否继续保持与 90 年代相似的国际安全环境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安全问题，绝非我一介布衣所能回答的。加之安全环境的内容十分广泛，绝非一篇文章可以囊括的，因此本文仅就笔者认为对我现代化建设具有宏观战略影响的主要战略安全问题进行分析<sup>①</sup>，以期引发智者们的高见。

### 90 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

要了解今后 10 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势，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变化。这些变化是今后 10 年我国安全环境变化的客观基础，而观察分析这些

<sup>①</sup>对于“战略安全”这一概念有两个基本理解，一种理解为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军事安全，一种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都包括的政治、经济、军事所有内容的安全。本文使用这一概念时采取了折衷的立场，即将“战略安全”定位在国际政治意义的层面，以军事安全为主兼顾具有战略性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本文使用的“战略安全”概念不包括国内政治的政权更迭和政治制度变更等安全问题。

变化过程及原因则是我们预测今后变化趋向的分析基础。

1.我无世界大战及外部军事入侵之虞，但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險则由小变大。美苏争霸曾是冷战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主要危險。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的危險骤然下降，因为这使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小，而只要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没有全面战争，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危險，因此，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国领导人判断：“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sup>①</sup>历史证明，世界战争的危險在90年代里的确没有发生重大变化。90年代初，笔者曾认为，苏联的解体使我国不再面临外部军事的直接威胁，因此我国的安全环境好于冷战时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时期。<sup>②</sup>90年代的历史表明，由于我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外部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我国总体安全环境仍好于冷战时期。

虽然没有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險，但绝对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改善我安全环境。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已难称为是最好的时期了，因为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險已大于9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我国不仅没

<sup>①</sup>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5页。

<sup>②</sup> 阎学通：《试析中国的安全环境》，《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第35页。

有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而且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也很小。当时朝鲜半岛的政治不确定性是使我卷入地区军事冲突最主要的危险。到了 90 年代下半期，在朝鲜半岛的安全不确定性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台湾分离主义已逐渐成为比朝鲜半岛更可能使我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威胁。1996 年我因“台独”问题与美国在台海地区形成军事对峙；1999 年李登辉宣布“两国论”政策，公开走向独立，这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危险又增长了许多。

2. 国际力量结构未改变一超多强的特征，但中美战略矛盾加深使我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国际格局包括了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两个层面。在实力结构的层面，1991 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日本、俄国、德国（或欧盟）的综合实力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其它的地区大国和地区集团的实力就更不可能与美国同日而语了。在 90 年代里，各主要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得最快，俄国实力下降得最明显，日本和德国的实力地位没有重大变化，欧盟为作整体，其实力在近一两年刚显示出增长的苗头。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集团的实力地位的变化，都没有改变 90 年代初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结构。

与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相比，大国的战略关系在 90 年代发生的变化则是深刻的，尤其是中美战略矛盾深化了许多。90 年代初期，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并不十分确定，美国也没有明确的主要战略对手。俄国继承了苏联的核武库和常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对这个冷战时期的最主要对手仍十分担心。日本 80 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经济实力

差距，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冷战后与日本争霸的危险。1991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书断言：“像多数大战一样，尽管各种好意即将到来，但二次美日战争还是要发生。”<sup>①</sup>该书当时曾引起美国政界的普遍关注。此时，美国还担心欧洲一体化会使欧美为了经济利益而走向对抗。1992年美国舆论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sup>②</sup>但美国官方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足以成为美国的现实战略对手。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还表示，一个安全、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是对美国有利的。<sup>③</sup>而到了1995年美国就开始有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当时所说的“如果你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将变成敌人”的名言，反应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sup>④</sup>

到20世纪末，美国与中国、日本、欧洲及俄国虽都有战略性矛盾，但它与中国的战略矛盾最为严重和全面。1996年大国战略关系基本定型，90年代初多极化造成的大国战略关系

<sup>①</sup> George Friedman & Meredith Lebard,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 403.

<sup>②</sup> 罗斯·芒罗：《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

<sup>③</sup>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今天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谈他的中国之行》，新华社华盛顿1994年3月17日英文电。

<sup>④</sup> 吉姆·曼：《美国开始把中国看作潜在的敌人》，《洛杉矶时报》1995年4月17日。

模糊性逐渐消失。<sup>①</sup>美国与日本、欧洲的战略矛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与俄国的主要矛盾是安全方面的，而与中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都有着严重的矛盾。台湾问题、人权分歧、市场准入、武器扩散都已成为中美之间长期很难解决的矛盾。以军控矛盾为例，90年代末中美在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防止导弹技术扩散问题、禁止核材料生产问题，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的矛盾都难于调和。到90年代末，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来对待。美国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中国视为两个潜在的地区或全球竞争者之一。<sup>②</sup>

3.陆地边界安全有所改善,但军事实力差距并没缩小,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不断增加。90年代初,我面临的传统战略安全问题主要是领土安全与军事实力差距。1990年中印双方达成边界减少兵力原则,1991年中俄确定了边界走向但剩下个别岛屿没有解决,1992年与老挝解决了边界分歧,同年与越南达成和平解决边界分歧的共识。<sup>③</sup>90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国又相继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达成边界撤军协议,与印度达成实际控制线的安全合

<sup>①</sup> 90年代中期,北约决定了以俄为对象的东扩战略,日美针对中国出台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此美欧、美日、中俄三大战略关系变得明确。(参见阎学通:《1996-1997 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关系报告》,《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国际形势分析报告》,第4~5页。)

<sup>②</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p.5

<sup>③</sup> 阎学通:《试析中国的安全环境》,《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第35页。

作，与越南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与 90 年代初期相比，90 年代末我西南边界安全状况有了实质性的改善，而其它边界安全状况则改善得有限。

我与美国在某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很大。与 90 年代初期比，我战略武器的质量在 90 年代末有所提高，现已掌握了机动性和穿透能力较强的战略导弹技术，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与美国还不是一个等级的。我短程导弹和低空反弹道导弹能力有了新的发展，但美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比我更大。美不但在海基与陆基的低空反弹道导弹系统上开始做升级准备，而且高空反弹道导弹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与 90 年代初期比，我空军装备有了较大的进步，拥有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新一代歼击轰炸机“飞豹”和苏 27 等，但是装备于部队的新型飞机数量有限，还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规模。海军装备技术比 90 年代初提高了许多，但尚无航母舰队，大规模远海作战能力不足。<sup>①</sup> 总之，90 年代我与美俄在一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总体作战能力上的差距在有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如军队数字化和反弹道导弹等方面。

与 90 年代初比，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了。90 年代初期，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经济情报战、走私、贩毒、跨国犯罪等问题，到了 90 年代末，此类问

<sup>①</sup>此段分析参见《钢铁长城坚不可摧——世界大典阅兵武器巡礼》，《现代军事》1999 年 11 月；《阅兵盛况：中国完整的武器体系大展示》，《国防科技参考》1999 年，第 3 期，第 40~43 页。



题都不同程度地变得更加严重了。以贩毒和走私为例，1991年一年我国查获海洛因 1959 公斤，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 8080 人，<sup>①</sup> 而 1997 年一年查获的海洛因 5 吨多，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 1.6 万多人，登记吸毒人员已有 53 万多人。<sup>②</sup> 1991 年我国查获走私商品价值为 2.04 亿元，<sup>③</sup> 1997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67.35 亿元。<sup>④</sup>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变化是，90 年代初期并不突出的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和信息问题也变成非常现实的安全威胁，而此类问题有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民族分裂和社会性暴力冲突的危险。也就是说，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到了 90 年代末已具有一定的战略安全性质。

#### 今后 10 年安全环境走向

总结 90 年代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的过程，有利于我们预测今后 10 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向，然而要准确预测未来 10 年的变化仍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这里只能对战略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加以评估。总体讲来，今后 10 年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 90 年代，台湾问题、中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全球化的负作用将是我战略安全威胁增长的主要原因。

①何伟：《我国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访国家禁毒委员会秘书长余雷》，《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3月24日。

②吴兢：《去年禁毒工作取得好成效》，《人民日报》，1998年1月21日。

③阎学通：《试析中国的安全环境》，《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第38页。

④《海关去年打私再创佳绩》，《国际商报》，1998年1月19日。

1. 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将使我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險不断增长, 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极小。联合国的会员国从成立之初的 51 个已增加到 1995 年的 185 个, 增长了 3.63 倍,<sup>①</sup> 近年来这个数字还有增长。冷战后, 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势头在欧亚地区呈上升趋势,<sup>②</sup> 欧洲的国家数量已从 1987 年的 36 个增加到 1997 年的 45 个。<sup>③</sup> 今后 10 年这一趋势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而且西方国家公开集体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分离主义活动。这将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公开独立的步伐。台湾当局在 90 年代基本上执行的是变相独立的政策, 但 1999 年 7 月李登辉的“两国论”使台湾当局从采取变相独立政策转向公开独立政策。台湾《联合报》调查结果表明, 在台湾当局变相独立政策支持下, 被调查者中支持独立的人由 1990 年的 6% 增长到 1997 年的 24%。<sup>④</sup> 台湾当局执行公开独立的政策后, 台独势力在今后 10 年的发展速度将可能超过 90 年代, 这有可能使台独势力在 2010 年前成为台湾岛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台独势力发展速度加快, 将从时间上给我和平统一政策造成战略上的困难。

① 李铁诚:《联合国五十年》,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年, 第 327 页。

② 在欧洲有俄国的车臣、英国的北爱尔兰、法国的科西加、南斯拉夫的科索沃、西班牙的巴斯克、亚美尼亚的阿布哈兹、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意大利的帕达尼亚; 在亚洲, 我周边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分离主义的困扰, 导致军事冲突或暴力活动的有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组织、印度的锡克族、菲律宾的棉兰老岛。

③ 参见《世界知识年鉴 1987》,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 第 1~2 页; 《世界知识年鉴 1997/1998》,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第 4 页。

④ 《赞成台独者首度超过统一》, 《联合报》(台湾), 1997 年 7 月 4 日。

李登辉为了使任何继任的台湾领导人都难以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在其辞职前有可能进一步将“两国论”的台独政策用政府文件的方式法律化。李登辉如何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大选”的结果。越是与他在大陆政策上不一致的人赢得选战,李登辉这一步就会迈得越大。如果李登辉迈出这一步,则可能于近期使台湾地区出现军事紧张局势。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逆转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李登辉之后的台湾领导人也不会放弃搞两个中国的“扩大外交空间”的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也必然助长台独势力的发展。台湾的“大选”与美国大选恰巧都在 2004 和 2008 年。时间上的巧合使得台湾和美国的政治气候在选举前向台独势力倾斜,因此 2003 年中期至 2004 年中期和 2007 年中期至 2008 年中期,将成为我国今后 10 年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期。

今后 10 年,中美虽有因台湾独立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避免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大规模军事入侵仍是可能的。冷战时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将核大国卷入其中,但是核战争灾难的威慑力曾有效地抑制了这些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而且也防止了军事大国之间的相互大规模军事入侵。今后 10 年内,只要新军事技术不能使核武器失去这一威慑力,特别是反弹道导弹技术还不能有效地阻挡大规模的核打击,任何地区性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都很小。同样原因,台湾军事冲突使我陷于大规模外部军事入侵的危险也很小。

2.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将增强我战略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中美仍有机会发展消极安全合作。1946—1969 年和

1970—1988 年，我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分别经历了一次 25 年的对立为主和一次 18 年合作为主的历史时期。1989 年起，中美战略关系又进入了对立为主的历史时期。由于今后 10 年内出现一个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中美战略关系对立为主的性质也难根本转变。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 21 世纪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而我国战略目标是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战略目标使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如果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下个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六倍于美国的人口将使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sup>①</sup>然而当中国的 GDP 等于或大于美国的时候，美国就无法继续其世界霸权了。今后 10 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大，这将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更为突显。因此，尽管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将使其与所有的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矛盾加深，但在众多双边矛盾之中，美将把美中矛盾视为最主要的矛盾。在 90 年代，中美政治制度的分歧以及人权斗争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对华主要是施加政治方面的压力。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突显，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的心理会增强，由此其对华施压的政策重点将

<sup>①</sup> 1999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9702 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加拿大等中等发达国家。如果按 GDP 计算，中国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了，这就使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长期战略目标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只有以人均 GDP 为标准才能保证这个长期战略目标有实际含义。而且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应是 21 世纪中期的标准，而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标准，否则只意味着中美实力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

不断向军事方面移动。

美国对华军事压制的政策，将使我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1998年全球军备开支为7450亿美元，<sup>①</sup>而美国一家为2750亿，占了36.9%。根据克林顿1999年国情咨文，美1999年的防务预算为2767亿美元，2000—2005年将增加1120亿美元，其军费总额将超过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五国的军费开支总和。<sup>②</sup>今后10年，美国年军费开支将约为3,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国家或地区，美国军事上的一超地位也将更加突出，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用武力解决战略利益冲突的倾向性将会更强。与此同时，中国坚决反对武力干涉内政。这样，双方在具体的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对立可能会不断发生。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突显，将伴随着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如果美按计划于2007年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导致中美军事对抗的危险。为了牵制中国，美国将继续执行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不断提高对台武器出口水平的政策，以及政治上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这两项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正式独立的步伐，由此将导致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危险的上升。中美军事差距加大，美针对我军事部署增强，以及对台武器出口将必然增加我国防现代化的压力。

<sup>①</sup>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度报告说全球军费继续减少》，法新社斯德哥尔摩1999年6月16日英文电。

<sup>②</sup> 萨本望：《科索沃战争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国际战略研究》1999年，第4期，第5页。

今后 10 年，正是因为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可能会增长，因此两国将更加注重双边的安全合作。安全合作按性质可分为共同对付第三者威胁的积极合作与防止双边发生军事冲突的消极合作。<sup>①</sup> 今后 10 年，亚太地区有潜在军事冲突危险的大国是中国与美国，其它大国间尚看不出有这种危险。因此防止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是防止亚太地区发生区域性大规模战争的根本。目前能防止中美军事冲突的主要机制是靠中美之间的消极安全合作。中美在防止地区性大规模战争上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因此双方都有意愿发展双边安全合作，以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但是由于中美结构性的战略矛盾难以化解，因此双边安全合作的基本性质将是消极合作。

3. 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经济全球化始于工业资本大规模从欧洲流向世界其它地区，19 世纪的殖民主义战争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历程。冷战后东西方两大市场分割状态结束，使冷战时期受阻的经济全球化重新恢复活力。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与冷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相比，其主要区别不是动力性质不同而是速度不同。<sup>②</sup>

<sup>①</sup> “积极安全合作”与“消极安全合作”的概念源于核国家对无核区国家提供的两种安全保障。核国家保证当无核区国家受到核攻击时进行反打击的是“积极保障”，而保证不对无核区国家实行核打击或核威胁是“消极保障”。

<sup>②</sup>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力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资本对全球市场和资源的需求。（参见阎学通：《评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国际经济评论》1998 年第 9-10 期。）

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速度快得令政府们不知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落后，因此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便显得更为严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协议将在 2005—2006 年完成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接轨工作。<sup>①</sup>这意味着我将进入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全球化主流，从而使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下个世纪初也将变得严重起来。除我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外，今后 10 年还会有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今后最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是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因为这两方面的安全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信息安全事关各行各业的保密和正常运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需要开放信息边界和信息产业，这使信息安全越来越依赖技术保证而不是行政手段，特别是依赖于卫星技术的先进性。我国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使我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黑客等多种信息威胁。我国计算机网络包括军用网络，所使用的网管设备和软件基本上是美国 CISCO、3COM、BAY 等公司产品，绝大部分采用 TCP/IP 协议，微机芯片都是 INTEL 的 P 系列，软件基本上是 WINDOWS 和 NT。<sup>②</sup>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计算机网络的安

<sup>①</sup> 《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就世贸组织问题与中国谈判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节选)》，《背景材料》(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 1999 年 11 月 8 日，第 3—6 页。

<sup>②</sup> 张银福、焦彦平：《关于我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中的几点思考》，《国防科技参考》1999 年第 2 期，第 20 页。

全,最近已发现在 PⅢ 芯片的计算机上运行 WINDOWS98 就出现自动定期收集信息的现象,因此有人认为我国的计算机网络是易窥视和易打击的“玻璃网”。<sup>①</sup>

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将可能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全球化将给所有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带来风险,给金融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带来的风险就更大。1997 年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的战略打击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导致国家分裂、种族暴力冲突、经济实力萎缩、国际地位大幅下降。参加世贸之后,我金融体制需要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其传统的行政手段将难以抵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当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其对我经济产生的冲击将更为强烈和更为直接,将构成一种战略性的安全威胁。

今后 10 年,虽然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更加严重,但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仍将是次要的。卷入战争的危险越大,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就越下降,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传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基础。只有在军事威胁下降,和平环境有了基本保证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才会上升。<sup>②</sup>今后 10 年,虽然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更加严重的趋势,但由于我传统安全问题变得严重,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如果我被迫卷入地区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但仍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其重

<sup>①</sup>张银福、焦彦平:《关于我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中的几点思考》,《国防科技参考》1999 年第 2 期,第 20 页。

<sup>②</sup>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57 ~ 68 页。



要性有下降的可能。

### 争取基本安全的思考

争取较好国际安全环境有两种基本策略，一种是预防性的策略，一种是对抗性的策略。预防性策略侧重于防止军事冲突或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发生，而对抗性策略则侧重于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综合国力在今后 10 年仍处于地区强国的水平上，因此预防性策略宜为我安全战略的主导方面。

1. 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重视威慑战略的研究,有效地抑制冲突的发生。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但是不同内容的国力在提高国家战略安全上的作用不同。防止卷入战争,为四化建设争取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主要还得靠军事力量来实现。鉴于今后 10 年的传统安全环境将不如 90 年代,因此有必要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减慢局部战争危险上升的速度。中美国防支出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我 10 年内有效缩小中美军事装备差距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新战略战术的研究与发明,则可以较大幅度地弥补实力上的差距,这也是以弱胜强战例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国防现代化应强调武器研制与战略战术研究并重,特别是应重视符合我国装备水平以弱打强的战略战术的研究。鉴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是加速局部战争危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军各建设和战略战术研究应以争取在台海局部地区的军事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争取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军事优势。威慑的效力由实力与决心两者共同构

成，但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后者的作用就更为重要。鉴于目前威慑台独势力的效力最主要取决于台独分子是否相信我将不惜以武力的方式阻止台湾独立，因此我需要加快威慑战略的现代化，使台独分子能亲身体会到我统一祖国的决心。为促使美国采取与我合作的政策，避免在台海地区发生战事，我国防建设应以确保有效的最低战略威慑为标准。

2. 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争取较好战略安全环境不能只靠国防现代化，改善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至关重要。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有效地增强政策信任，避免两国兵戎相见。目前与我双边政治关系还不足以确保无战事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五个国家。除美国外，其它四国如无美国军事支持也不会轻易与我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我非常需要考虑如何发展与美国在地区安全合作上的关系，如何通过多种形式的安全合作以减少美国对我施加军事压力的动机，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除积极参与现有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之外，我也可考虑开展东亚次区域的安全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东亚国家独立的区域安全意识，增强相互之间的安全信任。有关中美日俄四国安全论坛的问题也有值得考虑的一面。因为是四方论坛，与会各方都会有相应的独立立场，日本也不会采取完全跟随美国的自我矮化的政策。如果四大国能在地区集体安全上有所合作，即使是消极合作，也将有助于减弱日美同盟对我构成的战略压力。

3. 加快战略经济部门的体制改革，增强我经济体系的竞争力与抗危机能力。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所面临

的安全问题源于多种原因，但目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经济体系本身竞争力不强和抗危机能力不适于开放式的经济。要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我需要加快信息、金融等战略经济部门的改革。首先需要加大这些部门的国营企业间的竞争力度，如果国内没有竞争练习，则无法寄望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二是要扶植民营企业进入这些战略经济部门，从三方面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1)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后，可以成为国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之前的国内竞争练习对象，帮助国营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学会竞争。(2)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可以加快这些部门的社会化速度，扩大我国的战略经济部门的实力。军事研究人员认为，社会信息化是信息战的基础。<sup>①</sup>美国就是通过军转民的方式发展起因特网的，而因特网又使美国主导了世界计算机网络。(3)民营企业进入战略经济部门，可分散国营部门风险压力。在危机发生时，民营企业将与国家共危难，共同承担危机压力。

## 结 论

由于本文分析认为今后 10 年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不如 90 年代，因此笔者认为争取较好安全环境仍应是我国今后 10 年的重要战略任务。虽然台湾分离主义、中美结构性矛盾

<sup>①</sup>张银福、焦彦平：《关于我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中的几点思考》，《国际科技参考》1999 年第 2 期，第 20 页。

及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对我今后 10 年的安全环境都有重大影响，但三者所起的作用不同。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我安全环境恶化的根本，台湾分离主义只是增强了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而经济全球化不过使我面临一些不熟悉的安全问题。客观的国际安全环境是不易改变的，特别是那些根本性的原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今后 10 年的安全战略目标不宜定得过高，以我安全环境不出现重大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而且这有利于我安全战略更符合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2 期）

## 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东北亚安全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也是中美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使中美安全专家之间的讨论更具有建设性,本文就TMD的有关问题加以分析,并论证为何TMD计划会破坏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鼓励发展预先打击能力,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以及为何如果台湾被排除在TMD计划之外,或是美国内政原因推迟TMD的部署将有利于降低上述危险。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导弹防御体系的性质,论证TMD既可以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第二部分探讨东北亚地区有关各方(美国、日本、台湾、韩国、朝鲜、俄国和中国)的TMD政策和立场,并从各方的资源及军事战略的角度分析它们的立场。第三部分分析在东北亚地区部署TMD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如增加中美之间和中日之间的不信任,加剧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给防扩散造成障碍等。笔者认为,尽管TMD将导致如此之多的危险,但美国继续研制TMD是不可避免的。

### TMD的武器性质

顾名思义,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性质应是防御性的,但事实上这种武器系统同样威胁他国的安全。为了解释这一点,

我们需要区分 TMD 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 的不同, 以及与反战术弹道导弹 (ATBM) 的不同。由于 NMD、TMD 和 ATBM 所防御的地理范围大小是不同的, 因此它们的战略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别。从广义上讲, NMD 是用于保护整个国家的, 其地理防御范围由国家的领土面积的大小来决定。TMD 是用于整个战场防御的, 其防御的地理范围约在直径几百公里之内。ATBM 也称为点防御体系 (PD), 是用于防御机场、海港、指挥控制中心等方圆 50~60 公里的较小地理范围。由于三种导弹防御系统所防御的地理范围不同, 因此它们对国际战略安全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部署 TMD 系统将破坏大国间的相互威慑力, 刺激战略核武器的增加。1972 年美国 and 苏联曾签订《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 这是美苏和美俄军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 该条约长期保持了这两个核超级大国间的战略稳定。TMD 将破坏 ABM 条约的作用。

点防御系统是由美苏在冷战时期就研发了的武器系统。这种武器可以提高一国的军事能力, 但没有战略影响力。目前, 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都部署了此类武器系统。美国陆军部署了改进型的爱国者-2 型 (PAC-2), 海军装备了标准-4。俄国部署了被认为是比其它各国所部署的反导弹系统都先进的 S-300 系统,<sup>①</sup>但估计有可能被美国正在研

<sup>①</sup> Bates Gi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U.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 DISCUSSION PAPERS,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97, p. 7.

制的爱国者-3型所超过。80年代中期，中国曾成功地试射了红旗-2型导弹拦截器。<sup>①</sup>一位中国导弹专家预测，中国在下世纪初将拥有反巡航导弹和反战术弹道导弹的武器。<sup>②</sup>日本军队已经部署了宙斯盾或标准型的反导弹系统。<sup>③</sup>韩美联军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部署了爱国者-2型。台湾从美国进口了爱国者-2型的技术，在此基础上研制了天弓-3型反弹道导弹系统。<sup>④</sup>

冷战后，美国注重 TMD 的研制工作。美国的 TMD 主要包括三种拦截系统：低层防御系统，即原先设计用于点防御的爱国者-3 和标准-4；高层防御系统，即海军战区范围防御系统（NTWD）和战区高层防御系统（THAAD）；助推段拦截系统，即空中激光武器系统（ABL）。仅有低层防御系统是无法防御整个战区的，但是加上高层拦截系统就有能力拦截战略武器了。THAAD 和 NTWD 的目标就是拦截进入大气层速度在每秒 5 公里的来犯导弹。为了确保这个能力，这些武器系统的实际设计能力都一定会超过这个标准。这意味着 THAAD 和 NTWD 最终的实际能力是可以拦截来犯的战略导弹的。此外，这些系统所防御的地理范围可以大到与一个小国领土相等。虽然 THAAD 和 NTWD 防御范围不能覆盖美国、中国、俄

① 孙雅莉：《中国地空导弹发展访谈录—访地空导弹专家王和平大校》，《兵器知识》1998年10月，第3页。

② 同上，第4页。

③ “US-Allied CoOperation”，MISSILE DEFENCE，（[www.cidss.org/coopt.htm](http://www.cidss.org/coopt.htm)）。

④ Wyn Bowen and Stanley Shepard，“Living Under the Red Missile Threat”，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December 1996，p.56.

罗斯这种大国,但如果将这类系统部署在一个小国,这种防御体系对他国所构成的战略威胁就和 NMD 一样了。

### 1. TMD 技术的进攻性

TMD 的技术特性使其可以用于进攻性的军事目的。TMD 和 NMD 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主要用于保护战场上的作战部队,后者主要用于保护本国领土上的平民。TMD 可以跟随作战部队部署在世界各地。当 THAAD 和 NTWD 用于保护平民时,它们是防御性武器,但当将这些武器部署在国外前线保护攻击他国的作战部队时,它们就成了进攻性武器。

无论是 NMD 还是 TMD 或是 PD,它们的反导弹技术都是以导弹技术为基础的。例如,TMD 系统主要是用导弹拦截导弹。反弹道导弹武器的这个基本特征使它们与反坦克壕、防空洞、地雷等其它的防御性武器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弹道导弹与 TMD 系统的基本构成部分是相似的,都包括了推动系统、制导系统和弹头。TMD 系统与弹道导弹的主要区别是弹头的不同。弹道导弹一般装有重量爆炸弹头,而 TMD 的弹头使用的则是轻量爆炸或是非爆炸技术。例如,TMD 的动能弹头就是靠撞击而不是爆炸来摧毁目标的。除了弹头技术之外,TMD 其它部分的技术都可以用于进攻性弹道导弹。例如,TMD 的制导系统使用的是红外技术追踪目标,这种技术也可以用于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TMD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用于提高攻击性导弹的性能。例如,可以击毁以每秒 5 公里速度进入大气层目标弹的拦截器的技术,可以用来提高攻击性导弹的制导精度,增强其对在地面、水上或空中运动速度低于这个速度的航行器的打击能力。



由于 TMD 技术的价格高于一般攻击性导弹的价格，因此人们不愿将 TMD 技术用于攻击型导弹。例如，TMD 的拦截技术比一般攻击性导弹要复杂得多，因此其价格也要昂贵得多。但是如果不计较成本或是技术进步使 TMD 的技术成本下降，人们仍会将 TMD 的技术应用于攻击性导弹。此外，没有先进导弹技术的国家，如果获得了 TMD 的技术，就很可能将 TMD 技术用于提高其攻击性导弹的技术水平。

## 2. 战略影响的重要性

TMD 是攻击性武器整体系统的一部分。武器的基本特征是由整个武器系统和军事战略决定的。例如，坦克的外壳是纯防御性的，但它是攻击型武器的一部分。同此道理可以用于 TMD。低层的海军 TMD 拦截器为改进型的标准-2，是装备在驱逐舰和巡洋舰上的。<sup>①</sup>这个例子说明，海军 TMD 拦截器只不过是驱逐舰和巡洋舰的一部分，而驱逐舰和巡洋舰是可以作为进攻性武器的。一般讲来，武器是攻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主要由使用武器的目的来决定。

如果从政治角度观察，TMD 的武器性质是攻击性还是防御性就更有争议了。理论研究者早就发现，区别武器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是很困难的。<sup>②</sup>所有的武器和武器技术都是中性的。它们既可能用来攻击也可以用于防御。例如，计算机的本质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于导弹也可以用于卫星。一挺

<sup>①</sup> John Pike,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Programs: Status and Prospects", ARMS CONTROL TODAY, September 1994, p. 13.

<sup>②</sup>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XXXX, No. 2, January 1978, pp. 186 - 187.

简单的机关枪，既可以用来保卫自己的领土也可以用来侵占他国的领土。复杂的 TMD 技术可以用于两种不同的目的，是攻击还是防御完全取决于它保护的是什么。如果它用来保护对他国进行攻击的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它就是攻击性武器。尽管部署 TMD 的国家宣称其 TMD 只用于防御目的，但是被 TMD 所瞄准的国家却没有把握使 TMD 的目的不会改变。

### 对 TMD 的政策立场

是否研制和部署 TMD 的政策由两个因素决定，(1) 是否具备研制 TMD 的经济资源与技术能力；(2) TMD 对一国安全战略是否有效。目前美国是最可能在东北亚地区部署 TMD 系统的国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有关各方对美国部署 TMD 的政策立场及这些政策立场是如何受到这两个因素影响的。

#### 1. 现行政策

以往 15 年里，美国已经花费了 400 ~ 500 亿美元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的研制。<sup>①</sup>预计 TMD 第一阶段的部署计划于 2005 年完成，这一阶段的费用将超过 200 亿美元。<sup>②</sup>近来的报导说，美国每年用于导弹防御的费用在 30 亿美元左右，其中绝

① John Pik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s the U.S. 'Rushing to Failure'?", 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1998, p. 9.

② Virginia Sheng, "US Missile System May Reinforce ROC's Defense", THE FREE CHINA JOURNAL, October 9, 1997.

大部分用于反弹道导弹的开发与部署。<sup>①</sup>1999年美国国防部决定,在其后的6年里增拨66亿美元用于TMD的研制与部署。<sup>②</sup>

日本一直记着80年代与美国一起研制FSX战斗机的教训,<sup>③</sup>因此到1998年日本一直对是否参加美国的TMD计划犹豫不决。日本担心投入了大笔资金却不能从联合研制中获得TMD的关键技术。<sup>④</sup>1994—1998年日本只拨了420万美元进行TMD的可行性研究。1998年8月朝鲜试射了一枚三级火箭后,日本政府才决定加入美国的TMD系统,要求国会拨款5~10亿日元(约370~740万美元)用于1999年的TMD研制,200~300亿日元(约1.48~2.22亿美元)用于其后5年的研制工作。<sup>⑤</sup>

台湾是非常欢迎美国国会把台湾纳入美国TMD防御体系的建议的。1997年9月30日,美国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要美国政府向台湾转让技术,帮助台湾建立自己的导弹防

① US-Allied Cooperation”, MISSILE DEFENCE, ([www.cdiss.org/coopt.htm](http://www.cdiss.org/coopt.htm)).

② “Pentagon Shifts on Missile Shield”,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1, 1999.

③ 美日曾于80年代共同研制FSX战斗机。由于美国控制着关键技术,日本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没有得到技术上的回报。

④ “Japan Postpones Joint Missile Defense Study with U.S.” . AEROSPACE DAILY, August 26, 1998.

⑤ Kensuke Ebata, “Japan Joins USA in Theatre Missile Defense Research”, ACADEMIC UNIVERSE, September 30, 1998.

御体系。台湾当局于次日立即表示支持这个建议。<sup>①</sup>台湾虽然已经决定购买美国 TMD 低层防御系统，但还在研究是否购买美国 TMD 高层防御系统。<sup>②</sup>台湾参加美国研制 TMD 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如果台湾无法进口全套的 TMD 系统，台湾则希望购买美国的 TMD 技术。

韩国对于美国的 TMD 计划采取了中立的立场。美国多年来劝说韩国参加美国的 TMD 工程，但韩国就是没有兴趣。<sup>③</sup>虽然韩国不想加入美国的 TMD 工程，也不想在其国内部署 THAAD，但韩国也不反对美国的 TMD 计划。

朝鲜坚决反对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部署 TMD。美国与日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的 TMD 系统就是用来对付朝鲜的导弹的。因此朝鲜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把美日的 TMD 计划视为帝国主义对其进行军事威胁的武器。

俄罗斯本来不情愿允许美国进行 TMD 试验。1999 年以前，俄罗斯官方没有公开反对美国的 TMD 计划，主要是因为 1997 年它与美国就新的限制反弹道导弹试验标准达成了协议，认可新的标准不违反 ABM 条约，允许进行 TMD 的试验。<sup>④</sup>但是，俄罗斯的官员和专家私下里一直都在报怨美国

① Virginia Sheng, "US Missile System May Reinforce ROC's Defense", THE FREE CHINA JOURNAL, October 9, 1997.

② 《唐飞：飞弹系统政策不会突变》，《联合报》(台湾)，1999 年 2 月 2 日。

③ "US Urges S Korea to Buy Patriot Over S - 300V". JANE'S DEFENCE WEEKLY, April 16, 1997, p. 3.

④ 这项条约的核心内容是，1. 拦截器在任何飞行段的速度都不得超过每秒 3 公里，2. 弹道目标弹在任何飞行段的速度都不能超过每秒 5 公里，3. 弹道目标弹的射程不得超过 3,500 公里。

强迫俄罗斯修改 ABM 的试验限制标准，他们认为修改 ABM 的试验限制标准实际上使美国可以合法地进行 ABM 系统的试验。<sup>①</sup> 实际情况是，美国在与俄罗斯磋商修改试验限制标准之前就已经着手试验工作了。不晚于 1990 年美国休斯公司和波音公司就开始了 TMD 的研制工作，当时的计划是在 1998 年中期进行实弹试验。<sup>②</sup>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 1997 年时急于要放松 ABM 条约对反弹道导弹试验的限制标准。实际上，在美俄达成修改试验限制标准协议之前，美国已经秘密进行了 7 次 THAAD 的飞行试验，1996 年美国曾声明 THAAD 的试验和部署“可以不受 ABM 的任何限制”。<sup>③</sup> 俄罗斯虽并不想修改 ABM 条约的试验限制标准，但它没有其它的选择余地。因为，如果美国退出 ABM 条约，它将不再受任何其它国际条约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 NMD 试验。当 1999 年初，美国提出再次修改 ABM 条约时，俄罗斯意识到，进一步修改 ABM 条约与美国退出 ABM 条约将没有根本区别，因此俄开始公开反对美国的 TMD 计划。

① Pavel S. Zolotarev, "Russia's Official Reaction to the Moscow memorandum and to the Idea of LNWFZ-NEA"—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4<sup>th</sup> Meeting of Expanded Senior Panel on Limited Nuclear Weapon-Free Zone in Northeast Asia, at Helsinki, October 12 - 14, 1998, p. 4

② 1990 年，波音公司与政府签订了一个陆基外空动能拦截器的合同。根据合同将于 1998 年中期进行动能拦截器的试验。同时休斯公司也与政府签订了同样的合同，只是试验的时间不同。“Ground Based Interceptor (GBI)/Exoatmospheric Kill Vehicle (EKV)”, ES&MD, Boeing Web-site, boeing.com/defense-space/space/ekv.

③ George Lewis and Theodore Postol, "Portrait of a Bad Idea",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uly/August 1997, p23.

中国反对美国的 TMD 计划。中国认为 TMD 是美国政府 80 年代提出的星球大战的变种。早在 1985 年,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反对在外空部署武器。<sup>①</sup>他还建议中国与欧洲共同反对星球大战计划。<sup>②</sup>中国不断反对 TMD,特别是反对美国在台湾部署 TMD 或向台湾提供 TMD 技术的计划。中国认为美国这样做将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sup>③</sup>1972—1982 年,中美达成的三个公报都将美国承担减少对台湾武器出口的责任作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中国还认为美国发展 TMD 将促进导弹的扩散。<sup>④</sup>

## 2. 影响 TMD 政策的因素

武器发展历史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即新武器的设计总是以克服已有武器的能力为目标的。当一种新武器发明之后,这种新武器就成了下一轮武器设计所要克服的目标。TMD 计划也不可能摆脱这一循环。目前的情况是,只有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 TMD 的研制中处于领先地位。笔者认为东北亚地区有关各方的 TMD 政策立场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1)是否拥有用于 TMD 或 NMD 研制的经济和技术资

① “Deng Xiaoping Criticizes Space Arms Race”, BEIJING REVIEW, September 16, 1985, No. 37, 0.10

② “Deng Blasts ‘Star Wars’”, BEIJING REVIEW, October 14, 1985, No. 41, P. 10.

③ Zhao Huanxin, “US Anti-China Defense Clauses Opposed”, CHINA DAILY, October 7, 1998.

④ Chen Yanni, “US Missile Systems Violating Agreements”, CHINA DAILY, January 22, 1999.

源；(2)TMD 系统对它们的安全战略是否适用。尽管东北亚各种力量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导弹防御的研制工作，但是它们对于部署 TMD 系统的政策仍有着重大的区别。依据上面两个因素，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台湾、日本和美国在 TMD 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图 -1 TMD 政策的基本条件

|        | 有资源      | 无资源   |
|--------|----------|-------|
| 适用于战略  | 美国、日本、台湾 | 朝鲜    |
| 不适用于战略 | 韩国       | 中国、俄国 |

中国反对 TMD 的原因是，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及其反击战略，即第二次打击战略。今后 50 年中国将继续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其战略目标。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采取了反击战略而不是预先打击战略，而且中国强调国防现代化要服从于经济现代化。<sup>①</sup>从经济角度讲，中国认为 TMD 系统的研制将耗费大量本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从军事角度看，TMD 不适用于中国的反击战略，因为反击战略是建立在第二次打击能力上的。保护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方法很多，包括点防御系统在内，很多方法都比 TMD 系统的成本低、技术要求低。<sup>②</sup>

俄罗斯的反 TMD 政策也是由其经济资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决定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严重衰退。根据世界

①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CHINA DAILY, July 28, 1998.

② 点防御是指对军事设施的反导弹防御，其防御范围远小于 TMD 的防御范围。

因素决定的。虽然韩国自己没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研制 TMD,但是它可以参加美国的 TMD 工程,享受美国的研究成果。然而 TMD 技术本身却不能满足韩国的安全战略要求。汉城离三八线只有 40 公里,使得汉城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因此导弹防御体系不适于韩国的安全防御。而且, TMD 的设计能力本身也无法为汉城提供阻止朝鲜导弹攻击的保障。如果朝鲜将飞毛腿-B 型导弹部署在三八线一带,对汉城发动突然攻击,根据笔者的计算,其飞行时间将短于 TMD 的预热、反应、升空、拦截所需要的时间。这意味着在汉城周围部署 TMD 是无法对付朝鲜导弹的突然袭击的。由于部署 TMD 并不能增加汉城的安全保障,因此韩国对购买美国的 TMD 系统没有兴趣。

美国的 TMD 政策是与其总体安全战略及其殷实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一致的。美国的国防开支占世界首位,其年国防开支比东北亚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大。1997 年,其国防开支为 2729 亿美元,约为日本的 7 倍、俄罗斯的 16 倍、中国的 7.7 或者 27.5 倍。<sup>①</sup>从军事战略角度看,美国采取的是预先打击战略,即不管是否受到别国攻击,美国都要首先打击他国,如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就是发动了预先军事打击。在使用预先打击战略的情况下,TMD 可以减少美国军队因对方进

<sup>①</sup> 国外估计中国的国防开支比官方的数字大 3~4 倍。因此按官方的统计差距为 27.5 倍,而按国外的估计则差距为 7.7 倍。本文军费开支差距的计算是依据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7/9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5 和 SIPRI YEARBOOK 1998—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7~221.



银行的统计,1997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928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6.4%。<sup>①</sup>俄政府已无法保证正常发放军队的薪金,就更没有能力研制和部署TMD。如果实施了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裁减协议,俄国陆基多弹头导弹将被拆除。为了防止其战略能力进一步衰退,俄罗斯将侧重于发展Topol-M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sup>②</sup>而且俄罗斯最主要的国家安全问题是国内安定问题而不是外部威胁。因此,俄罗斯的安全战略变得很内向化。这种变化使TMD系统既不符合俄罗斯安全的需要也不符合其总体安全战略的需要。

朝鲜的TMD政策主要受其经济和技术资源的限制。1998年和1999年,美国分别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进行了空中打击,这使朝鲜很有必要发展TMD系统。1998年末,华盛顿安全官员和政策分析家们讨论了轰炸朝鲜可疑核设施的可行性。<sup>③</sup>因此,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讲,拥有TMD技术是有助于提高朝鲜的国防安全的,但是朝鲜没有财力研制和部署TMD。朝鲜的军事开支是不公开的,外国的研究机构认为,朝鲜国防开支大约只有韩国的三分之一。<sup>④</sup>

韩国TMD的政策主要是由TMD不适于其安全战略这一

① World Bank, DEVELOPMENT DATA 1998. (www.worldbank.org)

② David Hoffman, "A Russia Missile Exploded in Te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6, 1998.

③ 1998年11月30日至12月7日,笔者访问了华盛顿的一些单位,包括五角大楼、参议院外委会、布鲁金斯研究所。座谈中美方人员不断地问,如果美国轰炸朝鲜可疑的核设施,中国将如何反应。

④ Institute of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7/9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5.

行反击而造成的伤亡。这种现实使中国及其它国家认识到 TMD 已经成为美国在地区冲突中实施预先打击战略的一部分。

虽然日本的军事开支仅次于美国，但日本还没有美国研制 TMD 的那种经济和技术资源。不过，作为美国在东北亚最主要的军事盟友，日本可以参加美国的 TMD 工程，与美国分担研制成本，分享研究成果。根据日本宪法，“作为主权国家，日本人民放弃战争权利和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权利。”<sup>①</sup>专家们认为，从防御的角度讲，点防御体系足够日本应付朝鲜导弹，<sup>②</sup>因此 TMD 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日本纯粹的防御战略。然而，1997 年美日达成的防务合作指针要求日本在美国进行战争时提供军事支持，包括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冲突中提供军事支持。表面上，日本政府是在 1998 年朝鲜发射的火箭穿越了日本上空后才同意加入美国 TMD 研制计划的，<sup>③</sup>而实际上，朝鲜的导弹能力不过是日本用于发展 TMD 的借口。中国认为日本加入美国 TMD 的动机其实是准备卷入台湾海峡地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因为 1997 年 9 月美日两国签署了新防务合作指针。目前，一些日本人已经开始考虑实行预先打击战略。例如，一位退役的日本将军辩解说，如

① Kyoko Inoue, *MACARTHUR'S JAPANESE CONSTITUTION--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TUDY OF ITS MAK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275.

② 周云华：《战区导弹防御与全球和地区安全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28 页。

③ “Japan Joins USA in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Research”, *ACADEMIC UNIVERSE*, September 30, 1998.

果外交手段不能使朝鲜放弃拥有弹道导弹，轰炸朝鲜导弹基地以摧毁其导弹能力的作法将是不违背日本宪法精神的。<sup>①</sup>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也声称这种行动是符合宪法的。<sup>②</sup>尽管日本政府近来否定了预先打击战略的建议，但这种建议的出现就足以说明问题。而在冷战时期，日本如果讨论是否应采取预先打击战略则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台湾的 TMD 政策看上去似乎与其资源和安全战略不相符。1997 年台湾的军事开支为 2620 亿新台币（约 90 亿美元），比韩国的 16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还少。<sup>③</sup>然而，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使台湾可以搭美国 TMD 的便车。台湾的安全战略主要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而不是其自身的军事能力。就技术而言，TMD 系统对提高台湾军事防御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实际上，台湾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参加美国的 TMD，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关系，而不是提高其本身军事能力。台湾领导人获得 TMD 的另一目的是内政需要，想以此向岛内的选民显示其有能力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

① Toshiyuki Shikata, CAN JAPAN TAKE THE LEAD TO LIMIT NUCLEAR WEAPONS?, p.7. 提交给 1998 年 10 月 12 - 14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东北亚有限无核区高级研讨会第 4 次扩大会议”的论文, 第 7 页。

② “New Defence Rhetoric, Actions Dangerous”, CHINA DAILY, March 12, 1999.

③ SIPRI YEARBOOK 1998—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18.

## TMD 的政治后果

研制 TMD 的影响远远超过对武器发展的影响，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关系要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 1. 增加中美的相互猜疑

TMD 加剧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苏联的解体使中美失去了原来的战略合作基础，同时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使美国的战略家们担心。美国国防战略家们认为，中国是美国在 21 世纪的潜在全球竞争对手。<sup>①</sup> 中国则认为美国是破坏其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外部因素。中国官方的国防政策认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冷战思维及其影响还有一定市场，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给国际安全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有的国家依仗军事优势对他国进行军事威胁，甚至武装干涉。”<sup>②</sup> 中国认为美国的 TMD 系统将从政治和战略两方面破坏中国统一台湾的事业。当美国 1998 年的综合拨款法与 1999 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将台湾纳入美国 TMD 的计划之后，中国谴责美国这两个法干涉了中国的内政。<sup>③</sup> 而中国反对美国 TMD 的政策又使美国怀疑中国

① William S. Cohen,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997), p. 5

②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CHINA DAILY, July 28, 1998.

③ Ma Chenguang, "Resentment Expressed on Anti-China US Bills", CHINA DAILY, October 30, 1998.

要用武力统一台湾。

美国的 TMD 计划使得中美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上的合作变得困难。中国一直批评美国在大规模杀伤武器出口的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因为美一直对台湾出口此类武器。中国认为战斗机和导弹一样都是运载工具，都可以携带导弹并对 300 公里以外的目标进行攻击。美国向日本和台湾转让 TMD 技术的可能性，使中美难以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特别是在中国尚未加入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上的合作。

## 2. 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由于在台湾部署 TMD 会加强岛内分离主义势力宣布独立的政治决心，因此在台湾部署 TMD 有可能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96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包括发射导弹的军事演习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已无法再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能力攻打台湾为由蛊惑人心了。如果在台湾部署了 TMD 系统，分离主义分子则又可以用大陆没有武力统一的军事能力为由鼓动台湾正式独立。这些分离主义势力可以把美国对台军售解释为美国对台湾独立的安全保障，因此他们可以向台湾民众许诺独立是安全的。台湾越认为 TMD 系统可以保护台湾免受导弹攻击，台湾就越可能走向正式独立。中国大陆不断表明它有权以武力方式实现统一。因此，TMD 越是激发台湾正式独立的势头，台湾海峡就越可能出现军事冲突。

## 3. 加剧中日的不信任

有两个原因使中国怀疑日本加入美国 TMD 计划的动机。

首先是日本的 TMD 计划有可能与日本卷入台湾海峡的潜在军事冲突有关。根据 1997 年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当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时两国将进行军事合作,日本自卫队将采取行动为日本周边地区的航行提供安全保障。<sup>①</sup>如果美军在台湾海峡卷入军事冲突,日本可能向美国海军或空军提供后勤支援。从理论上讲,TMD 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日本提供防止导弹攻击的保障。其次是日美联合进行 TMD 的研制计划可以被用来促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中国一直关注着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担心 TMD 会给日本鼓吹军事强国分子一个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的借口。专家们估计,如果日本进行实质性的 TMD 研制工作,日本用于 TMD 开发的资金将超过 150 亿美元,这相当于日本 90 年代的年均国防开支的 37.5%。<sup>②</sup>此外,中国还担心前面所讨论过的 TMD 技术可转用于攻击性导弹的问题。日本获得 TMD 技术后有可能用于增强日本的军事进攻能力。

#### 4. 给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造成障碍

美国的 TMD 计划将给东北亚地区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合作制造障碍。首先, TMD 计划将破坏“导弹及其控制制度”(MTCR)的实施。MTCR 的目标是控制能将 500 公斤

① COMPLETION OF THE REVIEW OF THE GUIDELINES FOR U. S.-JAPAN JOINT STATEMENT U. 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ND THE GUIDELINES FOR U. 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New York), September 23, 1997.

② Kensuke Ebata, "Japan Joins USA in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Research" . JANE'S DEFENSE WEEKLY, September 30, 1998.

重的弹头运载到 300 公里以外的导弹技术的扩散。然而, 根据 1997 年美俄达成的条约, **THAAD** 拦截器的速度是每秒 3 公里,<sup>①</sup> 只要修改有关软件, 这一速度实际上就可以使 **THAAD** 将一枚弹头运送到 600 公里以外的地方。<sup>②</sup> 由于所有的实际设计都是超标的, 因此 **THAAD** 的实际运载能力还将超过这个标准。如果允许美国向日本和台湾转让 **TMD** 技术, 那么该地区就无法认真执行 **MTCR** 的规定。其次, **TMD** 将给导弹出口国一个很好的转让导弹技术的借口, 它们可以说出口的导弹技术是用于防御系统的。而实际上, **TMD** 技术可转用于进攻性导弹的这一特点, 使专家们无法区分一个导弹运载技术是用于攻击性导弹还是防御性导弹。

## 结 论

依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1. 部署 **TMD** 系统将破坏东北亚地区大国间的安全合作。从双边讲, **TMD** 问题将使中俄对与美国进行安全方面的合作犹豫不决。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是一种消极安全合作, 目的在于防止两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从而防止东北亚地区发生

① “First Agreed Statement Relating To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 of May 26, 1972”, *ARMS CONTROL TODAY*, September 1997, p.21.

② Zou Yunhu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atre Missile Defense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1, 1998, p.28.

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它们之间进行的积极安全合作是为了防止其它国家间的军事冲突的，这种合作可以阻止该地区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升级。美国的 TMD 计划将破坏两国之间的任何积极安全合作。TMD 问题还将使俄罗斯不情愿开始第三阶段的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任说：

“与美国继续达成裁减战略武器的协定对俄罗斯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因此，在此种情况下，俄罗斯卷入一场没有经济利益但却可能使俄失去核潜力的“裁军竞赛”是毫无意义的。<sup>①</sup>

从多边上，TMD 工程将加剧中国、日本、美国之间的不均衡战略关系，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它们之间的三边安全合作。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使得中美日三方在三边安全对话处于不均衡的地位。TMD 计划加强了日美间的同盟，使日本更可能卷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美国官方文件把美日军事同盟视为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而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对地区安全的一种帮助。<sup>②</sup>只要中国被排除在美日 TMD 计划之外，中国就自然被认为是美日同盟针对的靶子，是美日的共同敌人，中国也因此必然对中美日三边安全对话采取谨慎的态度。

2. 把台湾排除在美国的 TMD 计划之外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小 TMD 对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东北亚地区最反对 TMD 的国家，其反对 TMD 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台湾的分裂

<sup>①</sup> Pavel S. Zolotarev, "Russia's Official Reaction to the Moscow memorandum and to the Idea of LNWFZ-NEA", 提交给 1998 年 10 月 12-14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东北亚有限无核区高级研讨会第 4 次扩大会议”的论文，第 1 页。

<sup>②</sup>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October 1998, pp. 42-43



问题，其中包括了担心部署在日本的 TMD 用于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中国的防扩散政策首先考虑的是那些与自己安全环境直接有关的问题。如果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 TMD 计划之外，这将有助于减少中美、中日之间的相互猜疑。如果 TMD 问题不成为台湾问题的一部分，TMD 问题对地区安全的破坏作用会小得多。

3.从长远的角度看，TMD 计划将导致东北亚地区出现军备竞赛，但近期还不致发生。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以及 TMD 系统的昂贵造价，决定了 TMD 计划不会马上引起地区军备竞赛，特别是目前东北亚国家刚刚摆脱金融危机。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将会被 TMD 拖进军备竞赛。首先，在美国、日本、台湾为 TMD 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后，中国和俄罗斯将被迫发展它们自己的 TMD 系统。其次，由于 TMD 的最大弱点是无法拦截同时来犯的集群导弹，因此各方都要大量增加进攻性导弹的数量，以穿透对方的防御体系。由于增加导弹数量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突破 TMD 防御系统的方法，因此部署 TMD 将可以引发大规模生产攻击性导弹的后果。

4.TMD 将促使东北亚地区的各方采取预先打击战略。采取进攻性战略还是防御性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攻与防御的相对优势。当进攻对一个国家的安全有了相对的优势

时，这个国家会对进攻性战略感兴趣。<sup>①</sup>由于先发制人的打击所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而且可以避免重大的损失，那么就形成进攻越安全一个国家就越倾向于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情势。进攻者在实行预先打击后会遭到对方的反击，而 TMD 可以通过增强对进攻部队和进攻性武器的保护，减少进攻者因对方反击而遭受的人员伤亡，于是 TMD 就增加了进攻性战略的相对优势。这样必然鼓励采取预先打击战略。

5. 美国部署 TMD 系统的计划有推迟的可能，但是不会停止。研制 TMD 的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略的有效性。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资源，而且 TMD 对美国的安全战略是有效的，美国与其盟国就会继续 TMD 的计划并将进行部署该系统。虽然目前的经济和国际政治因素都不足以阻止美国的 TMD 计划，但是技术和政治原因则有可能延迟美国的 TMD 计划。从技术角度讲，谁都无法保证 TMD 的研制工作可以按时完成，到 2005 年准时部署 TMD 系统。如果在 2005 年之前东北亚地区发生意外的安全事件，这将改变地区安全事务的重点次序，这也可能使美国 TMD 的计划延迟。美国国内因素更是多变。如果美国人民和国会代表理解为什么其它国家反对 TMD，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也有推迟 TMD 计划的可能。

（译自美国：《不扩散评论》1999 年春夏季号）

<sup>①</sup>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 9;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 59.

### 三、亚太地区的 安全合作

#### 前 言

冷战后,亚太国家在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对于安全合作的认识有较大分歧,因此不同形式的安全合作都受到批评。军事同盟被认为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合作安全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多边合作被批评为缺乏效力,双边合作被说成是破坏力量均衡。这些批评,一方面反映出亚太国家关心安全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该地区还缺乏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怎样才能建立起亚太国家能普遍接受的安全机制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该文将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形式和内容、安全观念对安全合作的影响,以及安全合作发展趋势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寻求答案。

#### 安全合作的形式与内容

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多样性具有与欧洲地区安全合作不同的重要特征。要认清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问题与趋势,有必要先了解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的形式与内容。

### (一) 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并行发展

在欧洲，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安全合作组织都是多边的安全机制。受欧洲安全合作形式的影响，在亚太地区讨论地区安全合作时，人们常常把注意力集中于多边安全合作，而很少想到双边安全合作也是地区安全合作的一部分。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多边安全合作与双边安全合作是对立的，其理由是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日美军事同盟。ARF与美日同盟可能有矛盾的方面，但这种矛盾并不缘于它们的合作形式，也就是说并不在于是多边还是双边的问题，矛盾的核心在于它们的合作性质不同，即军事同盟与合作安全的矛盾（下节将仔细讨论两者区别）。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冷战后，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与双边安全合作都有所发展。

**双边安全合作:**美日同盟于 1996 年就新防务合作指针达成共识,1997 年底正式发表; 冷战后美韩军事演习水平不断提高; 1996 年美澳同盟重新确认; 1996 年中俄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同年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达成边境军事信任协定; 1997 年中美达成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意向,1998 年中美第二轨道安全对话启动; 1996 年中印就边境实际控制线军事互信措施达成协议; 1997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互信合作伙伴关系; 1998 年日俄就北方四岛解决方案达成意向性共识。此外亚太地区中小国家之间也达成许多双边的安全合作协议。

**多边安全合作:**冷战后,五国同盟(英国、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扩大了其军事演习的规模; 美澳新同盟

有所发展:1993年成立的ARF成员已扩展到18国,第一阶段的信任措施目标已实现了许多,正在讨论进入以预防性外交为主的第二阶段;朝鲜半岛核能合作组织(KADO)于1994年成立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同年成立了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1997年日美俄成立了三边安全对话机制,1998年美中日开始了三边安全对话。

冷战后亚太国家进行安全合作既有多边也有双边,而且多数国家都是既参加多边安全合作也发展双边安全合作。由此可见,多边安全合作与双边安全合作在形式上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例如,中俄参加ARF并不影响两国发展双边的安全合作关系。因为中俄之间的安全合作在性质上与ARF多边安全合作没有内在的矛盾。相反,美日军事同盟与ARF有性质上的矛盾,因此美日担心ARF多边合作可能会削弱它们的双边同盟关系。

不过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在亚太地区双边安全合作起的作用是主要的,多边安全合作还仅起辅助作用。由于双边安全合作涉及的国家少,容易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而多边安全合作参加的国家多,各自的安全利益不一致,因此在具体安全合作内容上常有分歧,不容易达成具体合作协议。例如在东北亚地区,由于共同安全利益上的分歧,美国只能与韩国和日本分别组成两个双边的军事同盟,而不可能组成北约那种多边的军事同盟。同样是军事同盟,五国同盟和美澳新同盟这种多边的军事同盟就比美日、美韩、美澳同盟的实质性差。同为合作安全,ARF的安全合作内容的实质性,就不如中国与俄、哈、吉、塔的双边安全合作。因此亚太地区形成

了双边合作为硬合作，多边合作为软合作的现象。

表 -1 部分亚太国家安全合作的形式与内容

|              | 多 边   | 双 边   |
|--------------|---|---|
| 军事同盟         | 五国同盟<br>美澳新条约组织   | 美日同盟<br>美韩同盟<br>美泰同盟<br>美菲同盟                          |
| 合作安全         | 东盟地区论坛<br>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br>朝鲜半岛四方会谈<br>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           |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br>中国东盟高官会<br>中俄哈吉塔边界裁军协定<br>中印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协定 |
| 第二轨道<br>合作安全 |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br>东北亚地区合作对话会<br>东北亚有限无核区高级论坛<br>中美日安全对话<br>美日俄安全对话 | 中美双边安全对话  |

## (二)合作安全与军事同盟性质不同

军事同盟是一种古老的安全合作方式，这种安全合作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2 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和罗马帝国。人们不仅习惯于这种安全合作，而且深刻理解它的功能。而合作安全则是一种相对新型的安全合作，与集体安全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原始设想可以追溯到一战后威尔逊起草的国联章程，其第一段就提出，要求各国以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方法

来实现国际和平、安全和合作。<sup>①</sup>冷战时期，在集体安全思想的影响下北约和华约成立了欧安会。冷战后该组织得到发展，改建为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冷战后欧洲国家首先提出合作安全的观念，主张通过安全对话在安全利益不一致的国家间建立起一种防止军事冲突发生的安全机制。安全合作与集体安全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和平协商，而后者强调武力惩罚。合作安全作为一种新型的安全合作方式较晚才被亚洲国家接受。50年代，亚洲国家曾试图建立集体安全机制，但终因对共同安全利益的认识不同而未果。冷战后，合作安全得到亚洲国家的重视，于1993年在加德满都召开了建立亚太国家安全与信任会议，而后该会发展成为 ARF。

军事同盟与合作安全都是以共同安全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安全合作体制。两者在形式上的区别并不大，主要区别是性质不同。合作安全与军事同盟的基本区别有四个方面：

1. 合作目的不同。(1)合作安全的主要合作目标是防止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发生。这种目标是防止任何成员国使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而不是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因此其合作目标是内向性的。例如，ART 目的在于防止亚太国家间的军事冲突，而不讨论其成员国美国与非成员国利比亚之间的冲突问题。(2)军事同盟的第一目标是准备赢得战争，在此基础上的另一个目标是威慑非同盟的国家或集团，使其不敢使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由于军事同盟并不约束成员

<sup>①</sup> John I Knudson,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tlanta: Turner E. Smith Co., 1938), p. 373.

国对非成员国使用武力，因此军事同盟本身可能会首先发动战争。军事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对付非同盟国家对同盟国家的威胁，因此军事同盟的目标是外向性的。美日同盟是明确针对日本周边国家的，而不是针对美日之间的冲突。<sup>①</sup>

2. 体系性质不同。(1) 合作安全的体系是开放性的，它不排除敌对国家的加入。合作安全的基础是不确定的安全隐患，为排除安全隐患，有必要在敌对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因此，合作安全可以是双边的、地区的也可以是全球的。例如，中印之间的边界军事信任措施，朝鲜半岛四方会谈等都是合作安全体系。这种安全合作体系的最主要特点是不针对第三方。为了区别中俄军事合作的性质不同于军事同盟，1996年中俄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中俄发展军事关系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sup>②</sup> (2) 军事同盟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不允许敌对国家的加入。军事同盟的基础是成员国有特定的共同敌人，也就是说是对第三方的。如果这个共同敌人消失了，军事同盟就无法存在了。因此无论军事同盟怎么扩大，都不可能扩大到全球范围。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了军事同盟，该同盟则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同盟也就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北约怎么扩大也不可能接受俄

① COMPLETION OF THE REVIEW OF THE GUIDELINES FOR U. S.-JAPAN JOINT STATEMENT U. 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ND THE GUIDELINES FOR U. 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September 23, 1997, file://F:\EANP/China Profiles/Workihng Version/ENGDOCS/usjguide.him, pp. 9 ~ 11.

② 《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北京)，1996年4月26日。



罗斯的加入，美韩同盟不能接受朝鲜，美日同盟难以接受中国。而且一国不可能与两个敌对的国家同时发展军事同盟关系，因为不可能同时帮助两个敌对的国家与对方进行战争。

3. 合作内容不同。(1)合作安全的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由于导致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安全合作需要在尽可能多的有关方面进行合作，消除军事冲突发生的因素。这就决定了安全合作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合作安全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信任措施，扩大共同安全利益，增加军事透明度。例如，中俄之间的安全合作包括了军事技术合作，相互参观军事设施，首脑会晤机制化以及扩大经贸合作关系。ARF 有定期的高级官员政治会议，有安全专家工作小组、军事人员往来，也有关系经济安全合作的议题。(2)军事同盟的内容单一，只是有关国家军事合作。其核心的内容是当一个成员国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时，其它成员国按同盟规定必须为其它成员国提供军事支持与第三方进行战争。因此合作的基本内容是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提供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提供军事情报、提供军事力量等等。美国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合作内容不完全相同，但相似性很强。

4. 合作原则不同。(1)合作安全主要是通过协商，实行平行的自愿合作原则。在合作安全组织中，成员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通过决议只能采取协商一致原则。对成员国的维和行为是得到成员国同意才进行的。(2)军事同盟实行自上而下的规定性合作原则，成员国军队要服从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大多数情况下，军事同盟的最高指挥官一般由军事最强

国派入担任，因此军事强国在军事同盟中拥有最主要发言权。例如，美韩同盟长期以来是美方司令为最高指挥官，为此，韩国提出要争取在韩美联军的平等作用。

表 -2 军事同盟与合作安全的区别

|        | 同盟安全          | 合作安全      |
|--------|---------------|-----------|
| 目标     | 赢得战争、威慑对方     | 防止军事冲突发生  |
| 性质     | 加强军事实力        | 抑制使用武力动机  |
| 体系     | 封闭、有限定敌人      | 开放、无限定敌人  |
| 范围     | 军事            | 政治、军事、经济  |
| 核心     | 支持盟友的战争       | 不使用武力解决冲突 |
| 基础     | 明确的共同敌人       | 不确定的安全隐患  |
| 冲突关系   | 同盟国与非同盟国关系    | 成员国之间关系   |
| 原则     | 规定性合作         | 自愿合作      |
| 主要合作方法 | 联合军事演习、提供军事支持 | 建立信任措施    |
| 效力     | 较强            | 较弱        |

### (三) 消极合作是积极合作的基础

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军事同盟与合作安全。但合作安全的内容还可以分为积极安全合作与消极安全合作两部分。<sup>①</sup>“积极安全合作”是指采取联合行动对付可见的安全威胁，如交流情报、共同维和、联合海上救援、参加国际斡旋、交流军事技术等等。“消极安全合作”则指采取不攻击他国的战略姿态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如战略武器互不瞄准、不使用武力解决冲突、相互通知大规模军事演习、

<sup>①</sup>这里采用的“积极安全合作”与“消极安全合作”的概念是从核国家为无核区国家提供的“积极保障”和“消极保障”引申而来的。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等。中俄与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性质都可视为是合作安全，但显然前者积极合作的内容多于后者。

积极安全合作的内容多是指在安全危险发生之后采取的联合行动，而消极安全合作则主要是在安全危险发生之前采取的预防措施。积极安全合作要求参与者的共同安全利益有较大的一致性，而消极安全合作则只要参与者对共同安全利益有一般性的共识即可实现。因此进行积极安全合作的难度较大，而进行消极安全合作的难度较小。

从亚太目前已有的合作安全体系来看，绝大多数的安全体系都是从消极安全合作入手，向积极安全合作方面发展。以 ARF 为例，其发展计划为三个阶段，即建立信任措施阶段、预防性干预阶段和冲突管理阶段。第一阶段是典型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阶段是典型的积极安全合作，而第二阶段则是消极安全合作积极安全合作混合的阶段。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刚刚起步，因此消极安全合作是其合作的中心内容。由于亚太地区的合作安全机制都建立得较晚，因此多数还处于消极安全合作的阶段。从理论上讲，如果参与安全合作的国家连消极安全合作关系都建立不起来，就不可能发展积极安全合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消极安全合作是积极安全合作的基础。

军事同盟是否是一种积极安全合作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军事同盟是典型地采取主动联合军事行动遏制安全危险的机制。但是，军事同盟都采取预先打击战略，这就可能使军事同盟的联合军事行动引发军事冲突而不是遏制军事冲

突。合作安全机制在冲突发生之后才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这种联合行动不会成为军事冲突产生的原因。因此，如果将军事同盟视为积极安全合作就可能混淆军事同盟与合作安全的性质，就无法分清中俄安全合作、中美安全合作及美日军事同盟三者之间的区别了。

### 安全观念与安全合作

虽然亚太地区双边、多边的安全合作机制已经很多，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有的这些机制还不能有效地保障地区安全。正是因为亚太国家对这些安全合作机制效力还缺乏信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地区安全合作。亚太地区尚未能建成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原因肯定是综合性的，但目前最为突出的障碍是亚太国家对地区安全合作缺乏共识：甚至连安全合作的定义都不一样。例如，美日安全合作的定义首先是军事同盟，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定义是国际维和，而中俄安全合作的定义侧重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一些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军事同盟不属于安全合作。

由于安全观念不同，因此亚太国家在安全合作的方向、原则、方针、方法、进程、次序上都产生了各种不同程度的矛盾。为了解安全观念对安全合作的影响，我们首先要了解冷战思维与新安全观念的基本区别。

#### （一）新安全观与冷战思维的区别

冷战后，以中俄为一方和以美日为一方在安全观念上发生了新的分歧。在冷战时期，这四个国家对地区安全的认识

也不同，但都没有摆脱从力量均衡的角度认识地区安全的基本逻辑，因此都选择了扩大战略同盟的安全战略。冷战后，中俄的安全观念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一个新的安全观念。<sup>①</sup>这种新的安全观念与冷战时期的安全思维方式的主要区别有三个方面。

1. 对安全威胁的来源认识不同。冷战思维与新安全观都不否认安全威胁是由拥有军事力量和使用武力的动机两者构成的，但冷战思维强调前者为主，新安全观强调后者为主。

(1) 根据冷战思维，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每个国家都有使用武力获取利益的愿望，因此当一个国家或集团获得军事力量优势时，就会使用武力手段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利益，于是军事冲突或战争就会发生。以这种思维方式认识国际安全威胁的国家，自然就将自己敌手的军事优势视为安全威胁。

(2) 新安全观认为，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使用武力获取利益的动机。一个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并不在于外部军事力量是否比自己强大。因为弱者的军事实力同样可以构成对强者的安全威胁。美国军事实力远远超过朝鲜，但美仍担心朝鲜的军事力量。相反，俄罗斯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在 90 年代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但中国不再认为俄国是安全威胁了，其原因是两国政治关系得到了改善。冷战后许多国家的安全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更说明了安全威胁主要源于使用武力的动机而非实力差距。以新安全观为指导的国家，就会以一

<sup>①</sup> 《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北京），1997 年 4 月 24 日。

国的对外政策为依据来判断该国是否构成安全威胁。因为对外政策能反映一国是否有动机使用武力获取利益。中俄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内外政策。”<sup>①</sup>

2.对国际安全的基础认识不同。(1)冷战思维认为本国的安全和国际安全都取决于超过敌手的军事实力。冷战思维把敌国使用武力破坏国际安全的动机当作必然的前提，因此国际安全只能建立在爱好和平一方拥有超过破坏国际和平一方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可以威慑破坏国际和平的一方不敢使用武力。(2)新安全观则认为国际安全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如果国际安全成为有关的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又大于其它利益，这些国家就不会采取武力争夺的方式破坏这种利益。如保持边界安宁成为中俄之间的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对中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双方达成边界裁军协定，不在边界 100 公里内部署重兵。<sup>②</sup>

3.对维护国际安全的方法认识不同。(1)冷战思维认为维护国际安全的主要方法是扩大军事同盟。基于国际安全的把握在于自身军事实力的优势，因此冷战思维认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最有效方法是扩大军事同盟，增加自身的军事优势，从而增强对维护国际安全的把握性。(2)新安全观认识，维护国际安全的主要方法是扩大共同利益和改善政策关系。新安全

<sup>①</sup> 《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北京），1997年4月24日。

<sup>②</sup> 《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北京），1998年7月28日。

观注意到冷战思维方式的逻辑窘境。如果敌对双方都把国际安全建立在自身军事优势的基础上,那么任何一方拥有军事优势时,敌对的一方便会产生不安全感。因此新安全观认为,扩大共同利益使得战争对共同利益的破坏大于进行战争的利益,这从理性角度来讲必然降低选择战争方法的可能性。改善政治关系,则可从根本上消除使用武力的动机。没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如果能够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就可以作到和平共处,就可以以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冲突。冷战后,中国与韩国关系的变化最为典型。韩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中美则处于战略矛盾状态;中韩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都不一样,双方甚至在专属经济区上还有分歧。但是双方政治关系的改善,使得双方都不再感到对方是安全威胁了。

## (二)新安全观与冷战思维对安全合作的影响

由于冷战思维和新安全观对国际安全的认识不同,因此这两种不同思想指导下的安全合作政策也不同。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亚太国家的安全政策都处于调整的过渡阶段,因此同时受到冷战思维和新安全观的影响。例如,美国虽然继续坚持事先打击的核威慑政策,但同时也采取了不将核武器瞄准中俄的政策,并对无核区的国家承诺不使用核武器,这其实是对无核区国家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两种安全观念的混合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亚太地区出现了军事同盟与合作安全同时发展的现象。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日、韩、澳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继续坚持巩固已有的军事同盟,与此同时,在新安全观的影响下,它们又与亚太

地区的其它国家一起建立合作安全机制。二是许多国家的安全合作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例如，美国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与日本加强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威胁的军事同盟。这反映出美国在关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合作对象的性质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或起码是不明确的。

由于冷战的历史惯性，亚太国家的安全合作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新安全观念与冷战思维的影响，但是各国所受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有的甚至差别很大。例如，中国的对外安全合作政策受到新安全观的影响较大，而美国则受冷战思维影响较大。如果根据受到两种安全观影响的程度为标准，亚太国家可分为三类，即受新安全观影响较大的国家、新安全观与冷战思维影响相似的国家，以及受冷战思维影响较大的国家。

表 -3 安全观对亚太主要国家的影响程度

| 新安全观影响较大  | 两种观念影响相似                   | 冷战思维影响较大             |
|-----------|----------------------------|----------------------|
| 中国<br>俄罗斯 | 加拿大<br>澳大利亚<br>新西兰<br>东盟国家 | 美国<br>日本<br>韩国<br>朝鲜 |

受冷战思维影响较大的国家将安全合作的重点放在军事同盟上，或是不愿参加多边的合作安全机构。受新安全观影响较大的国家则反对搞军事同盟，并主动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受到两种安全观相似影响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虽为军事同盟成员，但对多边合作安全机制的热情并不亚于军事同盟，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等；另一种是不参加军事同盟，



但对建立合作安全机制的主动性不强，如一些东盟国家。

### （三）对预防性外交的认识及政策

目前，亚太地区有关预防性外交的讨论越来越多，而被称为 ARF 第二轨道的 CSCAP 已于 1995 年汉城会议、1996 年巴黎会议和 1997 年的新加坡会议就这一议题进行了三次讨论。其实“预防性外交”这一概念在冷战时期就已出现。1953 年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合尔德，曾就预防性外交提出过较为明确的概念，他的预防性外交是指联合国在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边缘地带发挥维和的作用。<sup>①</sup>1992 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其《和平纲领》的报告中，将预防性外交定义为“采取行动，防止两方发生争端，防止现有的争端升级为冲突，并在发生冲突时限制冲突的扩大。”<sup>②</sup>

加利的预防外交定义包括了预防军事冲突和处理军事冲突两个内容。防止发生争端可理解为广义的预防外交，但这其实是建立信任措施的一般性的维护国际和平的内容。防止争端升级为冲突才是多数国家所理解的预防性外交。因为争端的发生是普遍现象，问题的关键是防止争端发展成为军事冲突。防止冲突扩大实际是军事冲突发生后的冲突处理。加利的定义将 ARF 的建立信任措施、预防外交和冲突管理三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全都包括进去了。

对于预防性外交，目前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主要的分歧

<sup>①</sup> 时永明：《东盟地区论坛与预防外交》，《国际问题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29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30 页。

是预防性外交应为军事冲突前的外交活动还是军事冲突发生后的外交活动。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认为,预防外交应是军事冲突发生前的活动,因为预防性外交的目的是防止军事冲突发生。而一旦军事冲突发生则属于冲突管理的问题,这已不是预防问题。而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则认为预防外交的重点在于冲突管理,没有冲突管理的功能,预防性外交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显然前者重在维护已有和平功能,后者重视的是恢复和平的功能。

由于认识不同,亚太国家在 ARF 内的预防外交还未正式启动,不过关于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对象、手段和原则都已在讨论之中,因此,人们认为 ARF 的预防外交尚处于建设阶段。

虽然亚太多边组织在预防性外交上取得的成果还不大,但双边的预防性外交却取得了实际性的进展。例如,1994 年中俄达成《关于预防危险军事活动的协定》;1996 年中印达成《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一协定在防止 1998 年印度核试验引发中印军事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 年,中美达成《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sup>①</sup> 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分别发表了双边的互不瞄准核武器的联合声明。

### 安全合作的发展趋势

亚太国家发展安全合作的愿望是强烈的,但分歧也是巨

<sup>①</sup> 《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北京),1998 年 7 月 28 日。

大的。因此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将必然受到这些分歧的影响。

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将表现为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但合作的深度较低。亚太国家的多样性很强，在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水准、军事实力、地理位置、国家规模、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加之历史矛盾和边界矛盾，使得亚太国家难于形成强大的共同安全利益。因此，安全合作的深入将有一定的困难。由于安全合作深入发展面临困难，亚太国家会不断寻求新的途径，于是很可能出现安全合作机构或组织不断增加的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合作内容重叠的机构和组织。同时为了使现有安全合作组织继续发展，这些组织会扩大合作内容。特别是在军事安全合作困难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会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例如，金融危机防范、打击海盗、打击毒品贸易、反走私、打击非法武器买卖等。

消极安全合作在较长时期内将是地区安全合作的重点。在亚太国家共同安全利益不强的情况下，亚太国家只能从消极安全合作着手。特别是在影响亚太地区安全最主要的两个国家——中美之间共同安全利益还不很一致的情况下，消极安全合作仍需要继续发展，避免军事冲突仍是中美安全合作主要目的，因此亚太地区的消极安全合作仍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在消极合作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合作才能取得长足进展。美国认为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这种认识越来越受到挑战。因为这个基石在冷战时期没能有效地防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发生，而且也没能使美国赢得这

两场战争。而中美自 70 年代进行战略合作起，亚太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冷战后的现实是，如果中美之间没有军事冲突，亚太地区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中美如果进行积极安全合作，两国就能合力抑制其它潜在的军事冲突。

不确定性是亚太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威胁。冷战后，亚太地区虽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但潜在的安全隐患仍然存在。分离主义问题、恐怖主义活动、边界争端、海洋资源纠纷、核安全与核扩散问题、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种族主义、宗教分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潜在的安全威胁，很难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由哪一方引发军事冲突。此外，像经济安全中的金融危机问题，更是无法预测。因此，亚太国家在大规模战争危险下降的情况下，会加强防止不确定因素导致军事冲突的合作。例如，由于意外的小规模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不断加大，核、生、化武器进入商业领域，亚太国家需要加强特种部队的训练合作。目前亚太国家对特种部队的需求不断增长。美国特种部队承担的任务从 1991 年以来增加了 3 倍。1998 年以来美国军费减少了 30%，而特种部队的编制和费用非但没减反而有增。<sup>①</sup>

合作安全与同盟安全的矛盾不可避免，相互妨碍对方的深化。由于合作安全机制削弱成员之间的政治对立，这就使军事同盟成员逐渐失去了对共同敌人的一致认识，而在共同敌人的认识上的变化，将动摇军事同盟的存在基础。例如，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和中日军事交流的启动，

<sup>①</sup>伏之：《不畏艰苦方胜重任》，《现代兵器》1989 年，第 10 期，第 35 页。

使得日美同盟无法公开承认其共同防范对象是中国。相反，军事同盟的加强，使得多边或双边合作安全机制难以深化，长期停留在消极合作的水平上，因为军事同盟造成同盟成员与非同盟的不对称战略关系，使合作者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相互不信任。日美同盟的新合作指针的出现，就严重影响了中美和中日军事交流的深入发展。美韩同盟则使朝鲜半岛四方会谈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

亚太地区以双边安全合作为主，多边安全合作为辅的局面将继续下去。目前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实质性还不如双边安全合作强。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的安全合作政策都是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如果中美两国在这方面没有改变，整个亚太地区双边安全合作为主的状况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美日和中俄美两个三边安全对话虽已经开始，但在近期由这两个三边对话取代这四国间的双边安全合作还未实现。两个三边对话合并为四国安全论坛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即使四大国安全论坛能成立，也不会很快取代目前的双边安全合作。不过如果中、美、日、俄四大国安全论坛成立的话，那么 ARF 所能发挥的地区安全对话作用就会减少，因为许多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将可以在这个安全论坛中得到解决。

## 结 论

根据上面对目前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前景的分析，我们可以回答如何在亚太建立有效的安全机制的问题了。这个答案未必是完美的，但可能是较为现实可行的。

加强对话,增强安全共识;摆脱冷战思维,促进多种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面对亚太国家之间共同安全利益不足的现实,快速发展实质性的军事合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对话,首先就安全观念问题进行讨论。以冷战后亚太地区的现实问题为依据,从理论上就安全合作诸方面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在合作安全之中寻求共同利益,通过扩大消极安全合作为积极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合作可以不拘泥于形式,重在合作的内容和功能,只要有助于增强相互信任的合作都应发展。

加强大国间的军事交流,促进大国的安全合作。亚太地区集中了中、美、日、俄四个大国,如果这四个国家不能进行安全合作,其它国家的安全合作都难以有效地防范军事冲突。因此,促进这四国间的安全合作应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向。目前,四国之间都已开始了军事交流,这是加强相互信任的有效途径。因此,应促进这四国之间军事交流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从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发展。

加强经济合作,扩大共同利益,遏制战争动机。发达国家的紧密经济联系已经有效地提高了它们之间的战争成本,使发达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为了扩大亚太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有必要加深亚太国家的经济层次,扩大他们的经济合作范围。经济上的共同利益逐渐可以转化共同的安全利益。为了维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就能促进亚太国家安全合作的积极性。

(台湾《东亚季刊》第 80 卷第 2 期)

## 四、霸权与中国掘起的选择

世界中心转移至今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尚未解开的谜。一个国家如何崛起成为世界主导国家的研究已经很多，对于新兴大国成为世界中心国家的成败分析也有了许多成果。本文亦就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作一简单的分析。

### 崛起与挑战

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与国内社会的基本性质不同，前者是无序的(anarchy)而后者是自上而下有序的(hierarchy)。<sup>①</sup>由于国际社会是无序的，所以支配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规则是从林法，即弱肉强食。相反国内社会是有序的，所以支配国内各个政治行为体的基本准则是规约法，即依法办事。由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这种本质区别，社会主导权的更迭就不一样了。在国内社会中权力的变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定将国家权力禅让给新统治者。另一种是当国内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时，便以武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国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无序的社会体系，所以

<sup>①</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p. 102 - 128.

只有一种方式进行国际社会主导权的更迭，即以实力获得的方式。

在通过实力较量进行主导权更迭的国际社会中，新兴大国对头号国家的挑战成为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国家能比他国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国际领导者愿意将自己的主导地位禅让给他国。只有维持这种世界主导地位的代价远远大于该国的国力时，才会不得已放弃这种主导权。同一原因又使所有的新兴大国都寄望于获得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旧的世界领导者不愿放弃其世界主导地位的意志和新兴大国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愿望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必不可免的。

1500年以来的历史表明，所有世界领导者在建立自己主导地位的过程中都对其它霸权力量进行过挑战。全球性的世界政治体系是由欧洲人向外扩张逐渐形成的。15世纪葡萄牙率先向海外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紧跟着是西班牙。它们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殖民扩张本身就是对其它地区的主导国家的挑战。只是这种挑战在美洲、非洲较为成功，而在亚洲不很成功。<sup>①</sup>当其它欧洲列强也加入对外扩张的队伍后，它们之间的争夺便开始了。17世纪先是荷兰成功地把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赶走，<sup>②</sup>并且一度占领了亚洲中央大国中国的台湾，建立了世界霸权。到了17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对海上霸主荷

<sup>①</sup> L.S.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 A GLOBAL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Inc. 1966), P. 87 ~ 99.

<sup>②</sup> 同上, 第 118 ~ 129 页。



兰挑战，与之争夺海上霸权。通过 1652 - 1654 年的英荷战争迫使荷兰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为英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近代史上世界中心国家的更迭依然是新兴大国对领导国的挑战。美国从建国之始其实就开始对英国进行挑战。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战争。最后英国以失败而结束了在北美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强大后更是不断地对英国的世界主导地位进行挑战。即使在一次大战中加入了英法俄协约国集团，美国也没有放弃与英国争夺世界主导权。1918 年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说”就是针对英法俄分割世界的密约提出的反对意见。他针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提出了海上自由的主张，为美国建立自己的经济霸权创造条件。美国提出的废除经济壁垒、“公平”处理殖民地、限制军备、创立国际联合机构等建议，客观上都形成了对英国世界主导权的挑战。<sup>②</sup>

世界历史进入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被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看好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日本，也开始对美国的霸主地位进行挑战。1994 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首次在日美首脑会谈上对美国说“不”，表明日本不接受美国提出的按数字标准对美开放市场。日本对美国的公开挑战使这次日美首脑会谈破裂。细川从美国回到东京的第二天，美国

<sup>①</sup>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9~10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276~277 页。

就宣布如果一个月内找不到解决办法，就对日本进行制裁。<sup>①</sup> 1995年日本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表现出以往少有的强硬，甚至威胁说要到世界贸易组织去起诉美国。

### 崛起战略的选择

新兴大国对原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是必然的过程，但这并不决定他必然要选择通过战争的方法获得世界主导地位的战略。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可以是武装的也可以是和平的，因而崛起的战略可以是军事的也可以是经济的。

崛起战略的选择当然是由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客观环境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限制。一是旧的世界霸主以什么为主要手段维护其主导地位；二是国力基本要素的构成。

当老世界霸主以军事力量为其维护霸权的主要手段时，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就可能是依赖军事发展。只要老世界霸主用军事力量来压制新兴大国的发展与强大，新兴大国就不可避免地使用武力打破这种压制。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中还没有一个老霸主不是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主导权的，所以也还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通过战争来获得世界中心国家地位的。即使美国也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才确立其世界中心国家地位的。只不过在两场战争中，美国采取了晚参战的战略。在交

<sup>①</sup>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614~615页。

战双方的力量受到极大消耗的情况下参战，从而减少了战争损失。

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出现了新的发展，就是世界霸主有可能倾向于以经济力量来维护其霸主地位。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国会谈美国安全政策重点时说：“经济安全是这些重点中的第一重点。”<sup>①</sup>美国虽然仍维持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装力量，但美国开始大规模裁军和削减军费。根据1993年签署的《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美国到2003年将核弹头由目前的10000枚削至3000枚。<sup>②</sup>冷战后美国军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也下降了，由1991年的4.7%降到1994年的4%。<sup>③</sup>美国的正规部队数量也计划由90年代初期的210万人减至1995年的140万人。<sup>④</sup>由于老霸主有了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制约新兴大国崛起的倾向，这就为新兴大国不选择军事手段为主要崛起战略创造了条件。

美国之所以有可能改变维护霸主地位的传统方法，其原因与限制新兴大国崛起战略选择的第二个客观因素有关。由于世界经济正在步入高科技时代，军事力量的水平越来越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大小，所以国力的基本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取代军事成为国力的最基本要素。这一客观变化在

① 《和平、繁荣与民主》，美新署华盛顿电 1994年2月24日。

② Thomas L. Friedman, Reducing the Russian Arms Treat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92.

③ DEFENSE 94—ALMANACE, Issue 5, p. 19.

④ 王保存，《美国军队裁减兵员与编制政策》，《现代军事》第199期，1993年8月，第33页。

很大程度上促使新兴大国选择经济崛起的战略而不是军事崛起的战略。冷战后日本崛起的道路是个经济崛起战略的典型的例证。不过，这并不能保证日本今后不转向军事崛起的战略。

主要影响新兴大国崛起战略选择的主观因素也有两方面：一是对崛起速度的期望，二是崛起的目标。

一般讲来，如果新兴大国对崛起速度期望过高，就容易选择军事挑战的崛起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例子。德国和日本都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所以采取了战争的手段夺取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从 1939 年 8 月入侵波兰到 1941 年 6 月对苏宣战，德国只用了 10 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欧洲 14 个国家。<sup>①</sup>从 1937 年 7 月全面侵华到 1941 年 12 月袭击美国的珍珠港，日本用不到 4 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印度支那和东亚其它国家。然而，运用军事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大一国的势力范围，但是能否持久地巩固已有地位则是另一回事。相反，如果新兴大国对崛起的速度没有过高的期望，就可能选择非军事的崛起战略。

一国崛起的目标如果是摧毁世界主要强国，该国就容易选择军事挑战的崛起战略。二次大战的德国和冷战时的苏联是典型例子。德国想彻底摧毁英、法、苏联在欧洲的力量，所以采取了主动发动战争的战略。苏联则想消灭以美国为首的

<sup>①</sup>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517 页。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在冷战中采取通过代理人战争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战略。如果一国崛起的目标不是摧毁世界中心国家，而是争取平等的大国地位，那么就有可能采取和平共处经济竞赛的崛起战略。

### 中国崛起的可能选择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崛起一样引人注目。那么中国会选择什么样的崛起战略呢？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正视两个现实：一是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进行挑战，二是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将维持较长时间。

冷战后出现的新东西矛盾是中国和日本崛起对美国挑战的反映。苏联解体后，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东西矛盾消失了，随之产生了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东亚政治文化和基督教为基础的欧美政治文化之间的新东西方矛盾。<sup>①</sup>东亚国家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而美国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于是，东亚国家和美国在人权问题、市场规则、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以及国家管理等方面的对立不断发展。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儒学思想将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这必然客观上形成对美国的价值观、社会模式、政治影响的挑战。

<sup>①</sup> 阎学通：《展望下世纪初国际政治》，《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6期，第5页。

“一超四强”的国际格局反映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将至少还要维持几十年。根据最新的研究,美国、日本、中国、德国、俄国构成的“一超四强”国际格局至少要持续到 2010 年。到那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8 万亿美元,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虽可能与美国相似,但其实际购买力将远远低于美国,德国可达 2.5-3 万亿。<sup>①</sup> 中国可达 1.8 万亿,按购买力计算约为 5.4 万亿,俄国约为 2 万亿。美国的军事力量将远远超过其它四强,无可与之匹敌。美国主导国际政治事务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根据上面的两个现实,我们可以判断客观环境不允许中国选择军事挑战的崛起战略。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比较,中国与美国都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不可能进行军事挑战。冷战后中国的安全战略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国防现代化以提高自卫能力,二是支持地区安全合作减少军事冲突隐患,三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建立相互信任。<sup>②</sup>

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会限制中国崛起战略的选择。中国有 5000 年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观是长期的,不会选择急于求成的崛起战略。1982 年中共十二大将奋斗的目标定为 20 年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sup>③</sup> 这个崛起规划有 70 年之久。而且中国目前崛起的目标只是

<sup>①</sup> 阎学通:《展望下世纪初国际政治》,《现代国际关系》,1995 年,第 6 期,第 6 页。

<sup>②</sup> 阎学通:《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5 年,第 8 期,第 26~28 页。

<sup>③</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7 页。

争取在国际社会上平等的地位,不是要称霸世界,所以中国不会选择毁灭美国的崛起战略。中国在近代史上受到西方列强 100 多年的凌辱,中国崛起的根本目的仅是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向外扩张。美国政治学家马克·曼考比较了中西文化之后曾说:“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sup>①</sup>

笔者认为中国应选择参与的崛起战略而不能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参与的战略有三重战略意义。

一是防止美国与我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已经在西方国家和周边地区引起了一些误解,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会称霸世界,所以“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不断扩大。这种认识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的客观存在不利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应充分正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将长期存在这一现实,采取参与的战略,进入到这个体系中去,而不能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游离国际体系之外的孤立主义政策容易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遏制对象,而进入到这个体系之内中国则能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发展较多的共同战略利益。

二是为中国创造机会使现行的国际体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参加到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去,中国才有可能在这个体系中争取到与自身地位相等的权利。中国是个 12 亿人口和有 5000 年历史的国家,无法采取在别人的保护下崛起壮大的战略。中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创造较好的崛起环境。

<sup>①</sup>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The Free Press, 1984), p. 11.

通过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内部的斗争，减少这个体系阻碍中国崛起的消极因素。具体的方法就是中国应主动积极地参加亚太地区各种多边政治和安全机构的活动，即使不能使中国的观点立场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原则，至少可以减少不利于我国的国际规则出台。为此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应由双边为主转变为多边和双边并重。

三是使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参与不是消极地被改造成为西方一员，而是通过多边国际活动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顺从，而是通过斗争求得合作，使合作更加平等也更加持久。参与不是卧薪尝胆，不是准备将来有一天对其它在历史上有负于我国的国家进行报复。报复心理容易使国家崛起战略走上极端的道路，暂时“不出头”将来有了实力再算账的政策是不利于我国崛起的。这种战略必然会加剧“中国威胁论”的扩散，妨碍我国建立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周边环境。参与的战略是通过参与向世界提出更多的有建设性意义的思想，增强中国的影响力，更多地承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更美好的责任。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国际抱负。

（《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原文题为《中国崛起的可能选择》）



## 五、中美消极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阎学通博士认为，未来 10 年间中美关系将是一种消极性而非积极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因为中国国力的长远发展目标，以及美国希望维持其现有的国际主导地位，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阎学通博士昨天下午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例行讲座上，以“中美关系及中国对美政策”为题发表英语演讲时，如此界定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特质的。

他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目前在全球安全课题上，所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在两国之间产生对抗的“消极安全合作”（*negative security cooperation*），而非相互合作以应付来自第三国威胁的“积极安全”（*positive security*）。这种关系的特质，是不同于美国与欧洲、日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的。

为什么中美关系会有如此不同的特质呢？

阎博士说：“我的理解是中美两国在冷战结束后有着结构性矛盾。用美国人的说法，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继续扮演其主导的国际角色；这便同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形成矛盾。”

他指出，中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加拿大。

中国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工业国家水平的长远战略目标。

假设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那样的水平，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最少等于美国的两倍多，因为中等工业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少是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50%，而中国人口几倍于美国人口。由于中美各自的战略目标有矛盾，使两国很难进行合作。

阎学通博士指出，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日本，以及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有苏联，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看不到共同敌人和共同威胁，使得这种结构性矛盾很难减少，要改善关系并不容易。

他认为，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尽量避免同对方发生战争，而中国已故领袖邓小平也曾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作为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但事态的发展有时不是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历史上的许多战争便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中国未来在人权和民主理念方面完全接受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否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就会消失？

阎学通博士认为不会，因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他说：“日本和美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但由于日本的经济实力，使美国也感觉到日本的威胁。”

对于未来 10 年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阎学通博士预测在今年美国产生新总统之后的两年里，中美关系有望改善。他说：“这是受到美国总统选举年周期性的影响；总统候选人

在竞争期间会建议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在当选后巩固了权力，就会采取较理性冷静的政策。”

至于未来 10 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他表示要看欧洲是否能脱离北约建立独立的防御力量，也要看日本是否会脱离日美安全条约而定。也就是说，欧洲和日本是否会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形成挑战，并因此减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1.20,原文题为《中美关系未来十年是消极伙伴关系》，采访记者:李气虹）



## 第三篇

# 台湾独立的危险趋势



## 一、统一台湾的概率分析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已就和平统一台湾作了 20 年的努力，然而和平统一的前景还不明朗。本文将采用概率的方法分析今后 15 年内统一台湾的可能结果和可能形式。

### 台湾问题的三个基本结果

中国已有 5000 年的历史，今后的历史也许会比以往的历史更长。有人统计，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统一的时间为三分之二强，分裂的时间为三分之一弱。<sup>①</sup>中国统一长于分裂的这一历史特征，可以使我们对台湾的最终统一抱有信心。相对于几十个世纪的历史来讲，台湾自 1950 年脱离祖国大陆以来的 48 年依然是不长的一段历史。1895 年后日本对台湾实行了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1945 年台湾还是回归了祖国。然而，研究现实的两岸统一问题，我们不能把台湾问题的结果推向长远的历史未来，我们需要对在可见的时间内的结果作出预测。

在今后的 15 年内，台湾问题的发展结果有三个可能，即

<sup>①</sup> 刘照先：《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第 161 页。

两岸统一、台湾独立和不统不独。由于目前台湾处于不统不独的状态，因此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状态可以保持 15 年。问题不在于是否多数人认为不统不独的可能性最大，关键是无人可以排除其它两种结果的可能性，即使那些预测不统不独可能性最大的人，也不能排除其它两种结果的可能性。

根据两岸实力差距的发展趋势估算，中国大陆在 15 年内统一台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997 年大陆与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约为 9041 亿美元<sup>①</sup>和 2913 亿美元<sup>②</sup>，前者是后者的 3.1 倍。90 年代以来，大陆的 GDP 保持了年均 9% 的增长速度，台湾则为 6%。今后 15 年，如果 GDP 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保持 8% 和 5%，到 2012 年，大陆和台湾的 GDP 将分别为 28680 亿美元和 6056 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 4.7 倍。香港经济实力可以看作是大陆统一台湾的经济资源。香港 1997 年的 GDP 约为 1537 亿美元。<sup>③</sup>90 年代以来的年均增长率为 5.2%。今后 15 年如果香港的 GDP 保持 4.5% 的 annual 增长速度，到 2012 年时可达 2957 亿美元。届时大陆与香港的 GDP 总和可达 31655 亿美元，是台湾的 5.2 倍。(如果考虑进去购买力平价的因素，其差距至少可达 10 倍之多。)

经济总量差距扩大到 5 倍之外，这将从多方面增强大陆统一台湾的实力。军事上，大陆可以获得较大的战略优势，以军事手段促进统一台湾的能力将大为提高；政治上，美国将更

<sup>①</sup> 《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实现高增长低通胀》，《人民日报》1997 年 12 月 31 日。

<sup>②③</sup> 台湾经济研究：《国际经济动态指标》第 523 号，1997 年 12 月 18 日。



加重视中国的世界作用，其在台湾海峡的政策将不得不进一步向大陆倾斜，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冲突的可能性将进一步下降；经济上，大陆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同时遏制台湾“银弹外交”的经济能力也将增大；外交上，世界各国将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关系，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将更少。实力差距的扩大将使大陆有可能在今后 15 年内统一台湾。

然而，GDP 经济总量的 5 倍之差还不能保证大陆完成统一台湾的历史任务，从台湾岛内政治的发展趋势看，台湾在 15 年内“独立”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完全排除。李登辉在台湾执政后，采取了曲线独立的政策，使台湾独立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在 1997 年台湾地方选举中，国民党败给了党章规定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民进党，民进党在 23 个县市长席位中赢得 12 席，使民进党人担任县市长的行政区域的面积和人口都超过了一半。<sup>①</sup> 面对政治失败对国民党政权的威胁，李登辉作为国民党主席却说：“民主社会没有永远执政的政党。国民党失败证明台湾民主政治取得了成果。”<sup>②</sup> 对此连日本专家都认为，“李登辉是一个‘隐蔽的民进党’人士。”<sup>③</sup> 李登辉反对中国统一的政策，有效地助长了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扩张。根据台湾《联合报》的调查，以统一、独立和维护现状三种选择进行问卷调查，岛内支持独立的从 1994 年的 17% 上升到 1997 年的 24%，若仅以独立和统一两种选择问卷，则支持独立的

① 中央社台北 1997 年 11 月 29 日电。

②③ 《两年后台湾诞生“民进党政权”》，《选择》（日本）1998 年 1 月号。

从 1989 年的 6% 增长到 1997 年的 43%<sup>①</sup>，这一统计也许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反映了“台独”势力不断发展的趋势。

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党地位的变更有加速台湾走向独立的可能。在李登辉的暗助下，民进党人陈水扁很有可能在 2000 年赢得“总统”选举。即使在 2000 年民进党不能得手，2004 年民进党也将会有较大机会成为执政党。民进党一旦上台就公开宣布独立的危险并不大，但民进党与国民党进行新的政权争夺的斗争，则可能加速台湾的独立。双方为了争夺选票都有可能在独立问题上采取不理智的政策。加之美国大选年与台湾是同一年，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在选战中也会利用台湾问题相互攻击对方。台湾此时若加大对美的院外工作，则可能促使台北和华盛顿在台湾独立的问题上作出不理智的决策。因此，民进党如果执政，美台大选年将成为台湾独立的危险期，1995 年李登辉访美造成的 1996 年台海危机就是个预警信号。在 2003 - 2012 年期间台湾岛内将有三次大选，这将可能成为三个危险期。

### 统一台湾的三种基本方法

统一的方法从性质上讲只能有两种，即武力与和平两种方法，但在武力与和平谈判之间的灰色地带还有半和平半武力的统一方法，其中可以全面封锁为典型代表。当美国军事介入台湾事务时，或是“台独”势力滑向危险边缘时，或是一个

① 《赞成台独者首度超过统一》，《联合报》（台湾）1997 年 7 月 4 日。

中国的政治框架受到严重威胁时，大陆就有必要对台湾进行外交、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封锁。全面封锁的方法自然需要使用军事手段，但这并不等于战争必然发生。通过全面封锁逼迫台湾进行统一的政治谈判，两岸也可以在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实现统一。这种方法既包括了武力统一中使用军事手段的一面，也包括了和平统一中避免战争伤亡的一面。因此不宜将全面封锁的方法归类为武力的方法或和平的方法，而应看作是第三种统一方法。

以上三种方法中的每种方法，在今后 15 年内都是统一台湾的可供选择的方法。目前大陆统一台湾的主要方法是和平谈判。1997 年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呼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能谈。”<sup>①</sup>然而，台湾当局不同意“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谈判。在 1998 年的元旦，当江泽民再次呼吁台湾进行统一谈判时说，“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回应我们提出的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两岸进行谈判的郑重呼吁”，这次没有再提“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sup>②</sup>在同年春节前夕，中国大陆又表示，为了满足台湾同胞的愿望，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问题进行商谈，政治谈判的议题、代表名义、方式等

<sup>①</sup>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46 页。

<sup>②</sup>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 年 1 月 2 日。

都可以商讨。<sup>①</sup>由此可见大陆为了和平统一台湾，在名义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上都采取了灵活的政策。

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方法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武力统一的方法与和平统一的方法都有成功与不成功两种可能。目前还不能确定和平与武力两方法中哪一种能保证完成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由于武力统一会给两岸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目前武力统一还不是大陆统一台湾的首选方案。然而，如前所述，台湾在 15 年内出现独立的危险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采取变相独立的作法，大陆将被迫采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当局连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问题都不愿谈，因此大陆无法不作随时应对台湾独立的军事准备。中共十五大强调，“要努力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图谋的。”<sup>②</sup>

一些“台独”分子认为大陆对台湾是不愿打、不敢打和不能打，所以台湾搞独立不必顾虑大陆采取武力统一的方法。这种认识有一半是对的，而另一半则是错的。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两岸合力加快民族崛起的战略利益，大陆的确是不愿打。担心战争使两岸中国人付出太大的生命代价和摧毁台湾的经济，大陆也的确有些投鼠忌器不想打。但是大陆决不是害怕美国介入台湾战争。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

<sup>①</sup> 《全面贯彻八项主张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人民日报》1998年1月27日。

<sup>②</sup>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大陆都是在军事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而且美军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陆在装备极差的情况下尚能与美军进行军事较量，在军事力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又怎么会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台湾呢？1996年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军事演习，足以表明大陆有能力用武力统一台湾。演习后认为大陆没有拿下台湾军事能力的声音变弱了，美前助理国防部长弗里曼认为2005年前后，大陆将在台海地区拥有军事优势。<sup>①</sup>可以相信到了必要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大陆不能允许台湾用无限期拖延的方法实现变相独立的目的，因此采取全面封锁也是统一台湾的方法。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实施第九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将先后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将突出地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sup>②</sup>大陆认为“进行两岸政治谈判已经客观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sup>③</sup>在台湾当局搞变相独立而武力攻台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后果又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全面封锁就成了统一台湾的可选方案。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压缩台湾“外交”空间的政策是成功的。到1998年1月中国与南非建交时，与台湾

① 弗里曼：《中台战争能避免吗？》，《读卖新闻》（日本），1997年3月号。

② 李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1996年1月31日。

③ 《全面贯彻八项主张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人民日报》1998年1月27日。

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已不足 30 个,而且都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小国。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危地马拉,约有人口 1120 万。到 1998 年 2 月,承认台湾的 28 个国家的人口总计不到 1 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1.7%。在 100 个人中仅有一个半人承认台湾为国家,这与没有国际承认已没有根本性区别。正是因为缺少国际承认这一要素,台湾就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sup>①</sup> 如果大陆以军事手段封锁台湾港口的出海航路,台湾的经济将立即陷入瘫痪,台湾当局的政权将维持不了多久。台湾若首先对大陆军事力量进行军事攻击,则战争责任在台湾一方,台湾想寻求外界支持就更困难。

#### 统一的四种形式

使用上述三种方法统一台湾虽都有成功与不成功的两种可能,但是三种方法所取得的可能结果的种类却是不一样的。一旦台海发生战争,台湾不统不独的现状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因此武力统一的结果不是统一就是独立,也就是说不是大陆通过战争收复台湾就是台湾通过战争取得独立。和平统一的两个结果则为实现统一和不统不独。台湾搞和平独立也会引发战争,因此和平统一的结果中不会有台湾独立。全面封锁的两种结果与和平统一相同,也是实现统一或不统不独。即

<sup>①</sup>拥有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人口、土地、政府和国际承认,而且国际承认的重要性大于土地。巴勒斯坦是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得到国际承认的,而国际承认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国家。

在全面封锁下，台湾被迫接受统一；或者台湾长期抵制封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大陆取消封锁，两岸继续不统不独的状态。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是试图以武力打破全面封锁，那都必然导致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又成为武力统一的结果，因此全面封锁的结果中也没有台湾独立。

不同的统一方法不但产生的可能结果有所不同，而且其所实现的统一在形式的种类上也不完全一样。两岸统一的形式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用什么国家名称，二是采取什么政治制度。在这两个问题里，国号显然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国家统一的最主要标志之一是一国使用一个国家名称。统一形式在国号问题上有两种选择的可能：1.继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2.统一后的中国不使用这一国名。不使用这一国名又有两种形式，即使用一个新的国名或使用台湾目前用的“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使用“中华民国”名称统一两岸是台湾统一大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统一问题了。现实的政治是台湾既无能力也无意愿进行统一，因此在“中华民国”名义下统一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此，本文只讨论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国名统一的两种可能。

统一后的中国，两岸在政治制度上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在同一国号下，一个国家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目前大陆与香港就是同一国家实行不同政治制度，1959年西藏废除农奴制之前，大陆其它省份与西藏也是同一国家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前也是如此。

将政治制度是否相同与是否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

两者综合考虑，则可得到四种可能的统一形式，即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的同一制度的统一和不同制度的统一，以及使用新国名情况下的同一制度的统一和不同制度的统一。

这四种不同的统一形式分别与不同方法实现的统一有着不同的关系。和平统一的形式包括了两种可能。由于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实现统一，所以要充分照顾两岸的意愿，也就是说在国号和制度两个问题上都有可能进行讨论。大陆已经提出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台湾在实行与大陆不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有可能提出使用新国号的要求。这使得和平统一有了两种可能的统一形式。如果两岸同意使用新的国号进行统一，那么两岸就不会在是否实现不同政治制度上计较了，也就是说如果大陆在国号问题上都作了妥协，就更不可能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向台湾提出要求。大陆如果不要求台湾改变政治制度，台湾就更不可能要求大陆改变政治制度了。

大陆使用武力实现的统一也有两种可能的形式，但与和平统一有所不同。武力统一形式的最大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下实行相同政治制度的统一，因为武力统一后的统一形式基本上是由大陆来决定的，大陆也有可能同意台湾实行与香港类似的政治制度，因此大陆如果通过武力统一了台湾，仍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下实行相同或不同的政治制度的两种可能。

大陆如以全面封锁的方法实现统一，这种统一与武力统一的可能形式相同，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下选择相同或不同的政治制度，不过实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大于相同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台湾在全面封锁下接受大陆的统一



要求，则推动了讨论使用什么国号的可能，其惟一可能讨价还价的是保持台湾与大陆不同的政治制度。而大陆是否接受台湾保持其不同政治制度的要求，则取决于当时具体的政治形势。

### 统一台湾的概率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统一台湾的多种可能的结果和形式，但这些分析还都是定性分析，我们并不知道各种结果以及统一形式的可能性各有多大。因此，在这一节我们将用概率的方法进行一些定量分析。

我们已知在三种统一方法都使用的情况下，15年内统一台湾的努力可能导致的结果有三种：**A**、两岸统一，**B**、不统不独，**C**、台湾独立；并且实现统一的基本方法也有三种：**1**、和平统一，**2** 全面封锁，**3**、武力统一。如果每种方法各有三种可能的结果，那么三种不同方法取得的数理结果应有九种：

**A1** 和平统一台湾    **A2** 全面封锁统一台湾    **A3** 武力统一台湾

**B1** 和平努力未果的不统不独    **B2** 封锁未果的不统不独  
**B3** 武力统一未果的不统不独

**C1** 台湾乘和平统一而独立    **C2** 台湾打破封锁而独立  
**C3** 台湾在战争后取得独立

然而，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一旦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就不会有不统不独的结果 **B3**，台湾任何的独立行为都必然导致战争，所以也不可能出现台湾和平独立 **C1** 和台湾打破封

锁的独立 C2 的结果。由于这三种结果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 15 年内以三种方法所取得的结果最多只有六种。在这六种可能的结果里,三种是实现统一,两种是不统不独,一种是独立。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三种统一方法都使用的条件下,15 年内两岸实现统一的概率为 50%,不统不独的概率约为 33.3%,独立的概率约为 16.7%(具体计算见注释)。<sup>①</sup>既然在三种统一方法都使用条件下的统一概率为 50%,那么每种方法实现统一的概率只约为 16.7%了,其中靠和平方法以外的方法实现统一的概率约为 33.3% (具体计算见注释)。<sup>②</sup>

依据前面对两岸政治现实的分析,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从概率意义上讲是空集),因此统一的数理形式只有四种:

- A、“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下两岸实行相同政治制度
- B、“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下两岸实行不同政治制度
- C、新国号下两岸实行不同政治制度

① 统一努力结果的样本空间  $S = \{A, B, C\}$ , 统一的基本方法  $I = (1, 2, 3)$ .

$SA_i = \{A_1, A_2, A_3\}; SB_i = \{B_1, B_2, B_3\}; SC_i = \{C_1, C_2, C_3\}$

由于  $S = 1, A_i = B_i = C_i > = 0$ , 且  $B_3 = C_1 = C_2 = \emptyset$ , 于是

$S = SA + SB + SC = (A_1 + A_2 + A_3) + (B_1 + B_2 + B_3) + (C_1 + C_2 + C_3) = A_1 + A_2 + A_3 + B_1 + B_2 + C_3$ ,

$P(A) = (A_1 + A_2 + A_3) \div S = 1/2 = 0.5$ ,

$P(B) = (B_2 + B_3) \div S = 1/3 \approx 0.33$ ,

$P(C) = C_3 \div S = 1/6 \approx 0.167$ 。

② 由于  $P(A_i) = 1/3P(A)$ , 于是  $P(A_i) = 1/3 \times 0.5 \approx 0.167, P(A_1) = P(A_2) = P(A_3) = P(A_i) \approx 0.167$ 。

由于  $P(A_2 \cup A_3) = 2/3P(A)$ , 于是  $P(A_2 \cup A_3) = 2/3 \times 0.5 \approx 0.333$ 。

#### D、新国号下两岸实行相同政治制度

我们还知道统一的基本方法有三种：1、和平统一，2、全面封锁，3、武力统一。根据前面的分析，和平统一的形式有 B 和 C 两种可能，即两岸肯定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有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和新国名的两种可能，武力的统一和全面封锁的统一都有 A 和 B 两种可能的形式，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下两岸实行相同或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在三种统一方法都使用的情况下，共计六次可以得到某种可能的统一形式，即两次 A，三次 B 和一次 C。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下实现相同政治制度 A 的可能有两次，概率约为 33.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下实行不同政治制度 B 的可能有三次，概率为 50%；在新国号下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方式 C 的可能只有一次，概率约为 16.7%，而在新国号下实行相同政治制度方式 D 则没有可能性（具体计算见注释）。<sup>①</sup> 在六次得到的统一形式中，实行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概率约为 66.7%，实行一种政治制度的概率约为 33.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下统一的概率约为 83.3%，使用新国

① 统一方法的样本空间  $S = \{A, B, C, D\}$ ，统一的基本方法  $i = (1, 2, 3)$ ，

$SA_i = \{A_1, A_2, A_3\}$ ， $SB_i = \{B_1, B_2, B_3\}$ ； $SC_i = \{C_1, C_2, C_3\}$ ， $SD_i = \emptyset$ 。

由于  $S = 1$ ， $A_i = B_i = C_i > = 0$ ，且  $A_1 = C_2 = C_3 = \emptyset$ ，于是

$S = SA + SB + SC = (A_1 + A_2 + A_3) + (B_1 + B_2 + B_3) + (C_1 + C_2 + C_3) = A_2 + A_3 + B_1 + B_2 + B_3 + C_1$ 。

$P(A) = (A_2 + A_3) \div S = 1/3 \approx 0.333$ ，

$P(B) = (B_1 + B_2 + B_3) \div S = 1/2 = 0.5$ ，

$P(C) = C_1 \div S = 1/6 \approx 0.167$ ，

$P(D) = 0 \div S = 0$ 。

号的概率只约有 16.7%(具体计算见注释)。<sup>①</sup>

## 启 示

根据前面对统一台湾的概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四点启示:第一,为了防止台湾独立,大陆必须保持使用非和平统一方法的权利。在 15 年内,如果三种统一方法都使用,统一的概率为 50%,而如果只依靠和平统一的方法,则统一的概率与台湾独立的概率相等。这意味着,如果只依靠和平统一的方法,实现台湾统一和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各占一半。为了降低台湾独立的危险,确保统一台湾的可能性高于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大陆就不能放弃使用武力统一的权利。坚持这一权利是降低台湾独立危险的最主要因素。

第二,为了尽早实现统一,大陆需要研究更多的半和平半武力的统一方法。从以上的概率分析看,和平统一以外的方法实现统一的概率约为 33.3%,高于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掌握越多的非和平统一的方法,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非和平的统一方法中,除了武力统一的方法外,和平统一到武力统一两种方法之间有着广阔的区间。在半和平半武力的统一方法中除了全面封锁外还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大陆应加强此类统一方法的研究。此类统一方法越多,则统一台湾的成功率越高。

<sup>①</sup> 由于  $P(B \cup C) = P(A) + P(C)$ , 于是  $P(B \cup C) \approx 0.5 + 0.167 \approx 0.667$ 。  
由于  $P(A \cup B) = P(A) + P(B)$ , 于是  $P(A \cup B) \approx 0.333 + 0.5 \approx 0.833$ 。

第三，采取两种制度的统一方法有助于两岸的统一。从政策上讲，对两岸统一后是否采取不同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严重影响着台湾民众对统一前景的信心。从上面的概率分析，也可以看到，实行两种政治制度统一形式的概率约为**66.7%**，比实行一种政治制度约为**33.3%**的概率高出一倍。这意味着，两岸在统一模式的政治制度问题上将能相对比较容易地达成一致。如果两岸进行有关统一的政治谈判，可先就两岸统一后是否实行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进行磋商，这将使谈判较容易取得进展。

第四，大陆不会轻易放弃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下统一的政策。目前，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代表，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世界人口的**97.3%**都不承认台湾为国家，而且这种形势在今后**15**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据上面的概率分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下统一的概率约为**83.3%**。概率如此之高，意味着大陆不可能轻易改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下统一的初衷。使用新国号进行统一的概率仅约为**16.7%**，这有双重涵义：一是意味着使用新国号统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二是要想使这种可能超过**50%**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台湾在统一问题上进行根本性的立场转变，采取十分积极主动配合的态度。

（《太平洋学报》1998 年第 3 期）

## 二、美国对台政策的危险

### 1. 美国对台政策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

世人已经看得很清楚，进入 90 年代以来，美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995 年 5 月 22 日美国宣布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访美，标志着美对台政策的调整进入了新阶段。美对台政策已由避免台湾海峡发生危机影响中美战略关系，转为保持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以牵制中国。顿时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危机的可能成为国际焦点。

1982 年中美发表了“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经过一段时间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在 1992 年之前，美国基本上遵守了它的承诺，台湾海峡也维持了 10 年的稳定。就在这一年，美对台出售 150 架 F-16 战斗机，这是冷战后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开始，自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便日益成了问题。

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政策当然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根源，但台湾终归是一个只有 2200 万人口的小岛，外部势力对避免还是加速台湾海峡危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例如，台湾

领导人能否实现访美的愿望取决于美国的对台政策，如果美国不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就不会来得这么快。

政治上，美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使得“台独”分子搞“独立”的愿望增强。1992年12月美贸易代表希尔斯访台，打破了14年不准内阁官员访台的禁令。1994年9月美宣布调整对台政策，允许美台内阁官员可在白宫和国务院以外的政府机构会面，并允许台湾在美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升格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1995年发展到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访美。美提升与台湾关系官方性质的作法，鼓励了台湾当局对内允许分裂活动合法化，对外采取双重承认的政策，为台湾独立创造条件。随着“台独”势力的快速发展，台湾海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了。

军事上，美不断扩大对台军售，加强台湾军事力量，使得“台独”分子冒险独立的胆子越来越大。1992年起，美对台出售了舰载导弹、舰用大炮系统、反潜装备、巡航导弹防御装备、反导防御系统、扫雷艇、战斗机、预警飞机、攻击直升机、战斗机电子设备、坦克，此外还出租了巡洋舰和坦克登陆舰。美对台军售使台湾当局认为美会参与台湾海峡军事冲突，美军事支持能保证台有足够军力抵抗大陆为维护统一可能动用的军事力量，这样就低估了独立导致海峡军事危机的可能性。近来台军方多次宣告“台湾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安全”，并搞军事演习挑战大陆军事力量。美对台军售还刺激了他国对台湾军火市场的争夺，使这一地区出现了潜在的军备竞赛危险。

外交上，美支持台湾的“扩大国际空间”政策，帮助台湾加

入国际组织,使得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更加活跃。1994 年美宣布“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寻求在一些国际组织中能够听到台湾声音的机会”。美国还支持台湾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一些经济组织,以帮助台湾重返国际舞台。美国这种外交支持鼓励了台湾当局开展“金钱外交”,拒绝与大陆进行任何形式有关统一的讨论,从而使台湾海峡的局势日益紧张。

为什么美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关键在于冷战后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是否对美有利。这一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对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对美国则不然,紧张局势发展成军事冲突并将美国卷入其中,这当然是美国所不愿见的,但如果台湾海峡维持适度危机,美国则获益不小。

美国维持台湾海峡适度危机可满足其冷战后的多重政治需要。冷战后,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后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台湾海峡适度危机可以拖延中国统一进程,减缓中国崛起速度,为美支持台湾的“和平独立”争取时间。美国要保持其在东亚的主导权,就必须保持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然而,冷战后东亚国家不像以前那样支持美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菲律宾收回了苏比克湾基地,日本冲绳地方政府提出逐渐关闭美军基地的要求。台湾海峡适度危机则可为美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冷战后世界军火市场萎缩影响了美国的军工产业,对美国的失业也有一定影响。台湾海峡适度危机则有利于美国向东亚地区出口军火。在过去的 5 年



中，美国仅对台湾就出口了价值超过 75 亿美元的武器。

今后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影响取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取向，即介入还是不介入台湾问题。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美国选择介入政策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这种介入政策可能是有限的，因为美国未必愿意为台湾独立与中国兵戎相见。但是，如果美对台政策沿着有限介入的道路滑下去，那么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将难免走向危机。玩火难免会烧着手指头的，美国当局也好，台湾显性和隐性“台独”分子也好，必须明白，中国在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大问题上，没有退步的余地。

（《瞭望》新闻周刊 1996 年第 10 期）

## 2. 美在科索沃打赢或输对台湾问题都有负面影响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博士说，不论美国在科索沃打赢打输，对台湾问题都有负面影响。

美国如果在科索沃打赢了，对“台独”分子就更坚决支持，“台独”势力会更大；如果打输了，台湾认为美国靠不住，于是自己加快军备竞赛。所以，都没好结果。

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的阎学通，是应邀到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讲学前夕，接受本报专访，畅论台湾问题的。

他说，美国如果在科索沃用兵成功，“台独”分子会说：“美国在科索沃都能用兵，怎么会在台湾不用兵？因为美国在科索沃的战略利益跟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不可同日而语啊！”

反过来,美国如果输了,就会更愿意“我卖军备给你(台湾),你自己打去吧”。结果是两岸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

而“最大的危险”,他说,就是美国总统和台湾的“总统”大选都在同一年。

“为了大选,美国那边要表示对台湾支持是坚决的,对华政策是强硬的;台湾这头,为了大选,如果民意往独立方向转移,也必然要宣扬自己是代表独立的。”

一种极可能出现的更危险的情况是:如果国民党下台,以后为了夺回政权,调整政策,比民进党独立还积极;而民进党则为了保住刚上台的权力,也要更积极搞独立。最后,就成了“独立竞赛”。

阎学通说:“其实谁也不想独立,但为了选票,都要比对方更积极搞独立。而到时候,美国大选也同时进行,也同样得表现自己支持民主制度,人们也就忽视这种倾向带来的危险。”

阎学通也指出,台湾问题的危险性,还包括美国可能出售“爱国者导弹-3型”给台湾。

研发即将完成的爱国者导弹-3型,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一个构成部分。

尽管爱国者导弹-3型是低层防御,但阎学通说,对中国来讲,它和台湾目前拥有的爱国者导弹-2型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将变相恢复美台防御同盟。

“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阎学通解释,爱国者导弹-2型由台湾自己控制,但-3型的控制中心都是在美国,发射不发射由美国决定,这就等于恢复了美台军事结盟了,也等于推翻了当年中美建交的基础。

“你和台湾都搞军事同盟了,我中国还跟你美国搞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阎学通指出,这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战略问题,不是个军事问题。所以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在东亚部署 TMD。

据他所知,爱国者导弹-3 型已经试验成功,大概再过 6 个不同性质的测试就可规模生产。

他说,事实上,美国增加对台武器出口的数量或水平,都是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必然影响中美关系。

至于布什政府 1992 年卖 150 架 F-16 战斗机,阎学通说,当时发生 1989 年(六四事件)不久,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非常困难,但今天跟当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阎学通还认为,尽管 TMD 不能有效地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但是,如果有了很昂贵的 TMD,台湾当局就必然要告诉老百姓,说这个东西“非常有效”,既然是“非常有效”的挡箭牌,“台独”分子就说:“大陆打不进来,独立是没有危险的。”

他说,现在民进党不宣扬“台独”,是认为这样有利于它当选。他们向“中间路线”转移,动力在于克林顿“三不”(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三不”使台湾选民意志发生变化,所以民进党向中间靠拢。

但克林顿的“三不”是个人政策,不是美国政策,是在上海一次个人小范围座谈会上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政策,是只在他在任期间有约束力。下一任总统上台以后,他可以说,第一,没有正式文字,第二,这不是总统在什么地方重申,而是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讲的。

阎学通说:“任何一个总统都可以说那只是克林顿的政

策。不像三个联合公报,是美国政府签字。”

他警告,从 1989 年到现在,台湾岛内的大趋势是往“台独”方向发展。往“中间路线”靠拢仅仅是克林顿宣布“三不”以后这半年的回潮。但一年半后新总统上台,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

对于美国借口中国部署导弹对准台湾,所以要提供台湾 TMD,阎学通反驳:“中国本来就是摆明要威慑台湾分离主义,美国不接受又怎么样?我就是要威慑台独分子,使台湾分离主义不敢有任何动作,因此,当然要增加导弹部署,用不着说一套干一套。”

对于日本参加 TMD,他指出,中国反对的核心也是在于日美同时要包括台湾海峡。

“中国反对它们为台湾提供安全防御。”阎学通说:“你名义上是自己搞,其实是弄来给台湾,中国一定要反对。”

中国也认为,美日联合开发 TMD,实际等于美国向日本转让导弹技术,加强日本的进攻能力。

他说,如果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向台湾出售 TMD 系统,中美互相猜疑必然严重,军备竞赛必然恶化;中美关系紧张,结果两岸关系也势必跟着紧张。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5.17,采访记者:周锐鹏)

### 3. 台海一旦有局部战争美日卷入可能性颇大

中国的国际安全问题学者阎学通公开表示,一旦台海发生局部战争,美国和日本卷入的可能性颇大,而且,局部常规

战争有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危险。

阎学通是前晚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专访节目中发表上述看法的。

被问到美日是否会卷入台海战争时，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阎学通肯定地说：“美国不会不卷入，不卷入台海冲突是不可能的，（问题）仅仅是它卷入的程度深浅而已。”

他指出，美国在李登辉宣布“两国论”之后，宣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宣布对台出售 E-2T 预警机和 F-16 配件。

“非常明确，美国实际上对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并不是采取遏制政策，仅仅是：我不希望你把我拉到战争边缘来，但如果你能和平实现独立的话，我会为你提供安全支持。”

阎学通说，如果战争打起来，首先，美国一定对台湾继续提供军事情报；第二，继续提供军事装备，可能提供更多；第三，不能排除美国派少量不直接参加第一线战斗的军人。

不过，阎学通补充说，这一切要根据到时具体情况来决定，这不仅中国无法预测，美国自己现在也不知道。

阎学通认为，如果美国决定全力支持台湾分离主义分子进行这场战争，日本会站在美国一边，因为日美防务合作新纲领非常明确用了“周边地区”一词，心目中仍把台湾包括在内。

“到了战争发生那一天，日本不卷入的可能性小于卷入的可能性。新的指针（纲领）既然这么不愿意把台湾从‘周边地区’中排除出去，就表示了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用意。”

阎学通还批评美日“并不希望见到中国统一”。

“美国、日本常说,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潜台词就是支持台湾和平独立。它们认为和平统一做不到,如果可能做到,可能就不支持和平统一了。它们说不同意利用军事力量实现统一,但也不支持用武力方法实现独立。”

不过,阎学通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大国(即中国),对于大国,它会协商,美国如果卷入,战争很可能会从局部常规战争向全面核战争发展,升级的危险是存在的,所以美国不会不慎重考虑。

但他说不能据此断定美国不会卷入,因为美国国内反华情绪还比较强。而且现在是美国大选期间,台湾问题变成民主、共和两党之间一张牌,都要表示支持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

阎学通也指出,李登辉把台湾的正式独立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内容是“公开”,第二个内容是“宣布”。现在先公开,到一定程度才宣布独立。李登辉的作法已等于开始正式独立,还差半步台湾就正式独立。因此,无可避免带来两岸(类似)50年代的军事紧张状态。

但他警告,台湾不是科索沃,因此,战争一爆发,任何国家都无法含糊不表态。战争将对世界安全格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8.7,采访记者:周锐鹏)

### 三、《台湾的主张》是“台独”宣言

#### 1.《台湾的主张》主张什么？

今年 5 月 20 日，一本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台湾的主张》的书正式印行。由于这不仅是李登辉个人的一本“自传”，更因为李登辉在其中进一步宣扬了自己要使台湾一步步趋向独立的理论，所以该书刚一问世便招致了十分激烈的争论。

政治家在位时就发表自传是一种奇怪的行为，李登辉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显然有其明确的政治意图。

阎教授首先对记者谈到，一般政治家出于自身时间和精力限制，更出于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及避免政治麻烦的考虑，很少在退职之前就出版自传，《台湾的主张》在这个时间出版是需要长时间的筹划和预谋的。李登辉在此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岛内下一届的“大选”，因而他很可能在上次竞选连任成功后就开始筹划这样一本书，希望用这样的书在下一次的“大选”中发挥两点作用：一、影响“大选”的走势，引导台湾民众去选一个按照他的思想路线走的人，使下一任领导人不会批判他的路线；二、也就是他整个这本书的核心：即宣扬他所认为的台湾独立的思想。阎学通说，在书中，李登辉拿出了自己台

湾独立的大方向的纲领,其中有目标、有方针、有原则、有策略。这不但是他一贯的台湾独立主张的延续,而且是他的台湾独立理论的系统化。

书中充斥的是一种狂妄、一种自负和一种虚伪的心态。

由于正在新加坡讲学,阎学通教授可说是最先(5月21日)读到这本书的人之一。他说新加坡的华人大多从《联合早报》对本书第一和第八章的摘要中了解了书的内容,他们无不对李登辉非常反感。“我和他们交谈,他们觉得这个人太狂,他把自己扮成世界级领导人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将来亚太地区的命运系于台湾’,又把自己描述成台湾救世主,这就令自己的地位无以复加。他还借亨廷顿的嘴骂李光耀的能力不过适用于一个小岛。另外,他把整个台湾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全部归功于自己,330多页的书中,提到蒋经国对于台湾经济贡献的不足一页,书中120多张照片中,没有一张他与蒋氏父子的合影。他到处说台湾的发展是从他上台这10年开始的,他自称是‘开创台湾历史的人’。”

李登辉自己曾对日本人司马辽太郎讲,台湾人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他认为是自己给台湾带来独立的可能,使台湾人有了“生为台湾人的幸福”,所以他这句话的本义就是“生为台湾人的独立的幸福”。

大多数的批评集中在书中所提出的所谓“七块论”上,但其实那并不是该书的核心,书里更多的是从文化上反中国,力图建立一种“新台湾”的“民族认同感”。

阎学通认为《台湾的主张》以自传的形式出台,包含两个意图:李登辉要把自己的政治意图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使自



己的政治意图不那么直露;另外,他要显示、炫耀自己,表明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不是政治,而是文化、是哲学。

记者谈到,目前媒体更多地是在批评书中荒诞地提出要将中国分成七个独立国家的理论,阎教授指出,其实“七块论”并不是他这本书的核心,“七块论”在书中只有两行半,而且连七块是哪七块都没有说全。书中流露更多的,是一种敌视中华文化的心态,极尽其能贬低中国文化。他批李光耀也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因为李光耀建立的正是以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模式,李登辉对这种体系很反感。

李登辉从小在日本长大,他从心底里赞扬日本文化,他认为台湾要走的路是:日本的文化,美国的制度,并否定中国文化。他始终表现了一种对“中国人”概念的敌视。阎学通说,这不仅仅是反共反大陆的心态,而是从整个文化上的敌视。李登辉认为现在的台湾有两个民族主义,一个是中华民族主义,一个是台湾民族主义,他说要放弃前者,坚持后者。他的书一上来就讲,要想台湾独立,必须使台湾人有自己的认同,即台湾人的民族感,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抛弃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国人的身份。

培养“台湾人”的认同感,争取美日的外部支持和采取迂回道路走向独立,是李登辉的台湾独立策略。与民进党激进的独立策略比,李的策略是个长期隐患。

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阎学通将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表明策略总结为(对内)培植台湾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外)争取美日对台独立的支持,以及采取迂回道路争取实质独立。

他介绍说：“李登辉的策略不同于民进党的激烈的政策，他总是讲作为政治家要‘迂回’，以求‘水到渠成’。也就是说，要一步步走，每一步走的时候都不至于激化，直到产生质变时，人们也体会不到突变。这样看起来好像每一步走得都很小，但最后性质就变了。李登辉自己就曾说他在台湾独立的目标上和民进党没什么区别，区别仅仅在于是明独还是暗独。”对于两者的危害性，阎学通说民进党的策略是即时的，会很快引发台海之间的战争，对我们自己的建设会带来破坏；而李登辉的策略是长期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隐患。

如果李登辉的独立纲领得到默许，不排除他在任期内将独立路线官方化的可能，我们在心理和物质上应作准备。

阎学通认为，李登辉出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试探岛内岛外对他的反应。如果被接受的程度比较好，没有导致岛内的大危机，他很有可能力争在他辞职之前使“台湾曲线独立”的纲领官方化。“如果这一步他迈出了，那么今后岛内任何人想要改变这样一个官方的政策都是极为困难的。这是他搞台湾独立的步骤之一。”而他的主张被接受情况怎么样，在此书出来半年之后就会十分清晰。

记者问及本书对两岸正在发展的关系的影响，阎教授说：“目前最大的影响是，为两岸间尽早进行政治谈判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带来了阻力。另外，我感觉他在此时推出此书，暗含着的一个意图是，在他任期之内，不允许两岸进行政治谈判。他在书中把台湾说成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使得政治谈判没法进行了。”

阎学通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期待祖国统一的两岸人民应

作好心理和物质的准备——心理准备是要知道：1.在李登辉的推动下，台湾独立的趋势越来越大，和平统一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大；2.寄希望于在李登辉时期两岸关系得到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而物质方面，我们不能排除李登辉走向极端。因为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李登辉有很非理性的方面，比如他在第一章和第八章反复讲道，“爱台湾要爱到粉身碎骨”，所以不能排除他走向极端的可能性，需要防备意外事件的发生。

阎教授最后说：“一旦李登辉的独立主张官方化后，就等于把和平统一的道路全部堵死了。我给一个台湾朋友通电子邮件的时候讲道，李登辉说他给台湾人带来‘生为台湾人的幸福’，但如果他这样做，恐怕他给台湾人带来的是‘生为台湾人的灾难’。台湾朋友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只因为我住在台湾，不敢像你这样讲话。’”

（《环球时报》1999.6.4，记者：宋念申）

## 2. 培植“新台湾”民族主义思想

### ——评《台湾的主张》（之一）

今年5月20日，李登辉出版了他的自传《台湾的主张》。通读全书后，读者便会发现，这本书的书名其实是《台湾独立的主张》。为了突出他主张台湾独立这个主题，李登辉还刻意在书的封底以“生为台湾人的幸福”为警句与封面的《台湾的主张》相呼应。李登辉曾对日本记者说，台湾人不能独立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如今他企图使台湾独立，他将此称为

“生为台湾人的幸福”，也就是独立的幸福。李登辉在书中全面阐述了他为台湾独立所进行的设计和实现。为使世人了解李登辉的纲领，本文将对其独立主张进行系统的分析（文中的页号以该书远流出版社 1999 年 5 月 20 日的初版为据。）

李登辉创造多种台湾独立理论，在台湾培养台湾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李登辉深知台湾能否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台湾人是否拥有强烈的台湾民族意识。没有极端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就没有台湾独立的社会基础。因此，李登辉创造了以“新台湾”为核心的多种“台独”理论，从思想意识上为其实现台湾独立的政治目标创造条件。

首先是培植“新台湾”民族认同感。在开章明义的第一章，李登辉就提出应培养台湾人的民族认同感（identity），也就是台湾人独自的民族身份。他说：“所谓‘认同台湾’我想最重要的，是对于台湾的爱。我经常提到，将来领导台湾的人必须是非常爱台湾，而且是可以为了台湾，不惜粉身碎骨来奋斗的人。”（p.62）爱到可以粉身碎骨，当然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由于历史上台湾居民的第一民族认同感是中国人，而且在中国人的大概念内有着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为了使本省人与外省人都以台湾人为第一民族认同感，于是李登辉提出了“新台湾人”的概念。他明确提出“新台湾”的“新台湾人”包括原住民和以往四百年里来到台湾的大陆人，而且是“心系台湾，愿意为台湾牺牲奋斗的人”。（p.271）他还建议应用“台湾第一”的口号来实现外省人与本省人的民族整合。（p.252 ~ 263）

其次是培养台湾人的主权意识。为了激发台湾人的极端

民族主义情感。李登辉强调台湾人要有主权意识。他说：“强调‘台湾’的意识,认为台湾人民必须真正拥有主权,才能充分发挥自由的意志,开创自己的未来。”(p.76)在国际关系史上,主权历来是指国家的主权,而为了使台湾人形成新的主权要求,于是李登辉发明了“主权在民”的理论。(p.76)这个理论就通过否定国家拥有主权的概念,来否定中国在台湾的主权:通过将一国全体居民的概念偷换成台湾全体居民的方法,来论证台湾的居民拥有国家主权的观点。李登辉这种台湾人应拥有主权的说法,一方面要证明台湾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合理的;(p.77)另一方面是为了激起台湾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主权问题最容易激起人的那种情感。

三是修改史书培养台湾原本是国家的概念。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甚至可以说都是移民国家,而且在多民族国家内居民迁徙是普遍现象。然而为了促使台湾居民形成台湾民族认同感,李登辉利用历史上居民迁徙的现象,宣扬台湾是移民社会,因此应成为移民国家的观念。他指示学校:“在历史教科书方面,我认为必须增加有关台湾本土的历史介绍,不应只是讲述中国朝代的更迭的历史。台湾先有原住民,继而有明清时代自中国大陆沿海来台湾的移民,还有战后随国民政府迁台的新移民,共同建立了今日的台湾……理想的历史教科书,应该包括史书对台湾的记载,并述说时代的变迁,以证明台湾存在的事实。”(p.138)李登辉这里所说的“台湾存在的事实”绝不是历史的存在,因为中国所有的省和自治区都有自己历史存在的事实,他是想说台湾作为国家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在书中,李登辉随处都称台湾为国家,而不认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文汇报》1999.6.7)

### 3. 企图实质独立的迂回策略

#### ——评《台湾的主张》(之二)

李登辉深知民进党那种以“台湾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作法是不现实的。由于公开搞“台独”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战争,而且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李登辉采取了走迂回道路先搞实质独立的方针。

首先,李登辉提出了迂回独立的战略方针。他在书中反复解释了实现台湾独立需要采取迂回方针的重要性,因此不需要解释,只要照抄原文就可明白他为何采取“水到渠成”的独立政策。他说:“要作出最周全的决策,政治家在面对问题时,绝不能只作直线思考。政治问题绝无捷径。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只想找出最迅速便捷的途径。而必须考量各种因素,作为最妥善的处理。因此,通往目的地的最佳途径,不见得是直线,有时稍作迂回反而更容易解决问题……尤其是,目标越大,越需要有迂回的策略,直线作法往往带来反效果,不可不慎。”(p. 81 ~ 82) 李登辉之所以能蒙蔽台湾岛内外一些人,使人们误以为他不反对中国统一,其根本就在于他采取的迂回独立方针不易识别。

其次,李登辉采取了变相修改“国号”的方法,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成立“台湾共和国”,于台湾实现独立的目标不利,因为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将危及到台湾的生存问题。

(p.240)于是他明确提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将台湾定位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既具有国家的主体性,也保持了台湾的“主权独立”。(p.240)李登辉之所以提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称谓,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模糊“台湾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界线,为将来用“台湾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国号创造过渡的条件。“中华民国”的英文缩略语是 **ROC**,“台湾共和国”是 **ROT**,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 **ROCT**,兼顾了前两者。二是在国际上造成台湾使用“新国号”的既成事实。台湾已多次在国际场合使用 **ROCT** 这个缩略语为“国号”,使国际社会认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新独立的国家。第三,李登辉采取实质独立的路线,他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台湾是不可能名正言顺独立的。因此台湾当前主要的目标是争取实质上的独立。用他的话讲,就是“为了证明台湾存在的事实,就必须与其它国家建立关系。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有困难,建立以经济为主的实质性关系也无妨。倘若连建立经济关系都困难的话,则可退而求其次,建立文化或其它的交往关系。”(p.126)他认为应以这种务实的作法来确保台湾的“存在”和彰显台湾的“丰承”,只要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台湾的“存在”,台湾就实现了实质独立的目标。(p.125~128)他还告诫以后台湾的领导人,要在他取得的实质独立的基础上,发挥历史经验,使台湾的“存在”永远保持下去。(p.273)

(香港《文汇报》1999.6.8)

#### 4. 争取美日支持“台独”的企图

##### — 评《台湾的主张》(之三)

李登辉深知,独立运动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成功:一是母国中央政府垮台,地方势力可以乘机实现独立。冷战后,前苏联共和国的独立是典型范例。二是外部势力的大力支持,分离主义才能获得独立地位,如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共和国。冷战后,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社会法制化建设不断发展,中央政府的威望不断提高,因此台湾分离主义不可能期望通过中央政府的垮台来实现独立,于是李登辉把独立的政策重点放在了争取美日的支持上。

首先,李登辉争取美日对台湾独立的军事支持。李登辉认为,“‘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因此当台湾安全受威胁时,美国便无法坐视不管。(p.174)李认为目前美国的军事支持仅能保持不实现统一,还不足以保证台湾实现独立,要实现台湾的独立,还需要与美国“考量全球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并说,“美方提出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TMD)的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此一建设终难成功。”(p.179)李登辉希望通过参加美国的 TMD 计划,恢复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在美国不正面允诺军事支持台湾的情况下,李登辉希望日本能为台湾提供一定的安全支持。他对日本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感到难过,特别是“看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采取令人不成熟的行动,更感到十分遗憾”。(p.207)他建议“日



本不应自陷于宪法争议，而应重新考虑与美军合作的范围……应该包括日本运输船的运输能力，也应该包括台湾驱逐舰装备之相互识别等等”，(p.204)也就是说，日本应明确日美同盟包括了台湾的安全问题。

其次，李登辉争取美日对台湾独立的政治支持。李登辉劝告美国和日本要支持台湾的“存在”，因为这关系到美日自己的战略利益。他说：“在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方面，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参加支持，因为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很大的关系。”(p.179)为了争取日本对台湾独立的政治支持，他说，“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周边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p.246)总之，李登辉想通过从政治和安全两方面把台湾与美日绑在一起，从而使美国和日本不得不支持台湾的独立。他甚至向美日建议把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他说“亚洲的未来亦系于台湾的存在”，为了亚洲的安全，最理想的是把中国分成七个区域，台湾为其中一个区域。(p.240~241)。

(香港《文汇报》1999.6.9)

## 5. 延续“台独”政策的宣言书

### ——评《台湾的主张》(之四)

李登辉在退位之即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绝非偶然，似乎是在发出加快台湾独立步伐的号召。一般讲来，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是不会写自传的，一方面是在紧张的政

治斗争中没有时间写自传，另一方面是自传出台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政治麻烦。而李登辉违反常规，在离职前一年半出版自传，这显然是深思熟虑的计划。政治人物出版一本自传关系到其身后政治声誉，因此写作过程必是十分谨慎，决非临时决定的。李登辉能在此时出版自传，其计划必然制定于一两年之前。为何李登辉要抢在 1999 年上半年出版名为《台湾的主张》的自传呢？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于李登辉这种反常的政治行为，人们可以根据台湾大选的形势作出两种分析。一种是，李登辉担心下届台湾领导人改变其台湾独立的政治路线，因此急忙出版此书，引导台湾人民投票给搞“台独”的人。李登辉在书中就下届台湾领导人的资格作了明确的规定。他说：“将来领导台湾的人必须是非常爱台湾，而且是可以为了台湾，不惜粉身碎骨来奋斗的人。”(p.62)而且“‘新台湾人’所选择的政治领袖，必定是可以廓然面对台湾的历史过程，善用历史智慧，前瞻未来的人。”(p.271)他希望台湾未来的领导人能在他所开创的台湾独立的历史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的经验力量，让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永续延伸。”(p.272)在目前可见的三个候选人中，只有宋楚瑜公开反对李登辉的台湾独立政策。但宋楚瑜目前当选的势头又盛过连战和陈水扁。因此李登辉此时出版《台湾的主张》是为倾向独立的候选人进行助选，以便其独立的政策能继续贯彻下去。

另一种是，李登辉为保持他设计的台湾独立目标最终得以实现，利于其任期最后的两年时间，将台湾独立目标正式

和官方化,使任何人执政都无法逆转台湾独立的方向。《台湾的主张》其实就是以李登辉个人名义发表的台湾“独立”纲领,如果这一个人纲领在一年半内得到岛内外的默认,在其正式辞职之前,他则有可能以台湾当局官方的名义发表一个有关台湾独立纲领的正式文件。只要台湾官方发表了这样的正式文件,台湾和平统一就不可能了,而李登辉作为新台湾国家的奠基人的历史地位也就无可争议了。

李登辉此时推出《台湾的主张》一书,不能不使人们怀疑李登辉有走向公开独立的危险,两岸人民需要考虑如何防止他走向极端,同时需要作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香港《文汇报》1999.6.10)

## 6.从《台湾的主张》看李登辉的政治情感

李登辉的自传《台湾的主张》,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不是一个中国人。李登辉在该书中全面发泄了对中国的民族仇恨,似乎只有将中国从地球上消灭才解他心头之恨。

李登辉对中国的仇恨充分表现在他分裂中国的纲领中。他的全书贯穿了台湾独立的思想,他提出“新台湾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台湾“主权在民”的独立理论,台湾领导人必须是“为台湾粉身碎骨”的人这种民族主义标准,通过迂回道路搞实质独立的“务实外交”以及与美国共同将中国分裂为七个部分的政策。

读了全书便可发现,该书的书名其实是《台湾独立的主张》。为了突出他分裂中国的“台独”主张,他还在书的封底写

上“生为台湾人的幸福”。根据他的解释,他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讲过,台湾人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他使台湾人有了独立于中国的希望,变成了“生为台湾人的幸福”。这句话的全文就是“生为台湾人的独立幸福”。

李登辉对中国的仇恨还表现为他对中华文化的贬低。中华文化有 5000 年的历史,其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而且中华文化并不局限于中国的领土之内,它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吸收。而李登辉则把中华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他借中国文人之口,说中华文化是大酱缸,中国人是爱面子文化,遇事不思解决,只求自我安慰。

为了贬低中华文化,他竟然连逻辑关系也不顾,说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体制之下,传统文化受到扭曲,也使社会产生了许多积习难改的弊病”。他忘了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从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怎么可能不受到封建体制的扭曲呢?除非传统文化是指封建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文化,而奴隶社会的文化又怎么能比封建社会的文化更先进呢?

由于对中华文化恨之入骨,李登辉对坚持中华文化的国家和政治家也怀恨在心。他借美国人的口,攻击新加坡的政治家李光耀。李光耀的成就是在新加坡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建立了亚洲模式的现代化社会。李光耀的政治成就是全世界公认的,然而李登辉说,“李光耀的政治体制,将与其长眠地下”,而且认为李光耀的能力不过适用于一个小岛。

李登辉强烈的日本情感也许是他对中国仇恨的原因之一。李登辉在书中明确写到,他人生的前 22 年是在正統的日本教育中长大的,日本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对日本文化的

高度崇拜，使他为日本不能称霸亚洲而遗憾。他认为日本在美国面前硬不起来“真是匪夷所思”，而对中国不能强硬则“有害无益”。他在书中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对华强硬，要阻止中国强大，要与美、台共同遏制中国。

为了促使美日支持台湾独立，李登辉在书中全面解释了为何美日应该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他在书中反复讲台湾的“存在”不仅关系到台湾本身，而且关系到美日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他甚至说如果台湾被大陆统一，日本的“存在”将受到严重威胁，他要美国和日本在安全与政治上多方面支持台湾的独立。

一般说来，政治人物都是在离开政坛之后才写自传，因为在职期间忙于政治争斗，没有时间写自传，而且出版自传如有不妥之处，还可能会给作者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政治人物的自传常是反复修改，慎之又慎。李登辉此时推出自传，其计划必然在一两年之前就确定了。李登辉违反常规早早推出这样一本自传的用意是什么呢？从其对中国和对中华文化的仇恨心理分析，不能排除李登辉在辞职前走向公开独立的危险。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5.26）

## 7. 李登辉的危险主张

### ——评李登辉自传《台湾的主张》

李登辉的自传《台湾的主张》出版后，许多人对李登辉为台湾设计的科索沃之路无动于衷。笔者就此书谈一点管窥之

见,和海内外学者专家作一交流。为防误解该书原意,本文尽量引用该书原文。

《台湾的主张》的核心是台湾独立。该书共分八章,从头至尾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台湾要独立。

第一章是讲培养台湾的民族认同感对台湾独立的重要性。李登辉说:“所谓‘认同台湾’,我想是最重要的。”

第二章是解释为何台湾要走迂回的独立道路,“目标越大,越需要有迂回策略”。

第三章是说明台湾需要采取“务实外交”的方法来争取国际社会对台湾独立的认可,并且当务之急是“确保台湾的‘存在’,并彰显台湾‘存在’的事实”。

第四章则提出要以“民主”为理由反对大陆的和平统一政策,要“明确拒绝‘一国两制’”。

第五章要求台湾人民坚定美国会支持台湾独立的信念。李登辉说:“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

第六章是鼓励日本大胆支持台湾独立。李登辉对“日本未能发挥其潜在能力……感到难过”。

第七章则建议美日台三方共同行动把中国分裂成若干块,为台湾的独立创造条件,即“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

第八章号召台湾外省人与台湾本地人团结一致,为台湾的独立而共同奋斗,“让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永远延伸”。

纵观这八章内容,该书的真名其实是《台湾独立的主张》。

为了与其书名相互呼应，李登辉在封底标上了“生为台湾人的幸福”的字句，而其真实含意是“台湾人独立的幸福”。

在书中李登辉援引了当年他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说过的“生为台湾人，却有一种对台湾无能为力的悲哀”。李登辉说，历史上台湾人没有治理自己家园的权力，而如今经过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将台湾人带上了独立之路——而大陆上的中国人却没有分裂的机会。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治学的原理还是人类历史的经验，无一不证明强行搞民族分裂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冷战后的事实是，分离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加剧。1946 - 1989 年世界上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190 起，年均 4 起；而 1990 - 1998 年发生各类军事冲突共 310 起，年均 34 起。李登辉的分裂主义目标将给台湾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历史将会作出最后的裁判。

笔者还想说的是，迂回独立的策略因其隐蔽性而十分危险。李登辉搞独立的野心之所以长期未引起人们注意，根本原因是他采取了曲线独立的策略。李与民进党在台湾独立的目标上毫无区别，只是策略不同，他说：“通往目的地的最佳途径，不见得是直线，有时稍作迂回反而更容易解决问题……直线做法往往带来反效果，不可不慎。”因此李登辉试图通过“蠕变”的方法来使“中华民国”变为“台湾的中华民国”进而再变成“台湾共和国”。李登辉自认为这种曲线独立的策略可以掩盖台湾从“自治状态”转向正式独立的质变过程，从而使台湾可以不经历战争而最终实现独立。这种迂回策略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瞒过所有的人，特别是不可

能改变量变到质变必然有一个临界点的客观规律。当台湾分离主义者走到这个质变的临界点时，迂回独立的策略也就避免不了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台湾的主张》出台的目的,是要继续推进台湾独立的图谋。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政治人物一般是在去职之后才开始写自传。但李登辉一反常规,在离职前早早推出自传,这不能不让人问一个为什么。政治人物的自传关系到其身后的名声,因此需要字斟句酌,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因此可以推测李登辉是在赢得连任后就着手《台湾的主张》的撰写,并且是刻意要在 2000 年“大选”前一年半推出此书。书中李为下一任台湾领导人制定了政治标准,即“必须是非常爱台湾,而且是可以为台湾不惜粉身碎骨来奋斗的人”;“必定是可以廓然面对台湾历史过程,善用历史智慧,前瞻未来的人”。前半句是要求台湾的新领导人必须是个死心塌地坚持“台独”目标的人,后半句则要求该人继承其曲线独立的政治“智慧”。此时推出这样一个标准,显然是想引导台湾民众的投票倾向,但更深层次的用心可能是李登辉准备将台湾独立的纲领正式化和官方化——先是以个人名义推出台湾独立的纲领,而后利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半时间,用官方文件将这一纲领正式确定下来(如“改宪”)。这样无论谁上台执政,“台独”都成为政府不可改变的政治方针。

仔细回顾李登辉自 1988 年执政以来在台湾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人们便可发现许多曾鞍前马后为其效力的人,都只因还保持有一点民族统一的思想,最终都被他整下了台。仔细读一下《台湾的主张》,人们就可以体会出李登辉为台湾



设计的科索沃之路还有多远。如果李登辉执意要在离职前走到独立的临界点，希望和平统一的人们将不得不早作准备。

(《南方周末》1999.7.23)

## 四、两岸政治谈判的症结

### 1. 两岸政治谈判的症结与前景

目前两岸政治谈判无法进行，主要是因李登辉个人政治理念和个人利益所造成的，因为李登辉只想当台湾“总统”，而没有中国人的概念，自然对两岸谈判没有兴趣。

春节前夕(1998年1月26日)，中国政府组织了促进两岸统一的大型座谈会，当时的钱其琛外长呼吁两岸开启政治谈判，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政治谈判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的社论。为了促进两岸的政治谈判，中国大陆政府此次呼吁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和平统一的诚意，李登辉再找拒绝政治谈判的借口已很困难。

首先，为减少台湾民众对谈判地位能否平等的担心，大陆建议可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进行磋商，先就政治谈判的议题、代表名义、方式等问题达成一致。其次，大陆对谈判对象不加限制，同意与台湾党派交换意见，甚至包括在统一问题上持抵触情绪的人。再次，大陆愿通过结束敌对状态的方法，满足台湾民众的安全愿望。此外，大陆还主动对台湾“不预设条件”进行政治谈判的条件做出反应，将“一个中国”只作为发展两岸关系的原则，而没作政治谈判的条件。

### 台湾设定诸多条件

从上述大陆对台湾政策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愿意无条件地开启政治谈判，对谈判并无附加条件。相反，台湾政府却给两岸政治谈判设定了许多条件，例如先恢复事务性商谈，再进行政治谈判，不同意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政治谈判，要在大陆承诺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才进行政治谈判。

李登辉阻止两岸政治谈判，其核心是怕中国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属于中国，两岸关系不是主权国家关系，因此两岸政治谈判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反之，要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政治谈判又是最基本的前提和过程，不进行政治谈判，和平统一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李登辉不过是以阻止政治谈判的方法抵制两岸的和平统一。

### 谈判是双方的意愿

两岸开展政治谈判和实现三通已经不是大陆单方意愿，台湾民众这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增长，一些台湾的政要也认为两岸的政治交往是必要的。台湾省长宋楚瑜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两岸最大的问题是彼此不了解，两岸应加速谈判，领导人互访，增进了解。国民党副主席连战在海外也表示政治谈判应该考虑。民进党主席许信良认为，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不能靠事务性谈判拖延时间。有关两岸政治谈判的国际舆论不断增加，不仅一些欧洲国家希望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美国克林顿政府也希望两岸能开始政治谈判。应该说，两岸政治谈判的国内外条件和朝野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只差李登辉个人立场的转变了。

李登辉阻止政治谈判既有个人政治理念的因素，也有其个人利益的因素。他青年时代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制度下形成的人生观，缺少中国人最起码的中华民族的概念。自从执政后，他只讲台湾有 2200 万人，从不提到海外有几千万华人，更不提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一个一心只想当 2200 万人的“总统”而没有中国人概念的人，对两岸政治谈判自然没有兴趣。李执政后，想作台湾历史上的“伟人”。然而与已故台湾领导人在台的业绩比，他无力靠提高台湾的经济水平来奠定其历史地位，因此他选择了分裂的道路，希冀把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以此成为台湾的“伟人”。这一政治抱负与国家的和平统一背道而驰，所以他对两岸政治对话和“三通”从本能上持反对立场。去年 11 月 30 日《联合报》的民意测验结果是，台湾民众对李登辉满意的是 30% 多，而不满意的是 46%，可见其个人利益与台湾民众利益相差有多大。

#### 经济利益造成压力增加

两岸能否尽速开启政治谈判，李登辉的个人立场已成为关键因素。不过，迫使他改变立场的压力也已开始增长，他被迫放弃阻碍两岸政治谈判的政策的可能是在存在的，首先是岛内的社会压力。民众对其不满的原因并非只是其政治能力和业绩不佳，其阻碍“三通”的政策也使得台湾民众日益不满。台湾企业的利益与大陆经济的稳定增长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利益将促使台湾民众对李施加压力，扩大两岸往来的范围。

其次，国民党中生代要保住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就需要迫使李放弃从国民党领导层排挤外省人的政策。只有放弃变相

分裂和暗中支持民进党“台独”政策的作法,才有可能找到连战和宋楚瑜联手的关键点,才能在 2000 年战胜民进党保住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第三,由于对台湾岛内政治走向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美国已经意识到“台独”趋势将中美拖入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加大。与中国进行军事冲突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为了防止被台湾拖入战争,美国将加大对台压力,要求台湾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以避刀枪之祸。

李登辉能否顶住以上三重压力现在还难断言,但根据目前李登辉名声在岛内外不断下降的趋势,他在任期内被迫改变立场的可能性也不应排除。随着他这一障碍被克服,两岸政治谈判便可启动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7.6)

## 2.“暗独”走向“明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阎学通教授月前曾经预测,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一书,是企图将台独理念官方化。

阎学通当时曾提醒,须“防止他(李登辉)不顾后果的行动”。

昨天受访时,阎学通作出三点分析。

阎学通说,第一,现在李登辉的言论是更进一步表明他要在辞职前在“台独”问题上“加快脚步”,就是由“暗独”往“明独”的方向发展,企图在辞职前取得实质成果。

第二,是表明了他要在辞职前把“台独”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成为不论任何人继承他的地位执政都难以修改的官方政策。

第三,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判断,认为时机对“台独”越来越有利。李登辉如此判断的理由首先来自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让他看到美国对分离主义采取了比较坚决的军事支持态度。其次,他认为现在是加快“台独”步伐的好机会,因为美国共和党以支持台湾分离主义来攻击民主党,而民主党又不敢强力反击。再其次,目前中美关系比较不好,李登辉认为搞“独立”比较容易得到美国国内人士的支持。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7.11,采访记者:周锐鹏)

### 3. 李登辉要断送国民党政权?

台湾李登辉“总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表让民进党叫好的“两国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的惊人分析是:李登辉要断送国民党继续执政的机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阎学通告诉本报,李登辉“担心国民党永远切不断与大陆的政治脐带和历史脐带”。

他认为,李登辉不愿意在他卸任后仍由国民党人当选“总统”。

国民党——全名为“中国国民党”——毕竟曾在中国大陆执政30多年,无论怎么说都摆脱不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历史印记。

“李登辉认为这是‘台独’在台湾的最大障碍。”阎学通说，从“台独”角度来看，只要换掉国民党，任何一个党在台湾执政，哪怕是新党或无党派上台，都比国民党更有利于“台独”，因为那时候就可以说是“台湾人的政府”了。

“切掉这条历史脐带，‘台独’分子就可除掉在台湾遇到的最大政治障碍。”一向密切注意台湾政治动态的阎学通分析说。

不过，在台湾的民进党则似乎在呼应阎学通的分析。

在“两国论”经媒体报道后，民进党主席林义雄说“国民党已经同意了民进党的(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主张”。

李登辉是7月9日发表“两国论”，民进党是7月10日举行党代表大会推举台北市前市长陈水扁代表民进党角逐来届“总统”。

媒体在民进党推举陈水扁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的当天报道“两国论”，民进党人欢呼说那是“送给陈水扁的一个贺礼”。

有分析家指出，国民党在过去几年的“立委”、“国代”和“总统”选举中，之所以能打败民进党，靠的主要利器就是“安定牌”。选民选国民党是对民进党不放心，怕民进党执政引起两岸冲突。

如今民进党兴奋地说，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是拿掉了套在民进党头上的安定牌“紧箍咒”。

新党召集人李庆华形容，现在是“摩西指出明确目标，让约书亚有所遵循”。李登辉曾自比摩西，而陈水扁则暗示过自己是继承摩西志愿的约书亚。

阎学通同意新党的说法。

“李登辉心目中要全力支持的候选人就是陈水扁。”阎学通说,李登辉“想尽办法为陈水扁争取选票”。

证据?

“只要李登辉有一丝为国民党政权着想的念头,他就不应该搞掉连宋配。”阎学通说。

但李登辉却全力破坏连宋联手。“这不是意气。”阎学通说,只要连宋联手,国民党就肯定继续执政,为什么李登辉不愿意?

因此,他判断李登辉是要“打掉国民党执政机会”,是要“完成不让国民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阎学通认为李登辉发表“两国论”目的不在于扶上连战,而是要扶上陈水扁。

摘掉“安定牌”后,连战靠什么跟陈水扁比?

阎学通因此断言“李登辉要除掉的是国民党,就是所谓的‘毁党造党’”。

如果李登辉的确是怀着对国民党而言如此可怕的阴谋,作为国民党内定的“总统”候选人的连战为什么能容忍?

阎学通不客气地指出,李登辉的所谓“接班人”、现任副“总统”连战,在党内和在台湾社会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残酷地说,李登辉把他视为“摆设”、“木偶”,如果他违反了李登辉的意志,必定就被李登辉先在党内另换“总统”候选人,那时候,连战连国民党候选人的资格都得不到。

不过,阎学通认为,连战不会相信李登辉“抛弃”了他,相反的,他会一直以为他是李登辉的接班人,竞选下去。

连战目前的支持率一直提不起来,远远落在宋、陈之后。



根据阎学通的分析,从台面上的准候选人来排列,李登辉最不支持的是连战,最支持的是陈水扁。

但李登辉的政策和说法颇得台湾人心?

阎学通没有否定这点。他承认,李登辉成功地向台湾民众指出了一条让人以为“可以不打仗而独立”的道路。

这正是李登辉“曲线独立策略”诱人的地方。它抓住了台湾人既想独立又怕打仗的心理。

在阎学通作上述分析的前一刻,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派立委蔡同荣正呼吁台湾“国人全力支持李登辉向中国说不,从此和中国说再见”。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7.16,采访记者:周锐鹏)

#### 4. 一箭多雕的“两国论”及其危险

笔者于今年5月24日在《联合早报》预测李登辉在辞职前将走向公开独立,一个半月后李登辉就抛出了放弃一个中国原则的“两国论”,公开其独立政策。李登辉公开独立的策略有一箭多雕的政治目的,这一点绝非一般民众所能想得到的。

“两国论”为台湾公开宣布独立迈出了关键一步。长期以来李登辉搞曲线独立,这种政策与正式独立有两个重要区别。一是曲线独立只能暗中搞“台独”,而不能公开以独立为目的,二是曲线独立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变相独立,而不是正式独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目的是公开独立的目标,使台湾官方的独立政策从暗转明,这样实际是使正式独立完成了一半。

公开宣布独立包括了两个内容,即“公开”与“宣布”,公开独立是宣布独立的前提,不公开独立就无法宣布独立。李登辉的“两国论”不过是将公开宣布独立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公开独立目标,第二步就是宣布正式独立。中国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条件之一是台湾宣布独立,由此可见“两国论”已使台湾海峡的战争只剩下半步之遥。

### 为民进党造势

“两国论”意在结束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李登辉选择在民进党提出“总统”候选人的头一天提出“两国论”绝非巧合。“两国论”一出台就受到了民进党人的热烈欢迎,被民进党提名为候选人的陈水扁立即表示,特殊国与国的关系与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一样,符合潮流。即“两国论”既然有利于民进党候选人竞选,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为什么在选举的关键时刻为民进党造势呢?这不由使人想起李登辉“毁党造党”的言论。

李登辉认为国民党曾为中国的执政党的历史,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下不了决心实现台湾独立,只有民进党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决心在辞职之前尽力帮民进党坐大,如果此次不能扶民进党上台,也先要使国民党失去政权。李登辉破坏连宋配目的在于破坏国民党赢得大选的战略基础,而提出“两国论”则是帮助民进党的政治目标主流化,引导民众投票支持民进党。

“两国论”是服务于“打宋、弃连、扶陈”的选战目标。李登辉政治手腕的高明是不可低估的。1992年李登辉利用郝伯村干掉了李焕,而后1996年又用连战和宋楚瑜干掉了郝伯

村。1996 年李登辉连任后，我曾对台湾几位知名学者讲，李登辉使用的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传统政治手段，而这几位学者却告诉我说“李先生还没有这么坏”。然而两年之后李登辉就用冻省的办法干掉了台湾省“省长”宋楚瑜，现在终于轮到连战了。眼前的选战格局是，民气最盛、遥遥领先的宋楚瑜与李登辉已反目成仇。宋提出与大陆“三通”及停止“金钱外交”的政策与李登辉已形成势不两立，“两国论”的出台，其目的之一就是打掉宋楚瑜在选战中的领先地位。

民意最弱的连战根本无望赢得选举。李登辉根本也没想让他接任，只不过是利用连战必输的条件结束国民党执政地位。由于陈水扁是惟一有可能与宋楚瑜一争高低的候选人，而且也符合李登辉台独政治目标的需要，因此陈水扁已成为李登辉助选的对象。根据民意测验，陈水扁与宋楚瑜差 10 来个百分点，远远落在宋楚瑜之后，李登辉出台“两国论”是为陈水扁助阵，而且今后还将不断出台表面支持连战而实际上有利于陈水扁的招数。

#### 要证明台湾可以平安独立

“两国论”意在向台湾人证实台湾平安独立是可能的。李登辉在其自传《台湾的主张》中反复强调，要对美国支持台湾独立有信心，因为美国要执行《台湾关系法》。最后中美关系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处于低潮，美国国会又提出《增强台湾安全法》，这就使李登辉认为走向公开独立的危险不大。他认为此时，大陆顾及中美关系而不会采取十分激烈的反应，而美国大选在即，在共和党和国会的压力下美国行政当局不会对台施加压力。

李登辉还认为,如果“两国论”引发军事危机,美国将不得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使再一次发生的军事对峙不致引发战争。这样既可以向台湾人证明美国对台湾独立提供军事支持是有保证的,同时也可增强台湾人对平安独立的信心。

“两国论”必将危及整个地区的安全。李登辉在发表“两国论”之前就已做好了大陆再次进行 1996 年那种军事演习的准备。他一方面要求军队随时作好进入紧急状态的准备,一方面决定政府大规模投资稳定股市。既然李登辉已经作好了准备,这意味着 1996 年那种军事演习是无法阻止李登辉继续走向正式独立的,这实际上是逼迫大陆采取更有实质性的行动,来阻止台湾分离主义。

1996 年中美因李登辉访美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军事对峙,使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都受到影响。这次李登辉逼迫大陆采取更具实质性的行动,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地区安全。美国能否吸取 1996 年的教训是无法预测的,但只要美国卷入其中,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7.19)

#### 5. 宋楚瑜若当选,李登辉可能在下台前把 “两国论”官方化、法律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专家阎学通教授预测,如果独立候选人宋楚瑜今年 3 月当选为新一任台湾“总统”,现任“总统”李登辉可能会抢在自己 5 月下台前把“两国论”官方化、法律化,台海到时将出现新的军事危机。

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院之邀，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阎学通昨天在新加坡一项闭门地区安全课题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并在会场外接受本报访问。

阎教授说，李登辉并不愿意见到两岸进行政治对话，他领导之下的国民党已把“两国论”写入党章，但有朝一日如果国民党不再是执政党，这个党文件就会失去法律效用，所以李登辉将在3月“总统”大选后决定是否要用政府文件把“两国论”法律化，以确保未来的台湾领导人很难修订有关立场。

他指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与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都已用各种条件为前提，封杀了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可能性，但如果当选总统的是仍然保留两岸对话政纲的宋楚瑜，李登辉阻挠任何其它领导人执政后与大陆进行政治对话的态度可能会变得坚决。

不过，李登辉不一定是通过修改“宪法”来达到目的，阎学通教授相信，李登辉很有可能会采取行政机构的政府文件，把“两国论”官方化、法律化。

就地区安全而言，阎教授认为，今后10年可能不比以往10年好，除了因为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冷战后的民主化过程也导致政客为了争取选票而采取极端民族主义姿态，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民主化也促进自治、分离主义发展。

他说，冷战后，分离主义在全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幸免，其中台湾的分离主义问题更是本区域中最危险的，除了带来内部军事冲突，一旦国际势力介入，更难免变成国际冲突。

阎教授承认，台湾目前的分离主义势力发展，已非当地政

客意愿所能左右，也已超出了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加上中、美两国无法有效地共同合作遏制有关势力，所以海峡两岸之间仍存在军事冲突的危险。

他说，东南亚国家和整个区域应该看到冷战后分离主义给地区带来的战争危险，所以都应对一切分离主义势力进行谴责与遏制。

以非洲为例，阎教授说，由于非洲统一组织 60 年代成立时成员国一致同意不得更改当时已经形成的边界，这些年来有效地防止了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

他认为，东亚地区目前没有一个类似非统的国际组织与默契，所以形势危险，东亚国家也应该发展一个共识，反对修改边界，以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

此外，美国也应该清楚表明与贯彻其不介入台海的政策，模糊策略只会造成中、美、台三方无法准确掌握形势。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1.18，采访记者：霍月伟）

## 6. 台湾若不愿政治谈判，就是不愿和解而欲战

中国对外政策智囊阎学通教授昨天说，大陆和台湾，谁愿意政治谈判，谁就是有和平解决的政治意愿；谁不愿意政治谈判，谁就是不愿和解，准备战争。

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阎学通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发表上述强烈的评论，批评台湾“避谈”而又宣称要“和平解决”的作法。

他警告，台湾方面如果始终回避两岸对话和谈判，“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就变成“不可能”。

阎学通说，两岸矛盾要和平解决，第一个前提是政治谈判。“不谈，就没有和平的结果。”

他批评台湾当局的政策是“叶公好龙”。“台湾方面说要‘和平解决’，但不允许双方官员进行政治谈判。台湾方面想尽办法使政治谈判不能进行，使和平解决变成不可能。”

阎学通表示，台湾就像中国古代故事里那个叫“叶公”的人，到处画龙写龙，真龙知道了跑到他屋子里，岂料叶公见了真龙，却吓得魂飞魄散，逃之夭夭，于是世人才知道，原来叶公不是真正喜好龙。

阎学通指台湾方面对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访台制造了很多障碍，以致 1999 年秋天原定要举行的海协会、海基会之间的“汪辜会”无法实现。

因为李登辉 1999 年 7 月 9 日发表“两国论”，以及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附和“两国论”说法，原定秋天访问台湾的汪道涵认为这“破坏了海协会和海基会接触、交流和对话的基础”，取消访台计划。

阎学通总结了自己接连两天通过卫星电视与台湾“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和台湾学者罗致政对谈后的看法。

对于台湾官方和“总统”参选人纷纷提出的两岸签署“互不侵犯协议”，阎学通说，两岸间是否能够通过签署协议来解决争端，关键是有没有“政治谈判”。

他说，要签署“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其实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先提出的，是大陆有意愿与台湾签署协议来和平解决。

“问题是,无论什么协议,双方官员必须先坐下来讨论、对话、谈判(台湾方面)不谈,怎么达成协议?”

至于台湾方面担心对话、谈判时是否有“对等地位”的问题,阎学通指出,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已经明确提过,可以先从“程序性”问题谈起,关于谈判的身分问题,可以作为程序性问题来谈,从而消除台湾的疑虑。

“但即使只是程序性问题,也需要双方坐下来讨论呀。”他说。

阎学通以前曾公开表示,如果两岸的和平解决途径无望,以致战争变得无可避免,则“晚打不如早打”。

“台湾这种不同意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的作法,实际是对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釜底抽薪,也是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作法。”

他警告:“大陆和台湾,谁愿意政治谈判,谁就是有和平解决的政治意愿;谁不愿意政治谈判,谁就是要准备战争。”

“要取得任何和平统一的结果,都需要谈判。”

对于台湾的地位问题,他说:“台湾不迈出第一步,却大谈最后一步;不谈渡河的工具和办法,却谈过河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元旦当天说,他在五年前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没有改变。但他也强调,对任何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所谓“台湾独立”、损害两岸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严重分裂活动,绝不会坐视不管。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1.5,采访记者:周锐鹏)



## 五、何时统一台湾

自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之后,两岸的中国人越来越急切地问,何时统一台湾?身为一介书生,自知这个问题非我所能回答的。不过香港已于 1997 年回归祖国,澳门在今年年底将按期回归祖国,讨论台湾统一的时间已是情理之中的事。国家统一,匹夫有责,于是想就何时统一台湾的问题谈谈管窥之见。

### 统一台湾的时间由历史决定

统一台湾将是历史的必然。根据文字记载,公元 230 年三国时的吴王孙权就曾派兵到达台湾,实行统治。而后的历史中,台湾曾先后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占领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还是回归了中国。据刘先照先生的统计,自秦汉以来,中国统一和割据的历史中,统一时间为  $2/3$ ,分裂时间为  $1/3$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历届中国政府都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天然使命。如果我们认为历史规律也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那么就可以推断,历史最终将决定统一台湾的时间。

统一台湾的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人们却无法单纯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历史。历史作为

人类活动的记录，当然只能由人来创造。但是人们创造历史的意愿却是不一样的。例如，冷战后美国要建立一极世界，中国要建立多极世界；中国人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则要在台湾搞独立。历史只能在人们不同的意志较量中，磕磕碰碰地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在台湾前途的问题上，不同人的政治意志十分对立，因此台湾统一的时间不是由谁的意志决定的。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曾几次作出统一台湾的计划，但历史却没有作出同样的决定。

统一问题已经提上历史的议程。历史过去没有作出统一台湾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永远不作这个决定，也不意味着历史还没有考虑统一台湾的时间。自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起，台湾统一的问题就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事了。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决定了大陆统一台湾的实力日益加强，当这种实力发展到绝对优势时，历史就会规定统一台湾的时间。

#### 和平统一的时间由实力差距决定

和平统一的前提是台湾当局没有其它选择余地。李登辉执政后不断加大变相支持“台独”政策的力度，这种政策在过去的 11 年里已使“台独”势力不断发展，台湾岛内的和平统一条件不断恶化。根据台湾《联合报》的调查，台湾居民受调查者中支持“台独”政策的人已从 1989 年的 2% 增长到 1997 年的 24%。李登辉的“新台湾人”政策不仅模糊了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感，而且也改变了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李登辉刚上台时，台湾当局还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发展到今天，台

湾当局已经公开打出了“两国论”的“台独”旗号,甚至把“两国论”作为两岸政治对话的先决条件。这表明,台湾当局已不会为了民族大义而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了,只有到了不统一就必须面临战争的选择时,才有可能接受和平统一的出路。

使台湾当局接受和平统一选择的策略不多,否则和平统一不会如此困难。从根本上讲,使台湾当局接受和平统一的策略是扩大我与台湾的综合实力差距。目前,我国大陆国民生产总值按汇率计算约为台湾的 3 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 6 倍,而且在台海局部地区,我军事优势有限。在这种实力差距状态下,以武力方式实行统一是可能的,但以和平方式统一则还不够。如同拳击比赛,双方运动员实力差距小,则需真正打几个回合之后才能定胜负;而当实力差距极其悬殊时,双方则无需上场,私下即可协商决定名次。如果美国不插手台湾问题,当大陆的综合实力达到台湾 10 倍以上时,历史就会告诉台湾当局,和平统一时间已到。

中美实力差距是和平统一台湾的根本制约因素。台湾问题本来就是美国制造的,如果没有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就解放了台湾。自那时起,统一台湾的计划之所以多次不能如期实现,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目前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很大,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按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  $1/8$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  $1/4$ ,而且在军事上实力上也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敢于插手台湾问题,为什么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坚美国会派军队为他们的分离主义政策而战。中国的综合实力无须与美国相等,只要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同属一个量级,

即使有差距，美国也会改变干涉台湾事务的政策。冷战期间，美国绝不敢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即使冷战之后，美国也是只敢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下手，而不敢对俄国的车臣或达吉斯坦问题采取实质性行动。

### 武力统一的时间取决于“台独”的速度

武力统一是迫不得已的政策。大陆已经明确表明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武力统一只是针对“台独”分子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不仅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认定这一事实，而且连制造台湾问题的美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统一台湾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保证台湾这块领土不被外国人夺走，二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统一到一个国号之下。统一是指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统一，而不是大陆中国人与在台湾的外国人的统一。李登辉等“台独”分子既然已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自视为外族，因此也就不存在与他们统一的问题。这些自认为己不是中国人的“台独”分子，想以独立方式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上挖走，这当然是两岸中国人所不能同意的。因此，当这些己成为外族的“台独”分子决定夺走中国的台湾领土时，中国只能以武力方式维护自己领土的完整。这时武力统一的目标就是阻止那些自认为是外国人的“台独”分子分裂中国的领土。

台独分子有可能促使武力统一时间提前。自 1978 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后，和平统一台湾已成为中国大陆统一政策的主导方面。然而这几年“台独”势力在台湾的发

展，已经使武力统一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特别是由于李登辉曲线独立的政策，误使许多人认为台湾有可能“和平”独立。1998年台湾欧亚学会的调查表明，42.5%的台湾人认为两岸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这种错误判断使“台独”分子走得越快，武力统一台湾的行动就来得越早。当“台独”分子踩到台湾独立的“死亡线”时，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钟就会敲响。李登辉已经提出了“两国论”，他为防止下台后他的“台独”政策被改变，因此可能在明年5月20日下台前进一步将其台独政策官方化。如果“台独”分子走鱼死网破之路，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必然提前。

### 统一越早 收益越大

和平统一越早，越有利于我国的崛起。我国的崛起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而目前台湾问题已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绊脚石。军事上，台湾分离主义分子使中国卷入战争的危險不断增大，破坏了我四化建设的国际安全环境；外交上，台湾问题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破坏我国的战略环境；经济上，台湾的金钱外交使我浪费大量的经济资源，平添了许多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如果解决了统一台湾的问题，中国崛起的道路将会比现在顺畅得多。

如果在有限的时期内不得不以武力统一台湾，则早统一比晚统一的收益大。和平统一是我们的愿望，但历史并不一定按我们的意愿发展。如果武力统一台湾是历史的最后结局，那么早统一比晚统一的收益大。首先，在有限的时间内进

行武力统一，早统一台湾有助于减少战争损失。苏联威胁消失后，美国与台湾的实质性军事关系不断发展。美国提高了与台湾军事交流的层次、武器出口的质量和数量，并有意通过战区反导系统变相恢复美台军事同盟。在有限的时期内，时间越长，美国越担心中国的强大，也就越要帮助台湾在台海局部地区建立军事优势，卷入台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且时间越长，双方军事能力越增强，战争破坏力也越大。其次，如果武力统一不可避免，早统一则可使长痛化为短痛。台湾问题已经给我国造成了几十年的困扰，这种困扰给我国带来的种种麻烦积累起来也不亚于一场小规模局部战争的结果。在早武力统一与晚武力统一代价相等的情况下，早统一则可减少统一前台湾制造种种麻烦的时间。短痛固然剧烈，但短痛过后，我国崛起将能获得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当然，上面所有论述都是在“不得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得出的，而这一前提其实是两岸中国人都并不希望的。

（《环球时报》1999.9.10）

## 第四篇

# 现实主义的战略思考





## 一、国际环境及外交思考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后，如何认识国际环境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问题。虽然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但基本上可分为两派，即一派认为科索沃战争使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另一派则认为科索沃战争只是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反映，国际环境没有重大变化。笔者以为，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需要立足于国内，根据中国的现实利益分析政策取向；而分析国际环境则应跳出中国，从国际关系的总体格局上来观察中国所处的环境，这样有助于观察的准确性。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科索沃战争前后的总体国际形势，分析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并就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利益谈几点想法。

### （一）冷战后的国际环境

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变得更加清晰。国际格局是国际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在一个既定时期的客观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发生变化或很复杂，但不可能不存在。由于对冷战后国际格局认识不清，于是出现了国际格局空心化或国际格局无限期过渡的概念。将认识不清的事物解释为不存在，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一般来讲，对国际格局的分析主要是以大国的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为依据。这

并不是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而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发展中国家在冷战时期就存在，而且组成了不结盟运动，但它们的政策变化改变不了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基本态势。即使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从与苏联结盟转向与美国建立战略关系，也没有改变冷战的两大格局。只有苏联解体后，两大格局才变为一超多强格局。

国际格局的两个基本局面是大国的力量对比和大国间的战略关系。冷战后的大国力量对比情况是，美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它几强的实力与美不在一个等级上，这种力量对比于 90 年代初就已形成。<sup>①</sup> 冷战后大国战略关系于 1996 年形成。1995 年北约决定东扩，美欧将战略矛头直指俄国；1996 年美日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将其战略合作由针对原苏联暗中转向针对中国；同年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相互进行战略支持但不结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这三大战略关系的形成，标志着冷战时期两大格局向一超多强格局的过渡已初步完成。冷战后，由于没有力量能有效地遏制美国的霸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已不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利用东西矛盾了。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选择余地缩小了，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暂时接受美国的政策主张。

科索沃战争并没有改变国际格局，而是对一超多强格局的验证。这场战争的根源是北约东扩引发的北约与俄国的战略矛盾。这场战争与日本无关，因此日采取了低调的政策，这表明日美同盟不是针对俄国的。中俄虽然都反对北约武装干

<sup>①</sup>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54 页。

涉南斯拉夫，但双方在政策上保持了距离。中国反对的是北约破坏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原则，而俄国反对的是北约在处理欧洲安全事务中没有给俄以平等的地位。中俄在政策上的区别还表现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是不一致的。科索沃战争没有改变冷战后大国的力量对比，也没有改变大国的战略关系。这场战争对中美和俄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则使三大战略关系变得更加固定。在安理会最后有关科索沃决议投票中，发展中国家成员基本上都投了与美国相同的票<sup>①</sup>，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政策选择余地非常有限。

美国称霸是冷战后国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国际政治中的长期历史现象，科索沃战争只是这种国际现象在当前形势下的反映。在本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争霸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国家要称霸而遭到其它国家反对的战争，冷战则是美苏争霸的强权政治。美国赢得了美苏争霸战，成为冷战后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中的惟一超级大国。在这个格局中美国开始了独霸世界的政策，这种政策与世界其它主要国家以及广大中小国家有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矛盾。美国的称霸政策不仅与中国、俄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有矛盾，而且与日本、欧洲国家也有矛盾。欧洲和日本不满美国压制欧元和日元国际地位的作法，在北约和日美同盟中它们与美争平等的地位。科索沃战争如同美国对伊拉克、苏丹、阿富汗、波黑的轰炸一样，都是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的具体表现。美国的强权政治在科索沃战争中

<sup>①</sup> 路透社联合国 1999 年 6 月 10 日英文电。

有了新的发展，但并没有发生性质上的变化。

科索沃战争充分反映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矛盾。首先，俄国不能接受美国不断挤压俄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作用的政策。在这场战争中，俄国是几强中首当其冲反对美国对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的国家。其次，欧洲国家担心美国主导欧洲安全事务。北约欧洲成员不同意美国在南斯拉夫采取单边行动，而要求以北约名义集体干涉的目的之一，是防止美通过单边行动进一步主导欧洲安全。科索沃战争之后，西欧国家立即讨论成立欧洲防务部队的问题，这表明欧洲国家通过科索沃战争更加感到需要改变美国主导欧洲安全的现状。三是，中国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南斯拉夫内政。中国等亚洲国家担心美国将科索沃战争方式用于亚太地区。

局部常规战争的危险依然很大。一种既定的国际秩序对世界战争与局部战争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曾对防止世界战争的发生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防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冷战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军事对抗的结束，使世界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但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也不能有效遏制局部常规战争的发生，甚至不能防止核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或局部战争。冷战后不仅有科索沃战争，而且进行了核试验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也在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了 78 天的有限战争。

每个国家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这使国内社会成为有序的体系，只要这个体系不被破坏，就可防止内战发生。然而国际社会的文明程度较低，还未建成世界

政府，因此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的社会。国际社会的无序性，决定了战争仍是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最后手段。一个国家可以维持上百年没有内战，但国际社会却做不到一年没有战争。自本世纪以来还没有一年没有国际战争或武装冲突。与冷战时期比，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对局部常规战争的抑制力似乎更弱。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冷战后美国的一超地位使美国增强了使用武力解决与中小国家利益冲突的信心，所以美国不断地卷入地区军事冲突；二是冷战后分离主义势力加快发展，使许多内部冲突发展成为国际军事冲突，科索沃战争是个典型例子。

新的国际干涉规范正在发展。为了防止成为孤立的霸主，美国意在发展美国主导、大国协调、中小国家服从的国际干涉规范。虽然美国对中小国家实施武力干涉，但对大国还是采取协调为主的原则。冷战后，美国每次出兵干涉中小国家事务前都与大国协调，如果与大国不一致，美则在确保大国不采取军事反对行动的情况下才会出兵干涉。科索沃战争中，美虽主导了战争的整个过程，但美在作出轰炸南斯拉夫的决定前与欧洲大国进行了磋商，在实施轰炸前又与俄进行了磋商，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政治解决方案前，也与中国进行了磋商。美对单独干涉的作法较为谨慎，尽量通过多边国际机构实施干涉。联合国具有最广泛的国际性，因此它仍是美实施干预政策的首选机构。只有其方案在联合国通不过时，美才会求助其它多边机构，在得不到任何多边国际组织的支持时，美则寻求与少数几个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尽管美国主导下的八国集团达成的科索沃危机解决方案不经联合国也能执

行，但它们还是争取让联合国批准认可。

国际规范对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冷战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观动摇了一些国家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信念；主权过时、人道主义干涉、建设性干预、预防性外交的提出，实际是一些国际组织开始考虑放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改革强化了自由贸易和资金自由流动的规范，使经济干预变得有规则可循。科索沃战争是一场价值观冲突的战争，北约的军事胜利为人道主义干涉发展了新规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科索沃问题的两次投票中，北约能得到多数支持，表明国际干涉规范正在发展。一些国际组织的国际干预功能正在增强，如八国集团有发展成为第二个安理会的可能，七国首脑会议有成为经济安理会的可能，世界贸易组织正向经济联合国发展。

高位政治( high politics )与低位政治( low politics )的形势不一致。高位政治指战争、安全、军事合作、主权、领土、统一等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而低位政治则指贸易、人权、环保、投资等次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冷战后美国依仗其一超的地位，要建立一个制度性的霸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注意大国间的协调和建立国际规范，因此目前国际秩序一方面有助于大国之间达成不使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的默契，另一方面在建立国际规范方面出现互不相让的规则之争。也就是说大国间的高位政治关系是相对安全与稳定的，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在低位政治上的斗争与摩擦则是激烈的。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一方面在禁止核试验，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朝鲜半岛稳定，亚太地区安全等方面进行合作，但在人

权、人道主义干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贸易赤字、知识产权等低位政治问题上摩擦不断。美国与日欧一方面是加强军事同盟关系，一方面则在环保和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相互攻击。

## (二)对中国外交的思考

国际环境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也是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在此我们将依据上述对国际环境的客观描述，讨论中国外交选择的问题。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以下讨论侧重于，在国际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什么样的外交策略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邓小平同志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sup>①</sup> 冷战后，考虑如何最大限度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时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与其它几强相比也没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仅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在世界上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美国在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美国的许多主张不仅可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而且也能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在这个体系中强权政治是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中国不可能置身于这个体系之外，但中国又不能与多数国家采取对立的政策。依据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这两点，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和实现利益的能力来决定外交政策。

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应将有限的力量集中用于与自己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而不宜将过多精力分散到与我利益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上。例如，冷战后分离主义和干涉内政的问题给国际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宁，依据中国的现实利益和实力，我应集中精力应对台湾分离主义问题。对台湾分离主义和南斯拉夫分离主义的问题我需要采取不同力度的政策，对科索沃分离主义主要是道义上的谴责，但对台湾分离主义则需要采取实质性的阻遏政策。维护现实的国家利益是中国不可偏离的外交原则。

继续外交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小平同志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sup>①</sup> 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是增强我综合国力，而提高我综合国力的策略只能是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党中央 1995 年制定的 2010 年远景目标是在今后 10 年提高我综合国力的具体目标，因此我外交工作要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服务。具体讲，就是外交要为实现这些目标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里，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最为突出，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与其它几强没有严重的矛盾，但与我国矛盾较大；在美国称霸世界的策略上，美国与日本和欧洲有相互利用的一面，而与我国缺乏策略上的互利性。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3 页。



然而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必将使国际环境不利于我国四化建设。因此从现代化大业考虑，与美国既斗争又合作仍是非常必要的。

以反霸取代现代化建设为我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sup>①</sup> 1995年江泽民同志也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sup>②</sup>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我领导人提出上述政策时的国际环境相比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总体上讲是更有利一些而不是更不利一些，因此上述这些政策还有相当的适用性。在维护我国家统一这种关键性利益时，中国对外政策决不能手软，但是中国不能承担国际反霸的领导作用。

保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美国要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霸权体系，这就使得它与所有的地区大国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不仅有必要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对抗，而且需要减少与其它大国之间的矛盾，更需要与它们发展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与其它几强发展合作关系并不等于建立反霸统一战线。有人认为中美之间有个中间地带，中国需要团结中间地带的国家，共同反对美国的霸权。这种认识其实是把中国推上了原苏联的位置，使中美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② 《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正式会晤》，《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6日。

全对立起来，只剩下对中间地带国家的争夺。建立反霸统一战线对中国有弊而无利。一是不会有很多的国家参加反美的统一战线，二是反霸统一战线将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推上反美的领导地位。

1982年起，中国强调执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方针，这一方针为中国在美苏之间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战略地位。冷战后，美国称霸政策与我矛盾最为突出，坚持不结盟方针有助于避免矛盾激化。有关“中俄印同盟”的建议，不仅不符合我外交方针也不符合我国家利益。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同盟政策在历史上曾使我国多次卷入战争。如果重新开始结盟的政策，有可能再次将我国卷入不必要的战争之中，这不利于为四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二是，中俄印组成同盟，有将世界引向新冷战的危险。形成冷战的条件之一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一旦重新回到冷战，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都将可能延迟。三是，搞中印俄同盟也仍是不对称的对抗。美国一年的国防开支就有 2700 多亿美元，中俄印三国年国防开支加在一起则不足 300 亿美元，约为美国的 1/10。一超多强就是一个不对称的国际格局，以另一种不对称格局取代一超多强仍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

积极参与建设国际规范的策略。鉴于国际组织正在发展新的国际规范，为了维护长远的国家利益，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建立新的国际规范的事务。发展新的国际规范主要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规则改革之中。参加多边国际组织既然是参与建立国际规范的前提条件，因此从策略上讲，中国就必须参加所有的国际组织。只有参与国际组织有关规则的制定和改革，才

有可能使我国有关国际规范的设想得到接受。1996 年以来，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等多边国际组织中，不断宣传用新安全观取代冷战思维的重要意义，结果是冷战思维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落伍的，即使仍以冷战思维制定对外政策的国家，口头上也要否定冷战思维。

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复杂多变，因此中国的外交策略也需要灵活多变。国际形势的复杂程度在科索沃战争前后并没有变化，只是这场战争加深了我们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复杂程度的认识。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看到，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所有大国对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政策都是不断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有利于维护其国家利益。因此，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多边的国际组织中，中国既要坚持原则，又需要灵活善变。因人而易，因事而易，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这已成为国际斗争的普遍策略。为了减少与他国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主流中的地位，为了争取多数国家支持中国提出的国际规范，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宜尽量保持与多数国家一致的立场。但是，对于直接涉及我重大利益的问题，则需完全根据我国家利益需要来决定政策。

（《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8 期）

## 二、中美战略合作的条件

从 1944 年的《五条协定草案》到 1972 年的《上海公报》，中国共产党(中共)与美国的战略关系经历了一个“伙伴——敌手——伙伴”的大循环。重温这段历史时，本文作者发现共同战略利益的客观存在并不能有效地促成中共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而决策者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对双边战略关系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分析这一时期决策者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是怎样影响中美战略关系的，从而为认识冷战后发展中美战略合作提供历史经验。

### （一）二战结束前的战略协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共、国民党与美国的宏观战略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各方都希望早日赢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并争取实现中国的强大与稳定。然而在怎样建立一个强大与稳定的中国的问题上，三方的利益发生了矛盾。在国共两党都拥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国的前提是防止内战并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在这一点上，美国与中共的战略利益一致性远大于美国与国民党的利益一致性，因为中共与美国都希望建立一个民主体制的联合政府以防止内战发生，而国民党则想保持其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不

惜进行内战。然而，由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认为只有国民党有实力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因此采取了“扶蒋压共”的政策，使得中共与美国从战略合作走向了战略对抗。

1944年7月4日，中共《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节日》。文中写到：“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民主的美国万岁！”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过目后发表的。<sup>①</sup>

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Partric J. Hurley)到达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就组建联合政府一事进行了磋商。双方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又称《五条协定草案》)。其核心内容是：(1)国共共同工作，统一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2)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一切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3)联合政府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为原则，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向政府

<sup>①</sup>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2~133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8~89页。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4)所有抗日军队应执行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承认；(5)联合政府承认国共两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sup>①</sup>而且毛泽东对赫尔利的是否还让蒋介石当政府主席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sup>②</sup>

协议制订后，11月10日毛泽东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高度赞扬赫尔利与罗斯福的信。他说：“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日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们非常高兴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使得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sup>③</sup>

今天重读这三个历史文献，我们能注意到，以“民主”作为战略利益的判断标准，中共曾认定民主的美国必然与中共有共同战略利益，而且达成的协议也反映出当时美国与中共在政治理想上的确有相当的一致性。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防止内战发生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为什么没能把中共与美国结成二战后的战略伙伴呢？如果我们把原因归结为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统治的地位，我们就无法解释，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3~397页。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332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9~40页。

为什么民主的美国不选择军事支持中共的策略压制国民党组建联合政府？为什么国民党一拒绝《五条协议草案》，罗斯福和赫尔利就轻易放弃了组建联合政府的初衷，转向扶蒋压共的政策？

二战结束之前，美政府内部就二战后美国的在华战略利益分为两种认识。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国务院的中国科科长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美驻华外交官谢伟斯（John S. Service）等认为，美国二战后的在华利益是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他们不认为共产党参政对美国不利。范宣德在备忘录中写到：“我们的意图是运用我们的影响，既作为短期的、又作为长期的统一。这未必是说，中国应该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就我们的长期目标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与最有可能创建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中国领导人合作。”<sup>①</sup> 美驻华使馆五名政治官员给国务院的报告说，赫尔利的政策使蒋介石自以为有实力，所以不愿与中共妥协，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内战的发生。报告建议：“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我们将采取直接的步骤。”<sup>②</sup>

然而罗斯福、赫尔利和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等人则认为，美在华战略利益是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军事盟友关系，

<sup>①</sup>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37～38页。

<sup>②</sup>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348页。

特别是需要与蒋介石个人保持友好关系。他们认为，在人治的中国，蒋介石的个人权力是维护美在华利益的根本保障，失去了蒋便失去了中国。当蒋拒绝《五条协议草案》后，赫尔利便转向压制中共接受国民政府整编其军队的建议，而不再提组建联合政府的事了。虽然赫尔利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受到了美国同僚们的严厉批评，并且有关其危害的报告也送交到决策层，但因赫尔利的政策还是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所以最终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许多人都认为，美国扶蒋压共的政策源于赫尔利而与罗斯福无关，甚至连中共领导人当时也以为如此。毛泽东在1945年7月曾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评论。他说：“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44年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罗斯福去世了，赫尔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sup>①</sup>也许我们永远弄不清赫尔利与罗斯福谁是扶蒋压共的始作俑者，但罗斯福将国民党政府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基点是可以证实的。1945年3月8日，赫尔利和魏德迈向罗斯福汇报中国问题，罗斯福对他们执行的中国政策没作批评，并决定赫尔利的使命不变。<sup>②</sup>1945年5月7日，赫尔利接到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7~48页。

② 同上，第349~350页。



副国务卿格鲁 (Joseph Grew) 的指示,让他不要轻易向蒋介石许诺战后给予军事援助。赫尔利对这一指示大为不满,他在一份没发出的备忘录中反驳说,总统给他的指示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而不是如果国民党政府合作理想就支持它”<sup>①</sup>。无论赫尔利所得到的总统指示是来自罗斯福还是来自杜鲁门,它都反映的是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思想,因为罗斯福于 1945 年 4 月 12 日才去世,杜鲁门是作为罗斯福的副手接过的总统职务,他不可能在 20 多天的时间里就改变威望犹存的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基调。

美国政府决定由组建联合政府转向扶蒋压共,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以“实力”而不是以“民主”为战略利益的判断标准。以政治目标为标准,美国与中共的共同利益相似性大于美国与国民党的共同利益,但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掌有政府与军队,他可以调动中国资源实现美国的在华利益。他不认为中共的民主政治纲领能争取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支持,也不认为中共有实力推翻蒋介石政权。应该说,中共同意组建联合政府时也不认为自己有实力在几年内就夺取政权。崇尚实力是美国政府文化的特点,这种特点不仅影响罗斯福个人,而且影响美国各届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分析方法。

美国政府自食其言的作法使中共产生了受骗的感觉,对美国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的政治目的产生了怀疑。中共不再视美国为伙伴了,也不再认为美国是民主的楷模了,而将美国看作是反民主的反动派了。1945 年 6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353 页。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sup>①</sup>到了 1945 年 8 月，中共开始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认定“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sup>②</sup>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对与美国的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发生了 180 度的变化。中共认为，既然反民主是美国的在华政治目标，那么双方就没有共同战略利益可言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具有相同的战略利益判断标准是中共与美国达成战略利益共识的基础。也就是说，双方的判断标准一致，则对共同利益的看法一致，否则难以取得共识。没有战略利益的共识也就没有发展战略合作的可能。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不同的判断标准使中共与美国对其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性认识不同。中共认为民主会使双方将建立联合政府视为头等共同战略利益，而实力考虑则使美国认为只有与蒋介石政府合作才能保证不“失去”中国。由于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不同，中共与美国没能使它们的战略协作关系得到发展反而使之夭折了。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46 页。

② 同上，第 51 页。

## (二)内战期间的战略对抗

抗日战争于 1945 年 8 月结束,9 月国民党开始调动部队向解放区推进,10 月国共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此时,美国与中共在防止全面内战方面是有客观共同战略利益的。美国需要防止中国发生内战,以免苏联借机向中国扩展其势力范围;中共则仍想通过避免内战以寻求与国民党分享政权。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与美国曾试图在防止全面内战上进行合作,但随着美国判断其在华战略利益的标准日益意识形态化,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从“扶蒋压共”发展成为“扶蒋反共”,最终马歇尔在华调停失败,中共与美国逐渐走向战略对抗。

在反共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杜鲁门政府从一开始进行国共军事冲突调解,就陷入支持蒋介石与阻止内战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1945 年 10 月赫尔利与魏德迈回国述职,杜鲁门明确对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是我们却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而战。”<sup>①</sup> 1945 年 12 月 14 日,马歇尔接到杜鲁门给他的信和对华政策声明,这两份文件也是杜鲁门对其使华的批示。马歇尔在备忘录中写到:“我说……美国仍然有必要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范围内,通过我——通过委员长——支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总统

<sup>①</sup> 《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第 75 页。转引自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 62 页。

说，这一说法正确地概括了他关于可能出现的情况的指示。”<sup>①</sup>

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杜鲁门任命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为特使去中国调停国共军事冲突，防止全面内战。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杜鲁门必须改变罗斯福扶蒋压共的政策，采取平衡国共军事力量的政策。国共军事实力差距越大，蒋介石就越不可能放弃内战计划。只有在国共军事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压蒋接受和平解决军事冲突的建议。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向中国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后，提升为美国远东司司长的范宣德明确指出：这样做，无法保证贯彻美国不支持中国内战的意图。蒋介石过去就已表现出以武力解决内争的倾向，这样规模的美军援助实际是鼓励他的这种倾向，使他更不愿和平解决国共军事冲突。<sup>②</sup>然而，杜鲁门的认识却相反，他认为以军援加强国民党的实力可以压服中共接受蒋介石的军事整编要求。

1945年9月5日，杜鲁门批准了租借政策。1946年1月19日，他指示将《租借法》的有效期延长至6月30日，而后又延长至10月31日。《租借法》名为援助国民党政府遣返日俘的经济需要，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在近8亿美元的援助物资中，只有300多万用于遣返日本战俘，其余的7亿

<sup>①</sup> FRUS, 1945V II, 第770页。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sup>②</sup>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多都是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①租借政策的核心有三：①协助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地区运送军队，与共产党争夺地盘；②为国民党提供军援，装备 39 个陆军师，建立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的空军和提供海军弹药和维修费；③为国民党训练军官。②1946 年 8 月 31 日，美国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协定》，将美国存放在中国、印度和太平洋 17 个岛屿上的 9 亿美元物资转让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仅付款 1.75 亿美元。③

实力因素使杜鲁门政府坚持了罗斯福的“扶蒋压共”政策，而二战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则促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扶蒋反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共意识形态逐渐成为美国战略利益的判断标准。1946 年 2 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给国务院发了一份 8000 字的电报，提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威胁和美苏不可能和平共处的观点，并提出必须遏制苏联的政策建议。这一报告的思想很快就在美国决策层形成了广泛共识。同年 3 月，杜鲁门陪同丘吉尔到其家乡密苏里州发表了《富尔顿讲话》，号召英语国家打破“铁幕”，解放东欧，遏制苏联。这被认为是冷战第一枪。1947 年 3 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即为了对付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为了维护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国将通过

①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 115 页。

② 同上，第 114—115 页。

③ 同上，第 116 页。

军援支持反共的政权。<sup>①</sup>

由于遏制共产主义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利益，那么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反苏的政府就成为其在华的最大战略利益（有一点需要提出来的，就是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并不等于民主。50年代美国与韩国的军事独裁政权联合反共就是一个范例。）反共的意识形态标准，使杜鲁门政府将中共看作是苏联的盟友，不再可能认为与中共有什么共同战略利益了，能否阻止内战已不再是美国主要考虑的在华利益了。一些将阻止内战和建立民主政府视为美国首要战略利益的美国人士，就无法理解美国政府为何采取武装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例如，闻一多被国民党杀害后，1946年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费正清写到：“闻教授是美国培养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是美国在华利益的象征……革命将危及我们自由主义的利益，然而反动更是在现时就破坏这种利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共是主张变革的党，是目前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以租借的伪装继续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或给国民党军队别的援助，都只能唤起反对我们的势力，使我们的事业无从实现。”<sup>②</sup>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此时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共与美国判断战略利益的标准。意识形态的战略利益标准，使得中共与美国对双边战略利益关系的

<sup>①</sup>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

<sup>②</sup> 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8—321页。

认识达成了一致，即他们的战略利益是对立的。1946年8月，毛泽东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征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sup>①</sup>这种认识坚定了中共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决心。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在华的调停任务，但没有任何结果。于8月10日，他们二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国共双方没法就制止冲突达成协议，这实际上是承认调停失败。<sup>②</sup>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回国，他在华调停的活动彻底结束。

1947年年中，中共军事力量超过了蒋介石，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军事优势使中共建立起赢得内战的信心。而美国政府则更加担心中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1947年7月12日，魏德迈在其使华团制定的工作方针中写到：“在中国、朝鲜或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对建立集权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之政府有利的条件，均与美国政策的目标不相符。”<sup>③</sup>同年9月19日，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全面援蒋的计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9~60页。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422页。

③ FRUS, 1947V II, 第642页。转引自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划。他认为，一个友好的中国能向美国提供反苏的基地和人力物力资源，如果中国被一个亲苏政权所控制，中国将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这些财富，从而危及美国在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基地。<sup>①</sup> 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为蒋介石政府提供5.7亿美元援助的计划。<sup>②</sup> 美国加强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进一步加深了它与中共在战略上的对立，于是双方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此时，双方冲突的战略利益占了首位，美的战略目标是防止中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全力支持蒋介石赢得内战，而中共的战略目标是赢得战争，推翻蒋介石统治。

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同等属性的判断标准可以使中共与美国对双边战略利益产生相同的认识。然而，同一属性的判断标准并不等于判断标准是一样的。中共与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战略利益判断标准都是意识形态，但却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决定了，双方只是能看到战略利益的对立，而注意不到共同战略利益。这意味着，战略利益判断标准的属性上的一致并不必然使中共与美国认识到它们的共同战略利益，还要看这一标准本身是否一致。

### （三）新中国成立时的战略误解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客观上为中共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如果双方改变以意识形态为战略利益判断

①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446页。

② 同上，第452页。



标准，都从实力角度判断战略利益，就会认识到建立外交关系防止新的战争是首要的共同战略利益。但是，由于强烈对立的意识形态对双方战略思维的影响，中美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此外，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使美国过高估计了中美战略需求的不平衡性，以致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全面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要的战略利益是得到国际社会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承认，这也是中共长期奋斗所争取的政治目标；其次是争取安全的国际环境以进行战后的经济重建工作，也就是要防止卷入到新的战争中去。新中国的这两个战略目标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并无伤害，而且有相当的重叠，因为美国要防止中国成为苏联军事集团的成员，而且担心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未能给予中美共同战略利益以足够的重视，在 1949 年春夏之交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共尽管制定了“一边倒”的政策，但仍认为与美国建交利大于弊。毛泽东于 1949 年 4 月 28 日曾指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sup>①</sup>

中共解放南京后，美国也有意考虑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但意识形态的作用和中共“一边倒”的政策，使美国政府还是认定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因此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承认的孤立政策。1949 年 10 月，美国务院召集了历时三天的远东问题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83 页。

专家会议,与会者是些著名的“中国通”,压倒多数的意见主张承认新中国<sup>①</sup>。但是专家们的看法与决策者不同,因为决策者主要从反共的角度分析中美战略利益。他们只看到中共是共产党的一面,而听不进与新中国建交更有利于美国遏制苏联的观点。反共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在 1950 年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达到了顶峰。麦卡锡一度指控国务院里有 205 名共产党员,后降至 57 人,将许多参加对华政策制定的人和学者说成是共产党人或中国间谍。这种指控得到参议院的支持,成立了“泰定斯委员会”对被指控人员进行调查。既然反共成了最高标准,美国采取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1949 年 5 月 13 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向英法等国驻华大使强调,“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sup>②</sup>。1949 年 6 月,司徒雷登有意前往北平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毛泽东得知后决定同意他来。但当司徒雷登向华盛顿请示后,杜鲁门否决了这一动议。艾奇逊批示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sup>③</sup>。

此外美国还认为,中共刚刚获得政权,对美国的需求很大,所以在建交的问题上不但没有采取主动的态度,反而为建

<sup>①</sup>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 265 页。

<sup>②</sup> 《美国外交文件》,1949 年第 9 卷,第 23 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7 年,第 467 页。

<sup>③</sup>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7 年,第 468 ~ 469 页。

交预设了条件。1949年5月，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承认中国要有三个条件：①事实上控制国家领土和行政机关；②有能力和意愿承担国际义务；③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可。<sup>①</sup> 此三项条件中的第一项与第三项对中共都没有问题。因为当时中共已经控制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和人口，而且其民主建国的纲领也得到社会的广泛拥护。然而，第二项则与中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相冲突。这一政策是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进行重新的审查和处理，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sup>②</sup>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以往与美国签订的条约的重新审查。因此中共无法接受美国要中国承认旧中国与美国签订的一切条约。

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使双方轻视了防止卷入战争的战略利益。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双方很快就成为战场上的敌手。美国的傲慢也是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认为新中国刚结束内战，没有实力进行新的战争，于是低估了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朝鲜战争之后，中美两国的学者都有人认为，中美在错误的地方和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史，进一步证明意识形态对中美战略关系的消极影响。以对立的意识形态为战略利益判断标准不仅使中美双方忽视发展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性，而且可能使双方陷入战争之中。当时，如果双方都是以实力为战略利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11、41~42、21~22页。

②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益的判断标准,中美双方就会重视防止战争发生的危险性,双方就可能在建交问题上达成协议。

#### （四）70年代初的战略合作发展

从理论上讲,在任何时候中美之间都是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共存的,但如果共同利益太微不足道,或是冲突利益远远大于共同利益,人们就不会考虑共同利益的存在了。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认为,从 1950 年朝鲜战争到 1958 年中苏关系破裂期间,中美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几乎是不存在的。中美决策者对这一点上的认识也是基本一致的。

1958 年中苏关系破裂为中美共同利益的再现创造了条件。随着中苏关系不断地恶化和美国在越南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防御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也不断地增长起来。许多学者认为 1969 年中苏边界军事冲突发生之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才形成。而笔者认为,中美客观共同战略利益的形成始于 1958 年中苏分裂,1969 年的军事冲突不过是进一步使两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中美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性。

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之前,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已感到了双边共同战略利益,只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1968 年 11 月中国就主动让驻芬兰的临时代办与美国驻芬兰大使接触,建议 1969 年 2 月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在当选总统之前,尼克松就对中美共同战略利益有了新的认识,他在 1967 年 10 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烈争辩同中国打通关系是符合美国长期战略利益的。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在全

球性的战略、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当选总统后，他对来访的外国要人反复强调中国的幅员、人口和战略上的潜力，总是说“同中国人对话总比同他们打仗好得多”。<sup>①</sup>1970年10月，尼克松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他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世界大国，如果现在不是，那么20年后会是。<sup>②</sup>1971年5月4日，他在肯萨斯城演说时说：“无可避免地，八亿的中国人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力量——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向其它方向进发，他们在那些领域上可能达到一切。”<sup>③</sup>他认为在10—15年的时间里，中国将具有与美国、西欧、苏联、日本相似的超级经济实力。<sup>④</sup>

尼克松政府对中美共同战略利益认识的变化，表明美国决策者判断其在华战略利益的标准有了变化。尼克松开始淡化意识形态标准，而重新回到罗斯福的实力标准。这时中共已是中国的执政党，因此实力标准使尼克松以罗斯福的逻辑得出了必须与执政的中共发展战略关系的结论。此时中共与国民党在美国战略家眼中的实力位置转换了。尼克松政府认为美国遏制苏联和从越南脱身的战略利益更多地是需要中国的帮助而不是台湾的国民党。1969年1月就任总统后，尼克松很快就要求政府研究转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和转变政策的

① 约翰·H·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林均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② 同上，第52页。

③ 《中美关系文件汇编1940—1976》，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7年，第283页。

④ 同上，第285页。

步骤，并将该项研究工作交给他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负责。<sup>①</sup> 1969 年 7 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11 月他停止了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的定期巡逻，12 月尼克松政府又让驻波兰大使与中国驻波代办接触，要求进行会晤。<sup>②</sup> 1970 年 4 月，美国驻巴黎武官主动与中国武官接触。同年 10 月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带信给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的决策者对中美共同战略利益的判断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中苏关系破裂后，两国对立关系日益尖锐。中国领导人对中美战略关系的认识也开始从意识形态分析转向实力考虑。中共不再认为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就必然有较好的关系，也不认为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就不能进行战略合作。六十年代末，中国开始考虑与美国重新接触，毛泽东提出了修正主义比帝国主义更危险的说法，这为同美国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反对苏联提供了理论解释。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解释在以后的政府文件中有充分反映。1973 年 2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第 12 期《外交通报》提出，今后中国的对外方针“依然是反对两霸，但要有主次”，这是由于“目前苏修构成对我的最大威胁，且苏联具有更大的狡猾性、欺骗性和危险性，因此打

<sup>①</sup> 约翰·H·霍尔德里奇：《1945 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林均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第 37 页。

<sup>②</sup>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19 页。

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sup>①</sup>

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上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标准后，便开始主动回应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夫妇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11月，他托叶海亚·汗带信给尼克松，表示愿在北京接待他的特使，讨论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sup>②</sup>1971年4月，中国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就公开了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

经过双方多次的接触和讨论，终于使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得以访华，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战略对抗的历史暂告一段落。双方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又称为《上海公报》)。公报中双方观点最为一致的地方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sup>③</sup>对于中国来讲，按照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当时霸权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公报中有关中美不谋求霸权

<sup>①</sup>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

<sup>②</sup>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20页。

<sup>③</sup> 《中美关系文件汇编 1940—1976》，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7年，第330—331页。

的说法,实际上是说苏联在谋求霸权,双方共同反对苏联。中美双方在《上海公报》中的一致点充分表明双方判断共同战略利益的标准有了相当的一致性,而且双方把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利益放到了首位。这时中美意识形态分歧已被反苏的战略需要压倒了。1973年5月3日,在其第二届任期内给国会的报告中,尼克松解释其对华政策时说:“我们两国在采取这一方针时,是充分知道我们的分歧的。我们决定要改变我们的关系,是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的根本的国家目的。”<sup>①</sup>

《上海公报》虽反映了中美领导人在遏制苏联问题上取得的战略共识,但同时也反映出美国扶蒋反共因素仍对双边战略合作有重大影响。基辛格于1971年10月和1972年1月分别对华又进行了两次访问,其间中美就台湾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时,他仍坚持美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立场,说不能丢弃台湾,提出美从台湾撤军的条件是中国保证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方则重申,中国用什么方式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自己的内政。最后在联合公报里,中美分别表达了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中方重申:“台湾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

<sup>①</sup>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 年中美关系的演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方则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sup>①</sup>

虽然中美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可以暂时搁置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影响了中美战略合作的发展速度。中美首脑虽然进行了对话，但台湾问题仍阻碍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无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除了进一步证明共同的判断标准是中美认识其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外，还提供了另外两点启示。一是当中美都不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他们的共同战略利益时，它们就较容易认识到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二是插手国共矛盾是美国的既定对华政策，美对国民党的支持将长期影响中美战略合作的深入。

### （五）结论

从《五条协议草案》到《上海公报》的 28 年里，中共与美国

<sup>①</sup> 《中美关系文件汇编 1940—1976》，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7 年，第 331 页。

的战略关系经历了协调、摩擦、对抗,而后回到战略合作的轨道上来。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注意到发展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两个重要条件。

1. 中美只有放弃意识形态分歧才有发展战略合作的可能。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有两个层面,即基础层面和功能层面。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是基础层面,对共同利益的认识是功能层面。共同战略利益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自然地导致中美战略合作。而只有在功能层面上,中美决策者认识到这些利益的存在和其重要性,才有可能实现战略合作。1945—1972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意识形态分歧是阻碍双方就共同战略利益达成共识的最主要障碍。冷战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意识形态分歧又成为两国在共同战略利益认识上的主要障碍。只要美国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威胁,中美发展积极的战略合作就是不可能的。中美两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东西方文化上的区别也决定了两国的意识形态分歧将长期存在。因此,通过弥合意识形态分歧来促进双边战略合作是困难的,而只有搁置意识形态分歧才是最有效促进战略合作的方法。

2. 台湾问题的存在将限制中美积极战略合作的发展。中美战略合作有两个层面,即共同对付外部安全威胁的积极合作与防止相互军事冲突的消极合作。自1944年以来,介入国共冲突成为美国的既定对华政策。美国就是否应介入国共冲突的讨论断断续续进行了半个世纪,这也表明美国这一既定政策是难以改变的。中美领导人就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中美之间的战略

作将是有限的。在共同的外部战略威胁不明显的情况下，台湾问题有可能促使中美在消极战略合作方面有所发展，但它将严重阻碍双边积极战略合作的发展。

（香港《亚洲评论》1999 年春夏号）

### 三、中美需要稳定的关系

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上，两国领导人表示，中国和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仍存在着分歧。这种共识和分歧共存的现实，将是未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比较长期的现象。

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是复杂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曾是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执行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出现了 26 年的对立关系。中苏战略关系的对立，使中美关系在 1971 年得到改善。但是，从 1989 年至今中美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起伏。此次奥克兰中美首脑会晤中，两国领导人重申，要继续他们 1997 年提出的“致力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这表明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

从冷战后的历史看，中美关系呈现出有起有伏的状态。自 1989 年中美关系出现战略性转折后，双方领导人没有放弃使两国关系重新恢复到战略合作轨道上来的努力，但由于双方结构性的矛盾无法消除，于是个别事件的发生不断地使这种努力受挫，两国关系呈现为时好时坏的齿形曲线。1989 年美国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制裁，双方几乎陷入新的冷战。邓

小平同志以“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的政策，使中美避免了新冷战。但是1992年美国决定提高对台湾武器出口的数量和质量，使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严重受挫。中国领导人通过“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政策，再次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契机。然而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发生逆转，双方于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军事对峙。而后，克林顿政府明确了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双边紧张关系重新走向缓和。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终于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双方还决定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1999年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事件，使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此次中美首脑会谈是使双边关系走出低谷的努力。

这次首脑会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从长期趋势上看，结构性的矛盾与政治制度上的矛盾仍会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下世纪的战略目标是将冷战后获得的霸权地位长期保持下去，而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是在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崛起。战略目标的矛盾，使中美的对外战略会有对立的一面。美国要建立以美国主导的一级霸权体系，而中国则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由于中美在下个世纪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问题上有结构性的矛盾，因此这种矛盾会使中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分歧。

从中期上看，美国大选将阻碍双边关系改善的速度。对华政策正在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选战中的一个问题。

共和党及美国的反华势力将联手鼓吹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为了选举大战的需要，克林顿政府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将不敢迈出大的步伐。美国大选虽然明年底就可揭晓，但在 2001 年 6 月之前，仍难期望中美关系出现根本性改善。因为新总统上任的头半年里采取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较小。

从近期上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之后，虽然遭到岛内外的反对，但他并无悔改之意，反而于 8 月 29 日将“两国论”写进国民党的文件。因此李登辉在明年 5 月 20 日下台前进一步官方化他的分裂政策的危险不能排除。如果李登辉进一步将“两国论”法律化，则必将使目前紧张的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而中美关系也有可能被拖入新的危机之中。

中美发展稳定的战略关系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国家关系，使得这些国家的关系在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发生重大危机。从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考虑，中美建立一个稳定双边关系的机制比改善双边关系的机制更为重要。只有中美双边关系确保没有全面军事对抗的危险，双方才有可能在建立 21 世纪国际新秩序的重大问题上发展长期的积极合作。从双边关系的中期发展角度讲，双方有必要改变每一两年就发生一次危机的态势。改善中美关系的重点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的消极合作，需要注重长远的积极战略关系，减少结构性矛盾的负面影响。就当前中美关系走向而言，防止台湾把中美拉入军事对抗已成为双边的首要考虑。李登辉的“两国论”出台后，美国对台又出售了 5.5 亿美元的武器，助长了

台湾分离主义分子走向正式独立的气焰。为避免 1996 年那样的军事对峙再次发生，中美安全对话显得必要和紧迫。此次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奥克兰会晤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强调指出，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就是要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局面，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且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事实证明，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是改善中美关系的绊脚石。克林顿也表示，他完全理解台湾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他立即重申，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李登辉的“两国论”给中国和美国都制造了许多麻烦。他愿意重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应当说，这为恢复中美关系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稳定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双边关系，而且关系到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在安全上，将有利于发展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和发挥联合国的维和作用；在经济上，将有利于东亚地区加快摆脱金融危机的步伐，加快落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有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技术合作的计划；政治上，将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瞭望》新闻周刊 1999 年 9 月 20 日第 38 期）

#### 四、睦邻友好——外交战略的基点

外交战略是十分复杂的学问与艺术，但其核心却又十分简单，即争取最大的国际支持维护国家利益。“睦邻友好”与“远交近攻”作为两种最基本的外交战略总是引起战略家们的争论，何者能争取到更大的国际支持，何者便能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而笔者认为，“睦邻友好”与“远交近攻”在战略选择次序上有一个先后的区别。“睦邻友好”是第一选择，而“远交近攻”是第二选择，也就是说当“睦邻友好”行不通时才应选择“远交近攻”。其逻辑是，如果国家利益的威胁来自远方，就理所当然依照唇亡齿寒的原理采取“睦邻友好”的战略；而如果威胁来自邻国，“睦邻友好”战略无法实施，于是只好选择“远交近攻”战略。

冷战后大国的外交战略基本上符合这一原理。美国以美洲为睦邻友好的基地向外扩展，与外围的日本、澳大利亚和西欧结为主要盟友；德国、法国、英国以西欧睦邻友好为战略基点，但由于把俄罗斯视为威胁，于是欧洲采取欧洲之外又以美国为主要盟友的战略；日本由于把近邻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因此采取以远结美国以日美同盟为基点的外交战略。我国面临的周边情况则是，周边国家既不都是我可靠的朋友，但也不是最主要的威胁。既然最主要的威胁不是周边国家，因此睦邻友好作为第一外交战略选择就值得认真考虑。笔者认为周边



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应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点。

首先，中国的国际利益主要集中于其周边地区。经济上，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56% 集中于周边地区，其中 53.6% 是在东亚地区，而其它的 44% 分散于北美、南美、欧洲、非洲、大洋洲和中东六个地区；军事上，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安全，目前面临的最主要战争危机是在东亚地区，而世界其它地区的安全状况对我国的影响都还是间接的，因此争取较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政治上，只要周边国家不支持中国的分离主义势力，分离主义分子就难以向国内渗透，国内分离主义势力就不能造成严重威胁。

其次，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有较多的共同利益。一般讲来，国际身份重叠较多的国家共同利益也较多。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国家都是亚洲国家，这使我们有了维护本地区安全和发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共同的利益；经济上，除日本外其它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总体经济水平尚不如中国），这些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上有着较多共同利益；政治文化上，除俄罗斯和菲律宾之外中国周边国家基本上具有佛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传统，都属于非西方文化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国际政治中有较多的共同利益，如人权、主权、不干涉内政等问题。中国当然也与周边国家有很多的差别和不一致的利益，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周边以外地区的国家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更少。例如，周边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拥有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相同的共同利益之外，它们与中国至少还有额外的地缘上的共同利益，如地区贸易、地区安全等。

其三，中国实力只能较好地维护其周边地区的利益。以国土和人口为标准，中国是个世界大国，但如果以综合国力为标准，中国还只是一个地区强国而不是一个世界强国。199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700亿美元，不足美国的八分之一，约为日本的四分之一和德国的二分之一，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日本的二分之一，仍略小于德国。军事上，中国海军只有近海作战能力，尚不能进行大规模远洋作战。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中国起有重要作用的影响力还不能超越周边地区。对于欧洲的巴尔干地区冲突、中东和平进程、非洲大湖区动乱、拉美地区的国际矛盾，中国的影响力都还有限。然而对于周边地区事务而言，中国的作用则至关重要。摆脱东亚金融危机、防止地区军事冲突、发展东亚模式等，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支持。

其四，区域化有利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区域化则是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主观策略。经济全球化在冷战后大大提高了国家间的经济依附度，这与国家作为最基本行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不相适应，于是世界经济基础与国际上层建筑的矛盾加剧。这一矛盾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对其国家主权的挑战。例如，经济全球化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发达国家严格控制签证造成大量非法移民，这与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严格控制进口导致大量走私是同一原理。不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较适应全球化，因此应对这种挑战的能力也较强。冷战后，欧洲、美洲、拉美、中东都采取了区域化的策略，以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中

国周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次区域化的方法应对经济全球化，但是大的区域化努力尚无成果。如与周边国家加强区域化合作，将有助于减轻经济全球化负面作用对中国构成的挑战。

其五，区域化有利于促进多极化发展。冷战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美国力图将其霸主地位长期保持下去。中国、俄罗斯、法国及世界上许多国家不满意美国的霸权政策，因此希望推动多极化的发展。然而，从一超多强的实力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多极化的可能性小于地区多极化的可能性。199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5万亿美元，日本为3.7万亿，德国为2.3万亿美元，世界上其它国家经济规模与美国的差距就更大。由于美国率先进入知识经济阶段，这如同英国率先进入工业化阶段一样，因此其经济将可能获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如果美国保持2.5%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日本就得保持5.7%、德国得保持9.2%的年均增长率才能防止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其它国家将需要更高的年均增长速度才能保持与美国的差距。因此在可见的未来，出现国家多极化的可能性较小。然而，如果东亚国家效仿欧盟，通过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策略，推进多极化则有较大的可能。1998年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万亿美元，东亚地区为6-7万亿美元。在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同时，如果欧盟能保持与美国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东亚保持4%的增长速度，则在可见的未来具有实现多极化的较大可能。如果东亚区域化能扩展到南亚和中亚，则可以加快多极化的速度。

从理论上讲，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点有五种选择：①只靠自己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②依附于美国的“一边倒”；③争

取第三世界的“统一战线”；④结盟俄罗斯和印度的“军事同盟”；⑤促进睦邻友好的“区域化”。依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选择面临的是，中国自己的实力难以实现多极化战略目标；第二种选择则不适于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和其历史传统文化；第三种选择无法克服第三世界国家太多、差异太大，共同利益不明显的困难；第四种选择是中印俄同盟依然无力对抗北约与日美同盟，而且有卷入新冷战的危险；第五种选择则较适合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能较有效地维护中国现实利益。

中国周边地区由东亚、南亚、中亚三个地区组成，而最有潜力的地区是东亚。东亚包括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第二军事大国俄国、快速发展的中国、加强联合的东盟及亚洲四小龙。因此当我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化合作时，东亚宜成为我区域化的基点。东亚区域化落后于世界其它地区有其内在原因，该地区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国际地位的差异常较大，美国霸权从中作梗，边界矛盾较多，文化多元性较强等。然而，克服这些问题的困难程度要比克服前四种策略所面临的困难相对容易，因此改变实力对比差距和改变国家政治制度的难度要远大于改变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对外策略可以有效地改变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却难以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差距。根据欧盟的发展经验，东亚国家应从加强经济合作入手逐渐促进地区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1999年11月中日韩首脑会晤为东亚区域化创造了新的契机，中国宜充分考虑如何促进东亚区域化发展的问題。

## 五、台湾问题需要早日解决

我国政府于 2 月 22 日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提出:“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统一大业。”3 月 5 日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中国人民有决心也完全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于是人们不由自主地要问两个问题: 1. 为何提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2. 早日解决的时间表是什么?

笔者认为要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台独”的危险在增长,二是台湾问题给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日益沉重的压力。

台湾问题虽然已经存在了 50 年,但是近几年台湾问题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则可能导致台湾独立。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执政时期,他们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因此在他们执政时期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即使台湾当局不与大陆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对话,也没有台湾分裂出去的危险。然而,李登辉执政之后采取变相独立的政策,暗中支持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以至去年 7 月发表“两国论”台独政策,由暗独走向公开独立。由于台湾当局不再执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如果再允许台湾当

局无限期拖延两岸统一的谈判，台湾独立的危险就可能成为现实。正是因为台湾问题无法再长期拖延下去，因此客观上需要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分离主义活动已经严重干扰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给我现代化建设增加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由于台湾当局以分裂为政治目标，因此使中美关系不断受到严重干扰。冷战后中美之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本已使两国间的战略合作十分困难，而“台独”势力不断坐大在中美之间不断地制造新的麻烦，使困难的中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美国是冷战后惟一的超极大国，中美关系恶化严重影响我国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大搞“金钱外交”，破坏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外交资源本来就有限，而为了反击台湾在国际上破坏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不得不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使得本应用于在国际上维护我国其它国家利益的资源受到影响。由于台湾当局采取公开分裂国家的政策，又为我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借口。鉴于台湾问题对现代化建设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需要。

既然早日解决是一种战略选择，那么何时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应由两个要素决定，即“台独”发展趋势和我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台独”势力的发展有可能使台湾问题很快解决。如果“台独”势力发展很快，而且在台湾掌握了政权，使和平统一变得没有了希望，那么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就到来了。也就是说台湾走向独立越快，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就越早。如

果李登辉之后的台湾领导人继续李登辉的“台独”政策,或是比李登辉在“台独”的路上走得更急,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随时都可能的。

政治对话是检验台湾当局是否采取无限期拖延态度的试金石。两岸政治对话的核心是怎样实现民族统一,如果台湾拒绝政治对话,或是在政治对话后采取无限期拖延对话结果的政策,就是反对国家统一,因此在这两者情况下都不能排除大陆采取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其它方法。台湾与大陆开启了政治对话后,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新台湾当局是否有和平统一的意愿,是否变相搞无限期拖延策略,是否在政治对话中搞分裂。大陆中央政府至今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希望,然而即使实现和平统一需要较长时间,但也不是无限期的。21世纪中叶实现四化是中华民族的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民族统一为重要前题的,因为没有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现代化将是不完整的。因此可以认为,无论以何种形式统一,解决台湾问题都将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11日,原文题为《台湾问题需要尽早解决》)

## 附录：

### 一、阎学通 宋楚瑜 谈两岸关系

台湾独立“总统”参选人宋楚瑜昨天表示,如果他当选,会建议两岸在国际见证下签署互不侵犯协定,以降低两岸的紧张关系。

宋楚瑜昨天下午是在台北接受美国电缆新闻网(CNN)千禧年特别现场的专访,与在北京的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阎学通博士进行视像会议的对谈时,作出以上的表示。

这也是宋楚瑜第一次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同场对谈。

宋楚瑜指出,台湾海峡如果发生战事,会影响东亚地区和平,因此两岸未来要在国际见证下签署互不侵犯协定。若能建立这种机制,对两岸和平、经济交流都有助益。

他还说,由国际见证两岸签署互不侵犯协定,并不是引进国际势力干预两岸事务,而是要降低两岸敌对关系。

阎学通也是现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他在较早指出,如果宋落选,台湾将出现倾向独立的“总统”,中国可能会有所反应。

针对这一点,宋楚瑜说:“我想,在台湾我们(各“总统”参选人)在各自主张上存有一些分歧。如果我当选,我主张消除



当前的（两岸）紧张局势，我将推动就更广阔范围的课题进行对话；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可以在国际，特别是有美国和日本的见证下，签署一份互不侵犯协定。”

对宋楚瑜的这一主张，阎学通表示希望宋能拿出具体的措施，尽可能早日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

美国电缆新闻网主持人在节目中也提到，身为中国政府智囊成员的阎学通，曾经向中国政府和军方建议采取某种展示军力的行动，好让台湾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实力；主持人因此问阎学通：是否主张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阎学通回答说：“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是作为一种阻吓的手段。这并不是针对全体的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及台独分子。”

宋楚瑜则指出，北京应该了解一点，台湾人民觉得中国大陆一直利用武力来威胁台湾，台湾人民拒绝接受这种武力的恫吓。

他说：“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能够明白，台湾人民有权利以自由民主的方式来选出自己的政府。美国宪法赋予人民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权利，为什么台湾人民就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

他并且引用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名言“我们并不害怕谈判，但我们不能在害怕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表示两岸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化解争端，但台湾人民不愿意在受到恫吓的情况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另据台湾《中时晚报》报道，宋楚瑜在专访过后召开记者

会表示，台湾强化国防力量是有必要的。

由于国民党一度批评宋楚瑜的大陆政策是投降政策，宋楚瑜的国防政策主张，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

不过宋楚瑜表示，为了避免助长两岸关系紧张，他主张台湾把强化国防界定在防卫上，而非军备竞赛。因此，他并不反对台湾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宋楚瑜还形容两岸关系是“准国与国关系”。

他说，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此架构下进行交流，并不是国内关系，但也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国对国关系，而应该是“准国与国关系”。所谓的“准国与国关系”是两岸不相互隶属，彼此主权是独立的。

宋楚瑜并表示，他将在下周提出他未来执政后的大陆政策白皮书。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1.3

记者:李气虹)

## 二、美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摘要）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候，地球另一侧的事件可能对我们的安全与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保护我们国内的民众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我们的责任——是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利用这个新的全球时代带来的机遇造福于我们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为此目的，我们为新世纪奉行一项前瞻性国家安全战略。根据 1986 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第 603 款提交的这份报告阐明了这项战略。它的三个主要目标是：

- 加强美国的安全。
- 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
- 促进国外的民主与人权。

美国必须具备执行这项战略的必要手段。

### 一、引言

#### 机会与挑战

21 世纪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时代。全球化——加快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使各大陆的居民关系更加密切，允许他们在顷刻间交流思想、商品和信息。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美国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尊重根本人权和法制等核心价值观,创造了促进和平、繁荣和各国之间进行合作的新机会。许多昔日的对手现在已经为共同的目标与我们合作。全球经济的活力正在使商务、文化、交流和全球关系发生变化,为美国人创造了新的工作和机会。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风险。日无法制的国家和民族冲突威胁着世界上许多重要地区的稳定与进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活动、毒品贩运和其它国际犯罪活动,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起源于海外的其它问题,例如资源枯竭、快速的人口增长、环境受到的破坏、新的传染性疾病、普遍的腐败以及失控的难民迁徙,对美国的安全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 国家利益

由于总是有许多呼吁美国采取行动的要求,我们的国家利益必须是明确的。这些利益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重要利益——对我们国家的生存、安全与活力有广泛的、压倒一切重要性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我们的领土以及我们盟国的领土的实际安全、我们公民的安全、我们社会的经济利益以及保护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免受致命的攻击,包括能源、银行和金融、电信、运输、供水系统和紧急服务设施。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捍卫这些利益,包括在必要和适当的时候单方面和果断地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

第二类利益是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并不影响我们国家的生存,但是确实影响我们国家的安康和我们所在的世界的性质。例如,重要的国家利益涉及我们在其中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或对盟国有承诺的地区,保护全球环境免受严重

的破坏，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和起严重不稳定作用的难民潮的危机。

第三类利益是人道主义利益和其它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国家可能采取行动，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要求采取行动。具体事例包括对天灾人祸作出反应、促进人权和寻求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支持民主化、遵守法律和文职人员控制军队、协助从人道主义出发清除地雷的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传播民主和尊重法制有助于创造一个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最有利的国际社会。

#### 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我们所处的安全环境动荡不定，充满许多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威胁的挑战。

地区性威胁或以国家为中心的威胁：一些国家有通过胁迫或侵略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能力和意愿。

跨国界威胁：这些威胁没有国界，常常来自非国家行动者，例如恐怖主义者和犯罪组织。他们在美国和国外威胁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公民。

危险技术的传播：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全球稳定与安全构成最大的潜在威胁。先进武器和技术的扩散有可能向无赖国家、恐怖分子和国际犯罪组织提供对美国、我们的盟国以及在国外的美国公民和军队造成严重破坏的手段。

失败的国家：在新世纪，尽管国际上作出了预防性努力，一些国家有时仍将不能为它们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管理、安全和机会，有可能造成内部冲突、大规模的迁徙、灾荒、流行病、环境灾难、杀戮以及对邻国和少数民族群体的侵略——这些

事件可能威胁到本地区的安全和美国的利益。

其它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具备统治的能力,但是可能屈服于煽动家的煽动性言论。这些煽动家们将本国的弊病归咎于某些宗教、文化、种族或部落群体并对这些群体进行起诉。一些国家不尊重本国公民的权利,容忍或者严重侵犯人权,进行种族清洗或采取种族灭绝的行动,这些国家不仅伤害本国人民,而且可能引发内战和难民危机,使内战或难民危机向外蔓延,破坏一个地区的稳定。

外国情报搜集:外国情报搜集部门的威胁比过去更加多样化,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对付。这种威胁来自传统或非传统的情报对手,他们的目标是美国的军事、外交、技术、经济和商业秘密。

环境和健康威胁:环境和健康问题可能影响美国公民的福利,在今后若干代人的时间里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在国外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利益。这些威胁没有国界。

#### 接触战略

我们的战略是以美国在国外继续进行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为基础的。如果我们要想国泰民安,美国就必须在海外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的战略有三个核心目标:增强美国的安全,促进我们的经济繁荣,促进国外的民主与人权。我们坚信,这转过来会促进我们的头两个目标。

#### 实施这项战略

国际合作将对下个世纪加强安全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不能由一个国家加以解决。我们的许多安全目

标已经圆满实现，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是通过国际组织和我们的联盟利用我们的影响和能力，或者通过一个围绕某项特定目标成立的特别联盟发挥领导作用，这些目标只能通过这些办法来实现。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导作用，以及同盟国和友好国家的持久关系，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我们的战略的主要宗旨是巩固我们同世界各地主要国家的正式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调整，在必要时创建新的关系和结构，加强友好国家为实现共同目标在本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

在国内，我们必须具备有效地挫败恐怖行动并采取对策、打击国际犯罪和外国情报搜集以及保护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的能力。

我们的民主理想和价值观是我们的国际领导作用的支柱。在制订我们的战略时，我们认识到，民主的传播、人权以及对法制的尊重，不仅反映美国的价值观，而且还促进我们的安全和繁荣。

## 二、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 1. 加强国内外的安全

我们加强美国安全的战略有三个组成部分：创造国际安全环境、对威胁和危机作出反应以及准备应付将来的不测事件。

#### 创造国际安全环境

美国寻求通过各种手段创造这种国际环境,包括外交、经

济合作、国际援助、军备控制和不扩散、保健计划等。

**外交** 外交是对付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的重要手段。通过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外交使团和代表进行的日常外交活动是不可取代的引导性活动。

当潜在冲突或潜在威胁的迹象出现的时候，我们采取行动预防或减轻这些威胁。多次出现的教训之一是预防性外交在对付冲突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危机控制和危机解决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必要任务，但是预防性外交更为可取。

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外交承诺，确保我们在国际组织有支持我们的全球利益所需的外交代表和发言权。

维护我们在全世界的领导作用、影响和信誉需要我们保持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人员，还需要在国外有可靠的外交基础设施。使领馆以及我们的外交电信和信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对于促进和保护我们在海外的重要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公众外交** 我们有利用公众外交手段，向各国公众宣传美国的原则和政策，促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领导作用的义务和机会。在全球促进自由和推广因特网这样的信息技术，增强了公民和组织对外国政府的政策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的能力。这使我们的公众外交——向世界各地民众传送情报和信息的努力——成为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计划增强了我们向外国公众提供情况和发挥影响，支持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能力，扩大了美国公民和机构同国外公民和机构的对话范围。

有效地利用我们国家的信息能力对付错误的情报和煽



动、减轻种族间的冲突、帮助独立的媒体组织和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支持民主参与，有助于促进美国在国外的利益。

**国际援助** 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使国际犯罪的增长放慢，遏制了对健康的主要威胁，改善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政治、法制、宗教自由和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以避免，美国的预防性外交得以积极地实施。

**减债**是我们为减轻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和在世界各地发展更强大的贸易和投资、安全和民主伙伴的全面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的援助计划，加上其它努力，例如我们的科技与技术合作计划，可帮助减少采取代价巨大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措施的必要性。当援助计划成功地促进民主与自由市场的时候，美国的出口通常出现大幅度增长。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计划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我们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保卫我们国家的努力的重要补充。

对战略进攻性武器进行可以核实的削减以及不断地转向不严重破坏稳定的系统，对我们的战略仍然必不可少。

反弹道导弹条约仍然是战略稳定的支柱，美国决心继续努力增强这项条约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

要想得到安全,我们就不仅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还必须带头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和更负责的世界。我们有限制核武器扩散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根本责任。为此,美国仍然决心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能够生效。

军事活动 美国军队在以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但又不成为外交、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活动等其它形式的接触的替代物的方式,塑造国际安全环境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在海外的驻军和像防务合作、安全援助以及同盟国和朋友一起进行的训练和举行的演习这样的和平时期的接触活动,我们的武装部队将帮助制止侵略和高压统治、建立联盟、促进地区稳定并且成为新兴民主国家的军队的行为榜样。而与既不是坚定的朋友,又不是已知的敌人的国家,今天的军事合作可以作为一种建立安全关系的积极手段,这种安全关系将有助于明天改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决心捍卫人权,我们将继续确保我们不训练也不帮助已知的侵犯人权者。

保持我们在海外的驻军将促进地区稳定,从而使我们的安全承诺具有实质性内容、帮助阻止权力真空的形成和出现不稳定局势,并且有助于通过表明我们保卫美国、盟国和在关键地区的友好利益集团的决心来起威慑作用。

战略机动性是我们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允许美国在国内或者国际许多危机中首先到达现场提供帮助是极为重要的,而且这是美国成功地发挥领导作用和进行接触的关键。

虽然军事活动是我们塑造全球安全环境的努力的一根重要支柱,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我们的武装部队的主要使

命，是在我们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的冲突中起威慑作用，必要时进行战斗并且取胜。

美国决心维护国际公认的在世界海洋的自由航行权和飞越世界海洋上空的权利。这些权利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实力和保持全球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决心保持美国在空间的领导地位。畅通无阻地进入并使用空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对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促进我们的繁荣和确保我们的安乐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还决心保持信息优势——搜集、处理和传播不间断流动的情报资料，同时利用和(或者)剥夺敌人这样做的能力。战略以及对部队的指挥和控制越来越多地依靠信息系统和技术。我们必须跟上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以使我们能够培育在美国部队和盟国伙伴中间形成信息优势的可能性，并且从中获得好处，同时利用我们敌人的信息能力的不足。

高素质人才——文职人才和军事人才——是我们在实施我们的防务活动时的最重要资产。

环境和健康计划 今天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决定可以影响我们几代人的安全。环境威胁不受国界的限制；海外的环境危险可以给美国人的安全和幸福造成长期威胁。自然资源的不足可以引发和加剧冲突。像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耗尽、引进有害的动植物物种，对鱼类、森林和其它有生命的自然资源的过度捕捞、砍伐和开发，以及危险的化学制品和废料的跨国运输这样的环境威胁，直接威胁着美国公民的健康和经济安乐。

我们制订了一项完整的外交议程来大胆地对环境威胁作

出反应。

疾病和健康危险再也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国内问题了。像全球经济一样，全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正在变得越来越互相依存。因此，我们正在发挥领导作用来促进在健康问题上的国际合作。

#### 对威胁和危机作出反应

由于单靠我们的塑造努力不能保证会出现我们所寻求的国际安全环境，因此，美国必须能够在国内外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和危机作出反应。

**跨越国界的威胁** 跨越国界的威胁包括恐怖活动、贩毒和其它国际犯罪活动，以及可裂变物质和其它危险材料的非法交易。

**恐怖活动。**美国已经作出协同努力来阻止恐怖分子采取活动并且惩罚恐怖分子，同时仍然决心逮捕那些威胁美国公民的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我们决不向恐怖分子作出让步。我们将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机制来惩罚国际恐怖分子、消灭外国恐怖分子和他们在我们国家的支持网络，并且扩大对国际恐怖主义支持网络实行经济制裁的范围。同时，我们将设法捣毁恐怖分子在海外的庇护所、对付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和帮助其它国家的政府提高它们打击恐怖活动的的能力。

**贩毒等国际犯罪活动。**源于海外的广泛的犯罪活动威胁到了美国人民的安全和正常生活。

**贩毒。**我们已经表示，通过顽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能够在根治吸毒和贩毒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控制毒品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加大防止的力度，改善治疗计划，加强执法和严格惩罚措施，到 2007 年，将非法使用和获得毒品的活动减少 50%，同期将吸毒和贩毒在健康和社会方面的影响缩小 25%。我们的战略认识到，国内外的预防、治疗和经济上的替代方式必须与搜集情报、执法和惩罚结合起来。

在国内，我们寻求教育并促使美国青年拒绝毒品，通过大幅度减少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活动和暴力事件来增加美国公民的安全感，减少公众在健康和社会方面为非法吸毒付出的代价，减少国内种植大麻和生产脱氧麻黄碱（一种强兴奋剂）等人工合成药的数量，使美国在空中、陆地和海上都免受毒品的威胁。

全国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致力于对付由发展并部署远程导弹构成的、不断增加的危险。这些国家可能会对美国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们打算在 2000 年决定是否要部署有限度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以对付其它胡作非为对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弹道导弹威胁。政府的决定将建立在决定部署这种系统时必须考虑的以下四个因素评估的基础之上：(1)这种威胁是否正在逼近；(2)建立在最初一系列严格飞行试验基础之上的技术状况和拟议中的这一系统的实战效率；(3)是否能够承受建立这一系统的经费负担；(4)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对整个战略环境和我们的军备控制目标产生太大影响。这些目标包括根据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而作的努力。

打击外国情报搜集工作 由于我们在军事、科技和经济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美国是外国情报机构的主要目标。外国情报机构无孔不入地寻求获得美国政治和军事意图及能力的情报，并加紧搜集关于美国武器系统、可用于军事的新兴技术和相关的技术手段的保密或敏感情报。

为了保护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敏感情报，我们必须有效地打击外国情报机构搜集情报的工作，手段是采取有力的反情报措施和实施安全计划。在过去 5 年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反情报机制，以对付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并执行了一些程序，以加强情报机构、反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我们对付外国情报机构搜集情报的威胁的能力。当我们进入 21 世纪时，我们将继续加强和提高我们的反情报能力。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是建立在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设施包括电信、能源、银行和金融、交通、供水系统和突发事件处理机构等。这些基础设施易于遭到电脑和人发动的攻击。与其它任何国家相比，美国更加依赖于网络系统。我们明白，其它国家的政府和一些恐怖主义组织正在构筑先进的、组织完善的能力，以便对关键的美国信息网络和依赖它的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发起攻击。

总统已经下达指令：在 2001 年 5 月之前实施一项保护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这项计划必须在 2003 年 12 月之前全面启动。

我们正在建立在攻击造成严重破坏之前能够发现并作出

反应所必需的若干系统。执法部门、情报机构和私营部门将首次以符合美国法律的方式交换有关网络系统面临威胁的情报。政府正在开发和实施发现黑客侵入网络的新技术，加强保护国防部和其它关键的联邦系统。我们还鼓励私营部门开发和实施适当的保护技术。在严重的网络攻击实施时能够迅速恢复网络系统的一项全国性计划正在制订之中，联邦政府的各个部也正在制订保护其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这些基础设施包括网络系统和有形的设施。

最终，我们还将奠定一个永久保护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牢固基础，即增加用于信息安全方面的联邦研制经费，增加对维护网上安全的工作人员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投资，对是否要制订保护我们公民的自由权和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法律作出评估。

为国家安全面临突发事件作好准备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威慑并制止起破坏作用和威胁性的力量——如恐怖主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我们关键基础设施和以地区或国家为中心的威胁等——来危害我们的公民。但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我们必须准备为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在国内外作出有效反应，调动为有效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所必不可少的人员、资源和力量，并确保我们的各种机构和基础设施得以保存。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持续不懈地作出努力，以使政府各部、机构和军队制订出全面的、对付各种危险的应急计划，建立一个牢固的、反应迅速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并把这一切作为准备对付涉及国家安全的突发事件的必备条件。

除了保卫美国本土之外，美国必须准备对全面威胁到我

们海外利益的行动作出反应。较小规模的应急军事行动包含除重大战区战役之外的所有军事行动，其中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维和行动、实施禁运和禁飞区、撤离美国公民和增援主要盟军。

美国军队不仅必须准备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多次较小规模的应急军事行动，而且还必须准备在面临诸如恐怖主义、网上攻击、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一些挑战时采取这些应急行动。美国军队还必须准备在必要时从应急行动中脱手出来，以部署军队打一场重大的战区战役。因此适量的美国军队将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将接受培训，获得装备，组织起来以便能够同时在多条战线上采取军事行动。

重大的战区战役 进行并赢得重大战区战役是对我们武装部队的最终考验，它们必须始终经受得住这种考验。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最好能与盟国一起——必须拥有威慑能力，如果威慑无效，便在相重叠的时间内在两个不同的战区挫败大规模的、跨越边界的入侵。保持同时打两场重大战区战役的能力能够使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感到放心，而且还会使与美国结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进行并赢得重大战区战役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我们必须能够在两个战区接连、迅速地挫败敌人最初发动的进攻，使其难以实现目标。我们必须保持这种能力以确保能够在入侵被制止之前掌握主动权并使领土丧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确保盟军之间能够协调一致作战。

第二，美国必须准备在敌军可能对我们采取不对称手段



——一种避开或破坏我们的实力，同时又利用我们的弱点的非常规手段——的情况下进行并赢得战争。

第三,我们的军队还必须能够从全球作战的态势,即从和平时期的海外军事行动以及多次反复发生的较小规模的应急行动的态势过渡到打一场重大的战区战役。从这种军事行动中撤离出来可能将在政治和军事上构成重大挑战。然而,美国最终必须接受某种程度上的、与从应急行动和其它军事活动中撤离出来有关的风险,以便减少如果我们未能对重大战区战役作出足够反应而出现的较大的风险。

#### 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

即使我们解决了今天的安全问题,我们也必须为不确定的未来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器,通过调整其应付新挑战的机制来确保其效率。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调动我们外交、国防、情报、执法和经济能量和组织,以便在当今不断变化、极其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中迅速采取行动并作好准备,抓住新的机遇和应付新的挑战。为不确定未来作好准备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拥有一个牢固的、有竞争力的、技术上具有优势的、创新的、反应敏感的工业和研究开发基础。

#### 2. 促进繁荣

我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第二个核心目标是通过我们国内外的努力来促进美国的繁荣。我们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国内的繁荣取决于我们与之贸易并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商品的几个重要地区是否稳定。繁荣还取决于我们对发展、金融和贸易等领域的国际组织的领导。

### 加强金融协调

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的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国外的经济发展。与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对于保护全球经济体系健康发展和应对金融危机是至关重要的。

### 促进公开贸易体系

在一个全球 96% 以上的消费者生活在美国之外的国家的世界上，我们必须继续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以保持国内的经济增长。迅速扩大的全球经济为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了大量机会，尤其是新兴国家市场的机会。我们在 21 世纪作为一个国家能否繁荣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展开有效的竞争。

政府仍然致力于发扬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取得的成果，并致力于确保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公开解决贸易争端的一个论坛而取得成功。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证贸易自由化不会损害国家安全或环境保护。

除了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开展工作之外，政府还将一如既往地通过地区经济组织促成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非统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建立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

### 加强美国的竞争力

如想取得更加开放市场的最大利益，那就需要一种综合战略，这种战略可以保持我们的技术优势，促进美国在国外的出口，同时保证旨在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出口控制不会无谓

地造成美国高技术公司在全球的竞争力下降。

技术优势。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科技基础，这个基础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创造高薪就业机会，保持公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同时为我们将来的军事系统提供基础。我们将投资于教育和培训，培养一支能够参加到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经济中来的劳动大军。我们还将投资于世界水平的运输、信息和空间基础设施，迎接 21 世纪。

出口主张。政府制订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改革了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扩大出口的办法。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在加强出口促进工作、协调我们的出口资金供应、实施整个政府的贸易计划以及更新市场信息体系和改善产品标准教育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种出口战略正在发挥作用，美国开始重新取得它的头号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我们巨大的对外出口支持了数以百万计新的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强我们的贸易平衡状况，创造高薪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在未来的一些年里扩大出口。

得到增强的出口控制。美国在高技术方面的出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包括卫星、移动电话、电脑、信息安全和商用飞机。在这些技术中，有些可以直接或间接用于军事目的，一些国家或者跨国组织因此可能用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有鉴于此，美国政府严格控制高技术的出口，办法是对可能用于军事目的或者因此损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商品和技术施以适当的限制。

提供能源保障

在美国的主要能源需求方面，石油占了大约 40%，我们一半左右的石油依靠进口。虽然我们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不到其出口量的 15%，但是，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日本大约占了其中的 80%。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根本转变，旨在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里海盆地潜在的石油储量达到 1600 亿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里有望在满足不断上升的世界能源需要方面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

采取保护措施以及为提高能源效用和寻找替代能源而进行的研究工作是美国能源保障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研究必须一如既往地集中精力开发高能效的建筑、设备、运输和工业系统，在可能的情况下用替代性的、再生性的燃料进行置换。

能源的保护和研究只是一个方面，美国还将一如既往地确保外国石油的来源不能中断这个问题上予以特别的关注。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记住保持重要产油区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我们拥有得到这些资源的机会和这些资源的自由流动。

### 促进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努力取得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更加充分地参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的过程中面临着系列的挑战。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不善可能会妨碍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导致地区动荡。

可持续发展将会带来收入的增加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而市场的开放又能给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创造稳定增加的机会，这样将能改善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和社会稳定的前景，加

速全球经济的增长，这是美国出口依赖的基础。这样将会缓解全球环境的压力，减少非法毒品走私和其它非法贸易的诱惑，增进健康，提高经济生产能力。美国的对外援助应该集中在可持续发展的五个重要方面：广泛的经济增长、人类智力的开发、环境的保护、人口与健康以及民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提倡有益于环境的私人投资，主张国际借贷机构采取负责任的措施。

### 3 促进民主和人权

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个核心目标是促进民主、人权和对法治的尊重。

#### 新兴的民主国家

美国努力在所有国家加强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机制和准则，尤其是那些从闭关锁国向开放社会过渡的国家。这种实现自由和尊重人权的承诺之所以站得住脚，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承诺是公正的，而且也是务实的。我们的安全依靠世界范围民主的保护和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压制、腐败和动荡可能会吞没许多国家，并且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

#### 遵守世界人权和民主原则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敦促大家遵守民主原则，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包括仍在抵制民主发展的那些国家。美国应该通过双边和国际机构开展工作，促进世界各国尊重民主原则和国际人权标准。我们在联合国和其它机构中的努力开始帮助这些原则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国际行为的指导标准。

种族冲突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我们的安全的一个重大

挑战。

我们将努力加强国际社会的能力，防御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大屠杀的发生和难民的出现。

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努力——通过双边和国际机构——确保国际人权原则保护世界上那些最易受到伤害或者传统上一直受到压制的群体：妇女、儿童、工人、难民和其它遭到迫害的人。

促进宗教自由是我们对外政策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思想、意识和宗教的自由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各各个国家和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同宗教迫害进行斗争，促进宗教自由。

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大声疾呼反对践踏人权的行，同愿意与我们进行建设性接触的国家开展人权对话。

#### 人道主义行动

我们的人道主义计划对我们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起到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人道主义计划旨在减轻人们的痛苦，制订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支持和推动那些尊重人权和法制的民主政权。

我们还必须努力促进那些遭受内乱的国家，处理人口流动和难民危机。

### 三、综合的地区方法

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可以反映我们针对它们独特的挑战和机遇而制订的整体战略。

## 欧洲和欧亚

欧洲的稳定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在欧洲有两个战略目标。首先是建立一个真正一体化的、民主的、繁荣的、和平的欧洲——这是美国 50 年前在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制订的目标。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同大洋彼岸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应对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全球挑战。

## 加强安全

北约仍然是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一个支柱，是大西洋两岸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欧洲安全的一个主要保障和欧洲稳定的一支力量，北约必须在促进欧洲的进一步融合和安全的进一步加强方面起到主要作用，时刻准备对新的挑战作出反应。我们将在欧洲保持大约 10 万人的驻军，从而履行我们对北约的承诺，提供一个对于侵略和压制的明显的威慑力量，促进地区的稳定，对危机做出反应，保持我们至关重要的大西洋两岸关系，维护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加强欧洲的稳定方面起着一种主要作用。它可以为美国建立欧洲的安全结构提供一个场所，这种结构又可以对我们的北约战略形成补充。美国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有力的支持，以此作为我们同欧洲所有国家、高加索地区、中亚国家进行接触的最佳选择，从而促进民主、人权和法制的发展，促使这些国家在局势动荡、社会不稳、违反人权的行为威胁到地区安全的时候彼此之间相互支持。

巴尔干半岛和东南欧。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和平一直比较

关注，因为这里持续的动荡不安威胁到欧洲的安全。我们正努力推动东南欧的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融入欧洲的主流之中。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黑山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北约今年成功地在科索沃进行了干预之后，巴尔干半岛的稳定仍然受到种族仇恨和政治压迫残余势力的威胁。在美国和北约仍在帮助这里的人民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未来巴尔干半岛的同时，我们仍在准备对付这个地区的稳定可能再度出现的威胁。

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全面执行代顿协议是在波斯尼亚建立自治和平的最大希望。我们正在努力加快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市场经济改革，支持克罗地亚向民主制度过渡。

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塞浦路斯局势的紧张、希土在爱琴海的分歧、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对地区稳定以及欧洲政治和安全结构的演变有着重大影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缓和希土长期紧张关系以及寻求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来稳定这个地区的局势。民主、世俗统治、稳定和倾向西方的土耳其对这些努力非常重要，支持了美国为加强波斯尼亚、前苏联国家和中东国家的稳定以及遏制伊朗和伊拉克所作的比较广泛的努力。

波罗的海国家。我们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关系的特殊性在 1998 年的伙伴关系宪章中得到承认，伙伴关系宪章明确规定了美国同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的原则，为加强联系和寻求共同目标确定了框架。这些目标包括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大西洋共同体，在东北欧所



有国家之间发展密切的合作关系。

北爱尔兰。美国继续同英国和爱尔兰政府以及北爱政界领导人一起努力使受难节协议得到全面执行。我们通过“国际支持爱尔兰基金”和私营部门帮助人们抓住和平带来的机会,吸引新的投资,弥合社区的分歧,创建新工厂、工作场所和就业岗位,建立 21 世纪的新的学习中心。

俄罗斯和新独立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其它多数新独立的国家现在是实行选举制度的民主国家,但我们将继续同所有这些国家接触以改善它们的选举程序,通过与基层组织、独立媒体和新兴企业共同努力,帮助加强文明社会。尽管从共产主义向市场民主制度的过渡远未结束,但是新独立的国家基本上取消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放开了价格。帮助它们制定市场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和掌握必要的技巧,打击犯罪和腐败以及推进人权和法制,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

### 促进繁荣

欧洲是美国全球商业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欧洲和美国创造近一半的全球商品和服务,美国海外投资的 60% 以上在欧洲,大西洋两岸 1400 万工人的生活靠两岸商贸。作为 1995 年启动的大西洋两岸新日程的一部分,美国和欧盟同意采取具体步骤,通过建立开放的跨大西洋新市场和通过取消重复检测和批准的互相承认协议,减少对贸易和投资的壁垒。

在大西洋两岸新日程的基础上,美国和欧盟在 1998 年开始了大西洋两岸经济伙伴关系,目的是加深我们的经济关系,加强我们的政治联系,减少贸易摩擦。

美国大力支持体现在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支持欧盟扩大，我们也鼓励在非欧盟国家发展双边贸易和投资。我们承认欧盟国家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经济呆滞期使公众削弱了对拨款外向型对外政策和加强一体化的支持。我们正在与欧洲伙伴密切合作，以扩大就业，促进长远增长和支持大西洋两岸新日程。

我们通过支持中欧和东欧以及新独立国家的历史性市场改革，帮助新建的民主制度生根，避免腐败和贫困这类可能削弱民主政府和减少民主价值观的吸引力的情况。美国将继续帮助新独立的国家融入国际经济和其它体系，造就健康的商业气候。我们将继续促进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努力在防止腐败的同时建立生气勃勃的市场经济。

我们正在与新独立的国家共同努力，使它们以商业上公平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特别注意对里海能源资源的投资以及它们从高加索地区向世界市场的出口，这样可以使世界能源供应增加和来源多样化，促进该地区的繁荣。

#### 促进民主

中欧和东欧以及欧亚地区的民主改革是避免为种族暴乱和地区冲突创造条件的最好措施。

新独立的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民主和经济改革对美国利益关系重大。为了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我们正在利用双边关系以及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作用，调动政府和私人的资源。

#### 东亚和太平洋

克林顿总统对太平洋新共同体的设想把安全利益同经济增长以及我们对民主和人权所负的义务联系起来。我们将继续以此为基础，加强美国在一体化进程中提高的亚太地区的稳定作用。

### 加强安全

我们的军事存在是保持和平与安全、使亚太地区多数国家能繁荣经济从而造福大家所必不可少的。为了防止侵略和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在这个地区保留了大约 10 万军队。美日安全联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支柱。我们持续的安全作用因为我们与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通过双边条约结成的联盟而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保持着健康的关系，支持就各种共同的安全挑战举行地区对话，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论坛。

日本。美国和日本在 1996 年 4 月的联合安全宣言中重申了我们的双边安全关系。在我们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美日联盟仍然是实现共同安全目标、为亚太地区保持和平繁荣的环境的基石。

最近签署的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合作进行日本自己的卫星计划的协议，使我们的双边安全合作得以扩大。另外，我们与日本密切合作，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力求全球遵守核不扩散条约，消除破坏稳定的常规武器和敏感的双重用途技术转让造成的危险。

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仍然是对东亚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开表示愿意和平统一，但是继续把它日益减少的资源大部分用于其庞大的军

事力量。

金大中总统继续采取使朝鲜半岛走向和平与稳定的方针，寻求与朝鲜对话的新渠道，开发南北合作的新领域。美国正在努力创造稳定的条件，同我们的韩国盟友保持团结，强调美国致力于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确保孤立、处境困难的朝鲜不选择军事办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

我们愿意改善同朝鲜的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吸引朝鲜同该地区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建立比较正常的关系。但是，我们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将继续与朝鲜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的合作保持一致。

美国必须履行在框架协议中承担的义务，克林顿政府将同国会一起确保我们为了解决朝鲜核威胁所作的努力取得成功。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定、开放、繁荣、尊重国际准则、承担建设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的责任，显然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的。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的一员的作用。我们的对华政策既是有原则的，也是讲求实际的，既扩大我们的合作领域，同时直率地对待我们的分歧。尽管两国关系因为意外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悲剧性事件而紧张，我们仍然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接触。

我们未来的重要安全目标包括：保持由最近的首脑会谈和其它高级交流开始的战略对话；通过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和平解决海峡两岸的问题和鼓励北京与台北对话，加强台湾海峡的稳定；加强中国对国际不扩散准则的执行，特别是

对弹道导弹和双重用途技术的出口控制；重新开始我们有关武器控制的双边讨论；提高中国军事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通过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论坛这类多边论坛的积极合作，鼓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加强在反恐怖主义和缉毒等领域的执法合作。

东南亚。我们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集中于发展地区双边安全和经济关系，使之支持冲突的防止和解决，扩大美国对地区经济的参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目标是：保持我们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安全联盟；维持与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其它国家作出的为安全目的使用其领土的安排；鼓励建立一个强大、团结一致、能加强地区安全和繁荣的东盟。

我们的政策双管齐下。第一，我们必须保持与东盟国家越来越富有成果的关系，加强我们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安全对话。第二，我们必须寻求与东南亚各国采取双边行动，促进民主、人权和政治稳定；加强面向市场的经济改革；减少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影响，特别是海洛因从缅甸向该地区其它国家的贩运。

### 促进繁荣

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开放是美国经济健康的关键。我们在东亚的经济目标包括：继续从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恢复；亚太经合组织进一步放宽贸易和投资限制；通过开放市场的措施和为美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条件，增加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出口；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以令人满意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亚洲经济增长的机会很多，是我们大力进行经济合作（如通过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基础。

我们在亚洲的经济战略有四大要素：支持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与国际金融机构一起提供目标明确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以支持经济改革；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双边人道主义援助和紧急双边财政援助；敦促日本和其它经济大国采取有力的政策行动以促进全球增长。

美国将继续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东亚的政府以及私营部门一起，帮助稳定金融市场，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深化东亚麻烦的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注意敦促保护工人权利的必要。在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改革以加强金融稳定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吸引恢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时，我们将继续给它们支持。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主动行动将为经济合作打开新的机会，使美国公司能更多参与整个地区重要的基础设施计划和建设。我们将继续努力鼓励所有亚太地区的国家开放市场。

中国。让中国更充分地汇入全球贸易体系显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中国是我们的商品和服务的潜在大市场。展望新世纪，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支持我们国家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贸易关系，以加强我们的经济关系，这是从 1980 年以来每一位总统所做的。

中国汇入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通过拆除贸易壁垒和取消对经济活动起扭曲作用的限制来开放中国保护很严的市场。我们将继续压制中国在进行全面经济改革的同时开放市场，尊重和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确定的主要劳动标准。

日本。政府将继续在增加亚洲最大的经济体的市场准入方面取得进展。

日本在亚洲经济回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大幅度增长帮助维持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从新兴市场的进口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我们鼓励日本改革金融部门，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对经济的管制，进一步向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

大韩民国。美国将继续大力支持韩国为改革经济、放宽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加强银行体系和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所作的努力。我们承诺根据适当的条件提供双边资助并将继续探索具体步骤以促进我们两国的增长，更充分地开放我们的市场，使韩国进一步汇入全球经济。

东盟。除了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东盟几个国家的回升计划外，美国还通过保持我们的市场对东南亚商品和服务的开放来大力支持东盟 10 国为维持和加强经济回升所作的努力。同东盟成员国共同努力解决东南亚的环境恶化是一件优先考虑的大事。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在已有的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密切工作关系的基础上，加强我们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在地区自由化问题上取得共识，在开始的世贸组织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中合作。

### 促进民主

我们将继续支持亚洲人的民主愿望，敦促当局尊重人权。我们的战略包括：积极争取中国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法制问题取得进步；促进缅甸执政当局与民主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对话；促进柬埔寨的民主并鼓励更多地尊重人权；在越南尽可能弄

清失踪美国军人的下落和敦促当局更多地尊重人权。

### 西半球

我们半球在进入 21 世纪时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保障未来稳定和繁荣的机会——在本半球除古巴以外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并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这个事实的基础上。

### 加强安全

西半球担心的主要安全问题是跨国问题,如贩毒、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洗钱、非法移民、军火走私和恐怖主义。另外,我们半球带头承认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法律制度给国家和地区稳定造成的危险。所有这些威胁,特别是贩毒,产生了有害的社会影响,使西半球国家的主权、民主和国家安全受到损害。

我们力求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和其它组织,在我们半球消除贩毒的祸害。

我们通过以下方面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双边安全对话;在美洲国家组织和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进行多边努力,制定提高透明度和建立地区信任和安全的措施;与重要的军队进行演习和交流(特别集中于维和);定期召开国防部长会议。

### 促进繁荣

21 世纪美洲的经济增长和融合将给美国的繁荣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从我们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始。加拿大是我们在全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和贸易伙伴,随着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逐步实施,我们对加拿大的出口迅速增加。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以来,美国对墨西哥的商品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使墨西哥成为我们的第二大商品出口市场和贸易伙伴。在整个西半球,我们的贸易计划为利用



和加强朝着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趋势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

我们将通过依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获取国会的快速贸易协议批准程序来推进把西半球建成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一体化自由市场的目标。

美国将继续保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有效伙伴关系，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向一体化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

我们还认为，应该通过在环境上可持续的方式来寻求我们西半球的经济繁荣，这一点很重要。从我们共有的海洋和淡水资源到候鸟物种和跨边境的空气污染，邻国的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国内的生活质量。美国政府在援助该地区的时候认识到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与长期繁荣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关系，这是在西半球发展繁荣的贸易伙伴的关键。

### 促进民主

过去几年来，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民主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维持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制订的西半球议程的能力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应付由弱小的民主机构、居高不下的失业和犯罪率以及严重的收入差距构成的挑战。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果没有管理、司法、执法和教育方面的改革，以及把所有社会成员融入正规经济的进一步努力，公民们不会充分认识到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发展的益处。

西半球的领导人决心为加强民主、司法和人权而努力。

教育是旨在使所有美洲人都能享受民主的改革的核心。

我们还谋求提高防务设施的标准,因为它们民主、透明度、尊重人权及防务问题由非军人控制等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海地,我们继续支持能够保证自身安全的海地政府巩固民主制度,尊重人权和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仍然致力于推动古巴以和平方式向民主过渡和预先阻止古巴人大批移居国外。古巴人大批移居国外将危及移民的生命和我们边境的安全。

#### 中东、北非、西南亚和南亚

这些地区的事态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将决定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该地区的国家是否会全面参与我们打击恐怖活动和毒品走私的行动;它们是否会同意停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行为;高加索和中亚的油气田能否成为可靠的能源来源;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民主能否制度化。

#### 加强安全

在寻求公正、持久和全面的中东和平,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安乐,帮助我们的阿拉伯朋友保证安全并保持石油的自由输出方面,美国有着永久的利益。在我们努力加强和平与稳定的过程中,我们的战略反映了这些利益和该地区的独特特点。

中东和平进程。中东的政治场景正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和平协议正在确立,需要一致的执行行动,新的协议正在谈判之中,这一切带来了结束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冲突的希望。美国——和平进程的重要设计师和发起人——在该进程的扩大和深化方面有着明确的国家利益。我们将继续保

持我们稳定而坚决的领导地位——支持为和平甘冒风险的人,反对试图破坏和平的人,在我们能发挥作用的方面积极斡旋,并为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具体的好处出一份力。

北非。北非的稳定与繁荣对美国很重要。这个地区正发生重要的变化。我们尤其正努力加强同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并鼓励那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利益来说,利比亚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虽然利比亚政府交出了洛克比空难的嫌疑人,朝着停止支持恐怖活动迈出了重要而积极的一步,但我们对利比亚的政策是鼓励利比亚完全停止对恐怖活动的支持,阻挠它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行动。

东南亚。美国关注的重点仍然是阻止威胁地区稳定和能源安全的因素,对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构成的威胁,保护我们地区伙伴的安全,尤其是保护它们免遭伊拉克和伊朗的威胁。我们将继续鼓励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在集体防御和安全安排方面密切合作,帮助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达到其防务要求,并保持我们的双边防务关系。

我们将通过部署陆海空三军,在东南亚保持适当的驻军。我们将在海湾不断保持驻军,以加强地区稳定并支持我们继续促使伊拉克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努力。我们有在危机爆发时迅速增援该地区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海湾驻军的后盾。我们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种能力。我们仍决心强制执行伊拉克南部和北部的禁飞区,这对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阻止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或伊拉克的库尔德和什叶派少数民族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

我们对伊拉克的政策由三个核心部分组成：遏制和实行经济制裁，防止萨达姆再次威胁极其重要的海湾地区的稳定；通过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缓解伊拉克人民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向谋求以一个能与邻国和自己的人民和平相处的政府来取代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人提供支持。

我们对伊朗的政策旨在改变伊朗政府在几个重要方面的作法，这些方面包括它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远程导弹的努力，它对恐怖活动和激烈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组织的支 持，它削弱该地区友好政府的企图，以及它发展威胁我们海湾合作委员会伙伴和石油输出的进攻性军事能力的行动。我们有兴趣地看待伊朗政策中的变革迹象，既看到伊朗在国际社会取得合法地位的可能性，又看到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我们欢迎哈塔米总统提倡与美国展开人民之间的对话的讲话。

我们准备进一步探索与伊朗建立相互信任和避免误解的办法。我们将加强与盟国和朋友的合作，鼓励伊朗对威胁我们共同利益的作法作出积极的改变。如果能够以一种解决双方所担心的问题的方式开始和保持政府之间的对话，那么美国愿意与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拟定一幅通向正常关系的道路图。

南亚。我们的南亚战略旨在通过帮助解决长期冲突、执行建立信任的措施和促进经济发展来帮助该地区人民享受民主的成果。地区稳定和双边关系的改善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同样重要。这个地区占世界人口的 1/5，是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之一。另外，我们寻求与该地区国家密切合作，杜绝从南亚，尤其是阿富汗流出的非法毒品。我们寻求与印

度和巴基斯坦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既反映它们各自的价值，又充分体现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分量和范围。1999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的政变显然是该地区民主的倒退，我们已敦促巴基斯坦领导人迅速恢复非军人统治和民主进程。

作为我们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话的一部分，我们努力鼓励这两个国家采取措施防止扩散，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并在核和导弹计划方面采取克制态度。

#### 促进繁荣

美国在该地区有两大经济目标：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确保石油不受限制地从该地区输出。我们设法通过和平进程、中东和北非经济首脑会议的恢复、以及我们向与以色列达成经济安排的某些国家提供经济利益的合格工业区计划来促进地区贸易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在南亚，我们将继续与该地区的民主国家合作，以帮助它们实行市场改革、加强教育体制、停止使用童工和血汗工厂劳工的做法。

#### 促进民主

我们鼓励民主价值观在中东、北非、西南亚和南亚的传播，并将借助同该地区国家开展建设性对话来寻求这个目标。

####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近年来，美国一直为改变同非洲的关系而协同努力。我们对许多非洲国家朝着多党民主制度迈进、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维护人权、允许新闻和结社自由以及实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予以支持。一种殖民地时期结束以后的新政治秩序正在非洲形成，注重以民主和务实的方式解决政治、经济和环境问

题并开发人力和自然资源。美国与非洲的关系正在加深，美国同非洲的贸易正在扩大。

把最近的这些成绩保持下去需要我们认清最直接影响我们利益的、而且通过有效分配资源的方式能够改变的问题。通过利用仔细协调的美国计划和倡议与地区组织和重要的非洲国家接触，我们将促进地区稳定。我们当前的目标是增加非洲强国的数量；所谓强国，就是能够弄清楚自己面临的挑战、利用其资源有效解决这些挑战、并在国内和地区内建立稳定与和平的国家。

#### 加强安全

一些严重的跨国安全威胁来源于非洲，包括国家资助的恐怖活动、毒品走私、国际犯罪、环境恶化和传染病——特别是艾滋病。由于这些威胁跨越了国界，因此最好通过非洲有效而持久的地区接触来解决。我们已经在对付其中一些威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例如资助对付环境恶化和传染病的行动，领导在前冲突地区扫雷的国际行动，以及阻止地雷的扩散。我们将继续努力，减少非法毒品通过非洲流出并遏制非洲的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我们将改善国际情报共享，培训和帮助非洲执法、情报和边境控制机构发现并阻止有计划地袭击美国在非洲的目标的恐怖活动。

我们设法通过支持南非核裁军和作为非核武器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非洲无核武器区、鼓励非洲国家加入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以此使非洲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 促进繁荣

把非洲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已对美国的出口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市场，从而直接促进美国的利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 7 亿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之一。虽然美国在非洲只占 7% 的市场份额，但美国已有 10 万个就业机会依赖于对非洲的出口。增加美国的市场份额和扩大非洲的市场规模将给美国职工带来实际的利益，并增加非洲的繁荣和经济机会。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帮助非洲国家实行经济改革，改进政府管理，惩治腐败，创造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 促进民主

在非洲，和其它地方一样，民主政体证明是实现和平、稳定和持续繁荣的更加有力的伙伴。我们将继续支持非洲国家已经取得的重要进展，扩大日益壮大的非洲民主国家圈子。

最后，非洲的繁荣与安全取决于非洲领导人、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以及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美国将继续支持和促进这种国家改革，支持和促进在非洲国家间建立合作的地区安排的逐渐形成。

#### 四、结束语

今天，在我们进入 21 世纪之际，我们正构筑新的框架、伙伴关系和公共机构——并改变现有的框架、伙伴关系和公共机构——以促进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我们正努力构建新的合作安全安排，缔造和平，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打击恐怖活动和国际犯罪，在全世界消灭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建设真正

全球性的经济，推广民主的价值观和经济改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关头，我们有机会创造更加安全、更加民主和更加繁荣的明天——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将继续以一种体现我们国家的价值观、促进这个伟大国家的繁荣和保护其安全的方式在全球行使领导地位。

（钟建国、王成凤、赵鑫福、杨柯、任美芬、殷欣译）



## 序 言

自去年美国飞机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对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认识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长，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中美关系不会坏到哪去，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对我现代化建设越来越有利。有些人则认为，中美关系深层矛盾日益严重，台湾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我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利趋势在增长。学者们的分歧其实也反映了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担心和对我国国际环境发展趋势的困惑。作为职业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近几年来，我一直进行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判断工作。今天回顾以往几年所作的一些分析与预测，发现与历史的客观进程大体相符，对台湾问题发展趋势特别是对李登辉将走向公开独立的预测尤为典型。当台湾问题又一次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之际，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建议将这些文章整理成册，以供读者参考，冷静思考我国的国际环境问题以及如何分析台湾问题。此书观点文字一如原发表时的样子，只是在技术上纠正了个别的文字标点错误。

笔者认为，只有从国际格局的高度观察国际环境变化趋势，才能较为清楚地看清大趋势。这有如从飞机上鸟瞰城市，才能较清楚地识别不同车辆所处的位置及其行驶路线是否畅通。因此，本书将有关美国霸权是如何影响冷战后国际格局基本特征的文章集为第一篇，希望读者能高屋建瓴地观察冷

战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鉴于国际安全环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常进行的最基本前提，本书第二篇集中了有关中国安全环境的文章，使读者能对冷战后我国安全环境的问题及走向有所了解。这一篇将为从事中长期战略研究的读者，无论是从事何种行业的长期战略研究工作，提供安全方面的参考。从中近期看，台湾问题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影响将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第三篇集中了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及访谈录。该篇主要解释了台湾问题的性质及解决的前景，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的读者可由此篇了解台湾问题的变化趋势。第四篇则就中国如何争取有利于民族崛起的国际环境的策略问题谈了笔者个人的看法，希望以管窥之见引发众人的大睿大智。

此书的编排工作是由盛家林先生主持的，他对本书的面世起到重要作用。我的两位研究生吴兴佐和纪肖鹏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校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余克礼先生审阅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近年来，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有关方面及读者们的肯定，我以为其原因之一是我以理性维护国家利益为原则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一原则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愿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阎光武和母亲孙志娥，以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学通

写于北京

2000年 3月 8日

## 作者简历

阎学通,生于 1952 年 12 月 7 日,1982 年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现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南大学兼职教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委员会委员,太平洋学会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瞭望》周刊特邀国际评论员,韩国《韩国国防分析》、美国《中国政治学刊》和《东南亚研究》学术顾问,《现代国际关系》和《世界知识》编委;曾分别于 1994、1996 和 1998 年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和美国蒙特利国际问题研究院任客座教授,1994 年任中国国法治学会理事,1997 年被纳入国家百千万人才库。

1992 年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政治学系,获博士学位;1986 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1982 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获学士学位。

自 1993 年以来,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对外政策”课程的教学。

主要著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和《中国与亚太安全》(时事出版社,1999)。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于 1998 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1999 年获“天津图书特等奖”,1996 年获组织部和劳动部颁发的“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奖”。